

纪念马克思
逝世一百周年

论文集

陕西省纪念马克思
逝世一百周年
学术论文评选组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纪念马克思
逝世一百周年
论文集

陕西省纪念马克思
逝世一百周年 编
学术论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论文集**

陕西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学术论文评选组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字数184,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统一书号: 3094·286 定价: 0.90元

目 录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石如岗 徐博涵 (1)
宋正民 李秀潭

共产主义在实践中……………成一丰 (21)

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王伯惠 (37)

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利用

-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朱楚珠 段兴民 (45)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赵炳章 (63)

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在我国的实践……………李平安 (78)

学习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理论 正确处理人民生活同社

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李中民 王 勇 (92)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

体运用和发展……………段伟华 张绪从 (109)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永放光辉……………张瑞生 (134)

试论马克思的民主理论

及其意义……………李远金 梁亚栋 郭欣耕(179)

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彭树智(195)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谭冰石(212)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光荣传统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张岂之(233)

魏野畴在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刘炳强(253)

后 记……………(272)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石如岗 徐博涵

宋正民 李秀潭

今年三月十四日，是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伟大导师。

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由一种科学的社会革命学说，已经变成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已经在一些国家变成生气勃勃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已经有八十多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实际，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曲折的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现在，又找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说到底，就是要继续总结和运用我们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得来的基本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一般特征的基础上找到适合我国社会特点与历史特点的具体形式、具体制度与具体政策，沿着党的十二大所指引的方向，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用我们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

马克思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逝世于英国伦敦。他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耗尽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他对人类历史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共同创立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争取自身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①恩格斯称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②。

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各主要国家最后确立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尽管资本主义还到处表现出它的生命力，但它所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空前尖锐起来。在反

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时候，无产阶级曾作为资产阶级的助手一起进行了战斗。然而斗争的结果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什么好处。伴随着产业革命后出现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而广大工人却越来越变成机器的附属品，过着日益贫困的生活。为了能够生活下去，无产阶级不得不经常发起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英法等国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寻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理论也相继出现。这些理论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剥削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和鞭挞，提出了未来美好社会的方案，但它既没有揭示出造成这个社会剥削的根源和本质，也没有找到改造这个社会的力量和现实途径。所以它只能成为一种空想，不但不能正确指导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相反却成为工人运动的思想障碍。很明显，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新的正确的理论指导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出来了。

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和理论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开始的。马克思怀着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决心和宏伟志向，以惊人的毅力和才智深入研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几乎全部主要论著，对以往的理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改造。他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③；他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

替的客观经济规律。在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发现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从此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除毕生从事理论的研究和写作外，还亲身参加了工人运动的实践，领导了第一国际的斗争。马克思十分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写了大量著作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策略和一般进程。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部光辉著作的问世，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正式诞生。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象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冲击着一切旧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它结束了劳动者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历史。按照这个理论，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资产阶级专政必然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消灭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必然发展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统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新的斗争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原理，成功地领导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推动了新的

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在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兴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进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直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步沦为一个任人宰割、任人奴役、衰败不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曾进行了七十多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重振中华，曾一次又一次地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中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民才找到了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理论，中国革命才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介绍到中国。当时，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的学说，只有极少数到过欧美或者日本的先进的中国人知道。这些先进的人们虽然通过报刊向国内作过介绍，但是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刊物上，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革命的胜利和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亦开始被翻译出版。这样，马克思主义便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了。

我们陕西，早在一九〇八年就有在日本留学的陕西籍同

盟会会员井勿慕通过《夏声》杂志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真正传播开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当时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学习的陕西青年魏野畴、李子洲、刘天章等创办《共进》等刊物，把马克思主义输入陕西。特别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西安、华县、渭南、三原、榆林、延安、绥德等地相继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知识分子的范围逐步扩展到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去，甚至扩展到反动军队内部，进一步推动了陕西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蓬勃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根本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大大加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设起了生气勃勃的具有无限光明前途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人民接受和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任何政党、任何个人强加的，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作出的历史选择。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即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曾经写道：“红色博士杜撰的共产主义社会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逝世了。在他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剩下不足三百。但愿他幻想的学说本身会随着马克思之死而死亡。”^④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学说是何等的恐惧！他们常常诅咒、诽谤和妄图消灭马克思的学说，但历史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愿望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学说不是被消灭了，而是愈来愈发展，愈来愈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历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

证明，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永远是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旗帜。只要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更加繁荣昌盛，中国人民必将为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

二

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归根结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际、本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制定出一整套适合本国特点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为本国广大劳动群众所接受，变成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无坚不摧的巨大物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不止一次地要求人们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做“现成的教条”，到处照搬照套，而要当做“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⑤。列宁也曾告诫人们：“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这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⑥所以他再三强调各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特殊情况”。他说，“只要各个民族之

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①。在具体谈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理论是从大量的个别的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的理论能够指导人们正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和本质特征。但是，理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包括个别具体事物的一切特征和一切方面。“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③因此，人们在获得了反映普遍规律性的客观真理以后，在实际应用时，还必须继续研究具体事物的一切联系，一切特征，从中找到反映这一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性。这是我们在运用任何科学理论时所必须遵循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伟大的胜利，最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但是，我们党刚刚一成立就投入了刻不容缓的复杂激烈的战斗，因而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全

部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理论上的准备不足，修养不够，对中国社会特点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分析。马克思一八五六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谈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农民问题。他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⑩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却缺乏认识，而是一味照搬共产国际的某些决议和苏联经验，结果使革命屡遭巨大挫折。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毛泽东等同志写了一系列著作，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更加完整地制定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独特的革命经验的理论概括。由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我们才真正解决了在中国条件下如何具体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并在全党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既不是一次成功

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更替，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变化，不断地探索实现这种结合的途径。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从我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以及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通过逐步前进的步骤与和平的途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保证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解决得比较成功，在短短的七年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一个创举。

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我们却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按照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进程的论述，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走过三个基本的步骤，这就是：争得统治权；一步一步地消灭私有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我们在夺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制的“三大改造”以后，所面临的任务本来应该是尽最大努力去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在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却继续把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继续放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结果使我们在革命的进程中又一次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这种“左”倾错误的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峰。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仍然是一个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问题。我们党在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中重新阐明了这个基本的理论原则和正确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为指导，对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出和制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任务，以及实现这个总任务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在全国各条战线已经和正在形成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动人景象。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一定胜利，离开这种结合，就一定失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对我们的基本经验作了非常完整准确的概括，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现在，我们党正在运用这条基本经验，在进一步努力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十二大报告和新宪法等历史性文件中，我们大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条道路的基本轮廓。

从经济上来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发展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

门，继续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广泛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以及在国营经济中实行的经营责任制，是我国现阶段而且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内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是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根据农民群众创造的经验，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个体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民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得到新的发展。

我们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体，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样，就把必要的集中统一和灵活多样的具体形式结合起来，保障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协调地发展，在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方面，建立起适合我国特点的具体制度和形式。在“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指导下，我们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同时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在坚持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艰苦奋斗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尽可能地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以促进我国的生产建设。总之，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下，搞活经济，以便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逐步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和基础。

从政治上来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我们不但和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

还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巩固和发展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同时，把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根本目标，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和原则，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目标更加明确，内容更加丰富。它必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思想、文化上来说，我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括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逐步把每个社会成员造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同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思想，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说，就其内容和本质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性；然而就其形式、方法、具体细节来说，又是带有中国色彩，适合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习惯等等现状和特点的，这是特殊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创立，标志着我党对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了。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经过在经济、政

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不断改革，使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完善，愈来愈切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和特点，我们就一定能够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

当然，这方面存在的必然王国，我们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认识清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是带有独创性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时，我们必然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还会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新情况。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奋地、及时地、精心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不断地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把自己武装起来，振奋精神，勇于改革。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贯彻好党的十二大精神，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项工作中，开创出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

三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二大精神和五届五次人大提出的方针任务，落实中央关于“改革要坚决，经济要抓紧”的部署，全面开创我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马克思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要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第一位的问题，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理论工作的新局面。

从目前我省理论工作的情况看，开创理论工作的新局面，需要从思想上和工作上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提高对理论工作的认识，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理论支柱，那它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发展。特别在我们党理论上有过一些失误之后，更要注意从认识上解决好这个问题。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实际工作中的许多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都是同理论上的错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理论上的错误常常是实际工作错误的先导。近几年来，我党在实际工作中之所以取得了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在理论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对于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和总结，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真正从思想上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按照十二大的精神，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把理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就科学领域来说，一个是社会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它们是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两翼，其中缺一不可。

延安整风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全党开展了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充分运用这个成功的经验，发扬这个好的传统，在全党全民中重新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高潮。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什么“危机”。这种观点是

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是真理，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危机的问题，而只是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題。至于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那只是他本人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其他事物一样，它的发展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曲折是不可免的。有时也会发生危机，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危机。但是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它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就以“文化大革命”来说，确凿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破坏和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才造成了这场危机，而正由于恢复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才又摆脱和结束了这场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和危机是无缘的，而且是战胜危机的强大武器。

二、继续解放思想，积极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理论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必须具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勇于创新、开拓前进的理论风格。没有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就不能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个人迷信和“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积极投入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当前，要继续解放思想，就要加强调查研究。特别是要深入实际，钻研新事物，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进一步在实际工作中清除“左”的影响，勇于打破各种老框框，老套套。胡耀邦同志最近指出，改革应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如果说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那末改革——也就是破旧创

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希望理论工作者继续发扬革新精神，站在改革的前列，积极探讨研究改革中的理论问题，勤奋地调查总结改革中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同时要注意抓住改革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解释。理论工作者要勇于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责任感。要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努力加强应用研究，密切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经过各种途径做好普及教育，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社会科学水平。

三、要加强学习，实行体制改革，建设和组织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理论界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方向对头、敢于冲锋陷阵的理论工作者。近年来，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机构和科研队伍都有所发展，其规模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强学习，立足改革，用共产主义思想把这支队伍建设和组织得更加强大，更有力量。从理论战线的现状来看，主要应抓好两件工作：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工作。当前，各个学科，国内国际都有许多重大争论问题，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倾向，有的面临着资产阶级思潮的尖锐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养，彻底改变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才能始终保持理论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做一个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二是要改革科研体

制，把理论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目前我省科研体制和机构有两个主要弊端：一是不利于科研工作结合实际；二是不利于科研人员进行协作。要通过改革，打破部门、地方界限，打破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界限，采取各种形式，密切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的联系，进一步把科研力量组织起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机构，统一筹划指挥和协调各方面的科研力量。要根据研究任务调整专业科研机构。要从我省四化建设需要出发，制定研究规划，建立若干研究中心。重大研究课题，要统一组织力量，集体攻关。对科研人员的考核、评定职称、待遇、奖励以及研究成果的出版等有关制度、政策，要加以改革和完善，使之有利于鼓励科研人员面向实际，积极研究和解决四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有作为有抱负的科研人员，都能在四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中贡献才智，大显身手。

四、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理论工作的领导。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不可能自发地发展。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我国理论工作的繁荣昌盛。各级党委要把理论工作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要切实克服那种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科学，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重要，理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等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真正把理论工作抓紧抓好。从当前理论战线的实际情况来看，加强和改善党对理论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践证明，“双百”方针是我们党领导理论工作的重要方针，符合理论工作发展的规律，深受广大理论工作者拥护。特别在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提出了许多

重大问题，需要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等学科从理论上作出正确回答。这些任务的实现，离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都是不可能的。有些同志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往往把“双百”方针同自由化联系起来，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也有少数同志把“双百”方针看成是可以脱离任何原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实行“双百”方针，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不但不排斥，而且离不开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绝不是听任错误和落后的东西泛滥。这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在大的方向、方针政策方面和中央保持一致，是完全一致的。各级党组织要提高领导理论工作的水平，力求做到：一、鼓励理论探索。在探索中有了缺点错误，不应受到压制和打击，而应得到关心和帮助。二、支持学术争鸣。要允许争论双方各抒己见，不能用行政手段或组织措施进行干预。三、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和宣传中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要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但批评要讲究方式，注意效果，与人为善，允许申辩。我们一定要努力在理论工作中造成一种既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一九八三年是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头一年。在新的一年里，我省各条战线、各个地区、各个单位，上上下下都在为开创新局面而奋勇争先。党和人民对理论工作者寄予充分的信任和殷切的期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指引下，大兴改革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兴学习新知识之风，振

奋精神，勇于开拓，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注：

-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 ④ 转引自《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1期，第16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 ⑥ 《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188页。
- ⑦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
- ⑧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 ⑨ 列宁《哲学笔记》第310页。
-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共产主义在实践中

成一丰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揭示了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展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篇章，掀起了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显示了共产主义的无限生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随着共产主义的不断胜利，名闻世界，彪炳千秋。

一百三十多年前，共产主义还被人们看作“一个幽灵”，只“在欧洲徘徊”，威慑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而今，共产主义思想已“磅礴于全世界”，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伟大精神武器；共产主义运动已风起云涌，遍及全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击着旧世界，并已在一些国家实现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必然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今天，当我们满怀豪情，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的时候，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瞻望未来的美好前景，令人感到无限地欢欣鼓舞。

然而，面对大好形势，却有人看不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甚至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关于“共产主义是

渺茫的幻想”、“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说法，就是一种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的表现。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一下共产主义思想在实践中由空想变成科学的简要过程，考察一下共产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发展，探讨一下共产主义制度在实践中的孕育形成，对于我们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更好地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坚持共产主义实践，积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共产主义思想是作为一种远大理想而出现的。不可否认，它最初曾经是一种空想。从十六和十七世纪托·莫尔的《乌托邦》与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对共产主义的虚幻描绘，到十九世纪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法郎吉”和欧文的“劳动公社”对共产主义的实验，等等，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基本上都是在幻宫里徘徊和探索，没有走出“乌托邦”的境界。因为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是依靠人民群众，而总是依靠上层人物的力量，特别是想依靠天才人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揭露、痛斥和咒骂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但他们看不清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把无产阶级只看作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不相信他们的革命力量，因而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这样，他们的理想就不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

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所以只能是一种空想。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①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高度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成为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力量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才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客观规律和科学的基础上，使共产主义成为科学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②这种运动的最终目的虽然也是一种理想，但它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理想则有着根本的区别。今天，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虽然还是一种崇高理想，但它同刚产生时又不完全相同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已愈来愈丰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目标已更加明确，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了。

当然，这种统一不是等同，而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辩证统一。如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混同起来，过份夸大社会主义的某些共产主义因素，或者把社会主义的某些制度理解为共产主义制度，搞平均主义，把共产主义庸俗化，就会降低共产主义的理想，曲解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人们思想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反之，如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实践分离开来，只把共产主义看成遥远的理想，而

忽视现实的实践，只想着实现理想的艰难曲折，而看不清眼前的进展和实践得来的硕果，使共产主义理想脱离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必然把共产主义当成空想，甚至会被误解成“渺茫的幻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丧失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心，成为实际上的空想主义者；或者只管当前的实践，只讲所谓的“实惠”，而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就会迷失方向，缺乏斗争目标，鼠目寸光，成为只顾追求个人眼前利益的利己主义者，同共产主义完全背道而驰。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南，没有理想的实践，就没有明确的努力目标，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是实现理想的根本条件，无论怎么美好的理想，如果不通过实践来实现，就是空想一番，没有任何生命力。空想共产主义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并不在于它没有美妙的理想，而在于它脱离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实践。科学共产主义的生命力就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还在科学共产主义创立初期，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③与此同时，他反驳卡尔·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又强调说：“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引者注）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④恩格斯的这个概括，就把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现实斗争和最终目的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它说明，共产主义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理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

实践，共产主义理论的首一条原理、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就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共产主义理论的最高原理、无产阶级解放的最终条件，就是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实现这个最高原理和最终条件，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好多代人的艰苦奋斗。马克思依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理论上把这一全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经过一百多年实践的检验、补充、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和条件就是：

从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并巩固和发展这种政权和政治、法律制度，消灭人压迫人的制度，消灭阶级，到最后实现国家的自行消亡；

从剥夺剥夺者，改造小私有经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内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到最后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从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到最后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

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到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从而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使劳动从谋生手段变为人们乐生的第一需要；

从实行义务教育，普及全民教育，大力发展科学、文

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不断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到科学、文化等的高度发展，从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

从开展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纪律的教育，改造私有观念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树立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和自觉纪律，到最后使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提高，造就成一代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等等，已形成了一个严谨而全面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总结为无产阶级解放所必备的基本条件。作为理论体系，要在指导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现实；作为解放的条件，要通过实践一件一件地准备并予以实现。当理论全部转化为现实之日，条件全部具备并加以实现之时，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就会到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就会在全世界实现。

二

科学共产主义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地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共产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着的科学体系，是不断地由一系列原理、原则、结论等构成的总体，而不是一经产生就成了万古不变的教条，也不是什么绝对的终极的封闭体系。它反映现实，又预见发展趋势；它是普遍真理，又包含着具体的原则、论点和结论，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原理、原则和结论的统一。它从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同时也就

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是具体的历史的，既有综合的检验，又有一个一个原理、原则的检验；检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反复不断的，而不是一次完成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产生之后，在发展的途程中，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战斗，它的每一条原理都在长期的斗争中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又在不断的实践检验中丰富和发展。这并不是它的缺陷，而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是它的真理性威力的表现。说“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是毫无根据的。空想共产主义就是由于经受不住实践的检验而证明它不是真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正是因为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而保持着无限的生命力。

科学共产主义从一诞生，就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们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同时也就成为形形色色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诬蔑、谩骂、诽谤和攻击的目标。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不顾身，同各色各样的敌人作斗争，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为共产主义真理而斗争。一切敌对势力千方百计阻挠、抗拒和破坏共产主义真理，却都在真理面前连连失败甚至灭亡。共产主义正是迎风破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实践也在不断地检验、修正和丰富着共产主义的真理性。

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是对共产主义真理的第一次严峻的检验。巴黎公社的光辉历史虽然只有短短七十二天，还存在着不少缺点、错误和问题。但它以史无前例的工人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宣告了资本主义旧世界的灭亡和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开端，证明了共产主义的真理性。它实行的“废除

常备军而用人民武装来代替”的制度；取消“国家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⑤等等，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基本条件的实现，是共产主义真理的具体化。正是经过这次革命的实践，马克思进一步总结出了新的理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⑥，而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并把它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辉实践，是对共产主义真理性的最全面、最突出的检验，它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巩固和发展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共产主义的真理。它证明：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民主的政治制度；剥夺剥夺者，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实行共产主义教育，发扬共产主义道德、纪律和劳动态度等等条件，是能够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经过这次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经过这次革命的实践，列宁总结十月革命和初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⑦等著名原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理论。

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是又一

次对共产主义真理性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检验。它以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同条件下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条件是能够实现的，证实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用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和平方式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形式；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等，都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

当然，不论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或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都发生过不少的失误和错误，都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失败实践；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我国关于人民公社的实践，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都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甚至严重的破坏。但这决不是证明了共产主义理论的不正确，而恰好是证明它违背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譬如，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屡次失败，就不是证明

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原理有什么错误，而恰巧是因为它背离了工人阶级不能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议会斗争形式当然可以利用，但正如列宁所说，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发生那么一些失误和错误，也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原理有什么错误，而正是因为“左”倾思想的指导，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偏离了共产主义的航道。当我们党批判了“左”倾错误思想，清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康生等人的假共产主义，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时候，我们的建设事业和各方面工作就又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正反两方面实践的对比、检验，就更全面更深刻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的真理性。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丰富和经受检验的。实践是共产主义生命力的真正所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发展是如此，高级阶段的实现和发展也不会例外。说“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完全违背了历史和现实。对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来说，它是对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否定，是对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流血牺牲的英雄事迹和千百万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光辉业绩的否定，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说来，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

诚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制度，如单一的 全民所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阶级差别的彻底消灭，国家的消亡，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本质差别的最后消失，等等，的确基本上还没有实现，它的真理性，当然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予以完全证实。但能否因此而说它就是“渺茫的幻想”？就同实践无关或丝毫没有经受实践的检验呢？能否因此而否定它的真理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

首先，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虽然没有实现，还是一种设想，但它决不是空想，而是科学的预见。它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样，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如前所述，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关系进行科学分析，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中合乎逻辑地揭示出来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因而是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的。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⑧“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⑨这个结论，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作出它的时候，并没有为实践所检验、证明，但它具有客观真理性，因为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过了半个多世纪，当列宁重申这个结论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已经检验、证实了它的真理性。同样，当列宁作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论断时，也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但它同样具有客观真理性，因为它以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为依据，符合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俄国十月革命，随后还有中国等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反复检验、证实了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科学预见，当然还只能是总的方向和基本的原则，而不可能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还是要从人类现在和以后的实践中去发现和总结出来的。但对它的客观真理性是不应该怀疑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检验真理，并不能说只是证明或证实真理、完成真理，而更为积极的是修正、丰富、发展和完善真理，同时科学地预见真理。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就包含着扬弃，即抛弃过时的不适用的因素，吸收新鲜的积极的因素，使真理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共产主义真理是一个总体和发展过程，它的生命力并不只在于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证实为真理，更为根本的是在于它把握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预见发展的进程，指导实践，使真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发展为更高的真理。如果共产主义真理经受实践的检验，只是证实自己为真理，而不是为了指导新的实践，夺取新的胜利，发展为更高的真理，那么这样的真理就是没有强

大生命力的。

第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制度是要从低级阶段的社会制度中逐步形成的，而不能主观地设想出一套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主义必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作为完整统一的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就在为高级阶段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制订并执行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状况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做好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巩固、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满足并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创造条件。因此，完成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也就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必然步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是形成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宝贵资料 and 重要条件。这些资料积累得愈丰富，条件愈充分发展和充分成熟，就是愈来愈向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接近。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就是空话。把建设社会主义和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创造条件统一起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创造和积累条件，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将来的实现，就不是一般的可能性，而是有了充分现实根据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管要经历多么长的时间，花费多么大的代价，最终则是必然要变为现实

的。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可以混淆。但社会主义既然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就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不能截然分开，而必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必然或多或少孕育着某些共产主义的因素。譬如，拿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同共产主义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有区别，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作为共产主义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就不能说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因素。再就分配制度而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无疑有质的不同，但“各尽所能”则是共同的，就不能说根本不是共产主义因素。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如公费医疗、劳保待遇、粮油住房补贴等，应该说都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具体表现。各条战线出现的许多自愿的、无定额的、不计报酬而忘我劳动的先进分子，各行各业大量涌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集体、牺牲个人、救助他人的英雄模范人物，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等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同样是共产主义因素的表现。至于党和国家进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的教育，提倡并加强共产主义道德、纪律、劳动态度的教育和要求，就更是直接的共产主义因素了。这些共产主义因素不仅同现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不相矛盾，而且是执行现行政策不可缺少的因素。这是社会主义本身必然孕育着的共产主义幼芽，是新生事物，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这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证实的共产主义因素，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根据。这些共产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壮大，经过长期积累和好多代人的努

力，最终形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事实如此，道理若是，怎么能说“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呢？又怎么能说是“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呢？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这么多国家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积累了如此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因素，还有什么理由来怀疑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呢？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任务长期而艰巨，就降低或丧失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信心；也绝不能因假共产主义的歪曲、干扰和破坏，而对共产主义怀疑和动摇；更不能因自己享受不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或因自己受了某些委屈或迫害，就灰心丧气，自暴自弃。我们应该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终实现是毫无疑义的！为子孙后代享受共产主义美好的幸福生活而献身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地告诫说：“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和讥笑”；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⑩毛泽东同志阐明的这一光辉思想，对于指导我们“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逐步向共产主

义社会迈进的实践，无疑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

- ① 《马恩选集》第3卷，第409页。
- ② 同上第1卷，第40页。
- ③ 同上第1卷，第210页。
- ④ 《马恩全集》第4卷，第312页。
- ⑤ 《马恩选集》第2卷，第374、375、372页。
- ⑥ 《马恩选集》第4卷，第392页。
- ⑦ 《列宁选集》第4卷，第399页。
- ⑧ 同上第3卷，第243页。
- ⑨ 同上第4卷，第347页。
- ⑩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8页。

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 在我国的新发展

王伯惠

当我们隆重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联系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实际，学习马克思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感到格外亲切，感到这一理论非常正确而伟大；也感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国广大农民创造和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在实践上取得巨大成就，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的自愿互利和民主的基本原则，是这一基本原则的新的展。

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如何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向共产主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指明了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方向。恩格斯说：“……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①重要问题还在于如何引导广大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

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②恩格斯也指出：“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③这就给农业合作化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和民主的原则，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我们党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光辉理论和我国的长期革命实践，提出我国搞农业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民主的原则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指出：

“……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并强调指出：“在处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上，有一条原则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就是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④以后我们党又响亮地提出了“民主办社”的号召。这样，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的自愿互利和民主的原则，就在我国得到了光辉的运用和发展。回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合作化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归根结底都是由于能够坚持并具体发展这一理论的胜利；其间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也是由于违反甚至破坏（如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做的那样）这一理论的结果。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支持群众的首创精

神，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为欣欣向荣，广大农民多年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过。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的伟大创造。企图坚持过去那些“左”的东西的一切阻力，都在它的面前碰壁了，都被它冲垮了。农民所以要自觉创造、自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首要原因，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群众取得了生产和经营上的自主权。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在集体管理和某些统一经营（如机耕、水利、植保、防疫、制种、配种等）的帮助下，农民以户或小组承包为基础，充分运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慧，放手发展生产，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真正变成了生产和经营的主人。有了生产和经营上的自主权，加上多劳能够多得的包干分配，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能够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行自觉地劳动。不用催，不要叫，不打钟，不吹号，广大农民都能自动起早摸黑，见缝插针，竭尽全力，千方百计，精心从事和提高各项农业和工副业生产。这种自觉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成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会越来越大，甚至是不可估量的。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经营和自觉劳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村出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新形势。在农民承包经济和自营经济的商品生产率普遍提高的同时，涌现出大批重点户和专业户。农民，特别是重点户和专业户，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商品生产，就必然产生进行新的经济联合的要求，各种新的经济联合的组织或经济联合组织的一些雏形，也开始出现。农村的新的合作经济或者是新的合作经济的一些

雏形，都是农民群众根据生产的需要进行的新的自愿的经济联合。农民有加入的自由，也有退出的自由，不管是户与户之间的联合，还是户与集体、国营企业的联合，不管是与农业部门还是与工业商业部门的联合，加入联合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迫另一方。这些经济联合通过合同联系起来，合同是由双方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平等协商制定出来的，没有什么强迫命令的东西。

由此可见，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群众自觉创造，自愿实行，生产和经营上的自主权的实现，进行自觉劳动，到自愿进行各种新的经济联合，都充分体现了、而且具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的自愿原则。

自愿离不开互利，自愿的核心，是能够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能够真正实行互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基本上平均承包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以后，生产成果的大小和自己收入的多少，就主要取决于自己劳动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它彻底砸烂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实行了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使农民积极进行生产，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在此基础上，农民之间，除了对五保户、困难户、烈军属的必要的集体照顾外，谁也不能因为自己劳动差或不劳动而实际上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分配这个根本经济利益上，真正做到大家都互不侵占。农民之间进行劳动和技术的互相协作，进行各种新的经济联合，也是真正自愿互利，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办事，实行等价交换。对于群众自愿入股的资金、财产等，合理付给一定报酬，谁也不能无偿占有或平调他人的财物，克服了过去吃大锅饭时一些干部

进行混水摸鱼的弊病。集体扣留多少，干部补贴多少，既有合理的数量限制，群众又看得一清二楚，有利于减轻群众负担和实行群众监督。农村基层干部的经济收入，除一定的合理补贴以外，主要依靠自己的承包经济和自营经济，依靠自己的劳动，这样，就使基层干部和社员进一步建立起经济上的平等互利的关系。

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配原则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就进一步建立起一种国家、集体、农民真正互相兼顾的互利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这样一种互利关系。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的收入增多了，生活改善了，给国家交售的农副产品增加了，国家除农业税以外的其它税收增加了，工业品的销售也增加了，集体的实际提留（主要是公益金和各项补贴以及一定的公积金等）许多地方并未减少，有些地方还在逐步增多。总起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农民个人物质利益和互利原则基础上的。因而这个基础是非常巩固的，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就使农民得到和充分享有经济上的民主，在国家计划指导和集体的领导之下，农民在生产、经营和分配上，都有了自主权。干部不能在经济上平调，进行瞎指挥，只能平等待人、民主协商和民主讨论，进行示范帮助和说服教育，这就进一步调动了农民政治上的积极性。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政策，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积极学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做

出新贡献。这种政治上的热情和积极性，又反过来巩固和推动经济上的民主，使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 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精神，是要通过农业合作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基本上符合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是公有（集体所有）的，承包者只有使用权。生产和经营虽然主要是以户或小组为单位进行的，但基本上要服从国家计划（总的生产计划和农产品交售计划）和集体合作经济统一经营计划的指导，并且保持了集体合作经济统一经营的某些优点。它实行包干分配，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它在生产和经营等各个方面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人与人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合作互助的生产关系。

与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存在的农民自营经济正在发展，个体经济也在出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它们中的相当部分将会自愿地而不是勉强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结成新的合作性质的经济联合。农村这些多种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发展，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必然规律。我国农村的生产力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贫困面貌没有根本改变，人多地少的矛盾相当突出，各种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利用。农民自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农村多种经济形式，能够在非常广泛的规模上和极大的深度上，发挥农村的劳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农村

商品生产和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商品交换，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农村的这种多种经济形式，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占主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领导之下的，多数是依附于集体的承包经济，要完成国家征购、派购和税收任务，要服从社会主义市场管理，同供销社、信用社、农业专业服务机构挂钩。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并坚决打击各种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它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就要注意消除多年来形成的以下这些“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

一是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

二是把集中劳动、按劳动日分配，看成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特征，把它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混为一谈。

三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等同起来，认为家庭经营同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完全不相容的。

四是片面地追求单一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否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前提下的多种经济形式。

五是把平均主义与共同富裕混为一谈，把富裕程度的差别同所谓“两级分化”混为一谈。

六是把现在的中国农民同小农经济时的农民混为一谈。

七是把党的领导同党的群众路线对立起来，根本不尊重群众在党的长期领导下培养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三) 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了长期社会实践的严格检验，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因为它适合我国的国情，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状况；适合人口多、耕地少、自然资源比较丰富，需要精耕细作和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特点；因而它把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调整和改进到互相适应的良好状态，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和发展，再一次证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历史唯物论观点的无比正确性和无限的生命力。生产关系必须首先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历史规律是谁也不能违反和抗拒的。

注：

- ①《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70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5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
- ④《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1页。

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发展 趋势、特点和利用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朱楚珠 段兴民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虽然逝世已经百年，而他的思想却永放光芒。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們取得革命政权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分析和利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解决得不好，就会成为我们前进中的大包袱。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问题的一般原理，对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利用，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作为对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

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①“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②因为，“活劳动不可能从无中创造出任何东西，”它“必须找到它的客观条件。”^③同样，“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

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④马克思这些关于劳动问题的一般原理，正是我们现在经济建设中所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的。从当前我国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实际状况来看，我们的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而生产资料则显得不足。这就使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结合成为困难。当然，二十几年以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之间结合的困难仍然会有，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可能与现在不同，即劳动力数量由于人口因素而急剧下降。因此，对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分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及早采取措施。

一 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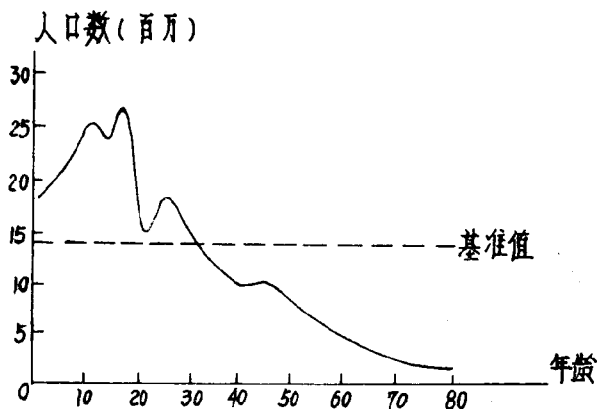
劳动力资源是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的那一部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进入劳动年龄和退出劳动年龄的时间也不一致，本文中以20—54岁为考察区间，55—65岁的人口，作为过渡性劳动人口来对待。

劳动人口既是总人口中的一部分，所以，一国人口再生产的趋势就决定了劳动人口的变化趋势。现有的劳动人口

数，取决于已往20至54年间的出生水平和历年的死亡水平，而20年后的劳动人口数，又受今天的人口增长状况和往后20年的死亡率水平所决定。

我国30多年来的人口再生产状况是总人口增长迅速，从解放时的5.4亿增加到1982年的10.3亿多（未含台湾），且在某几年自然增长率很高，致使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峰型分布及年轻型的特点。

所谓峰型，就是人口年龄分布出现集中在某几个年龄的状况。我国人口年龄分布状态的基准值（总人口数／平均期望寿命）应是1400多万人，然而1953年、1963年、1968年左右出现三个生育高峰，这几年生育的绝对数在2000—3000万人之间，大大地超过了基准值，这样，人口的年龄分布也就出现了峰型。1980年的人口状态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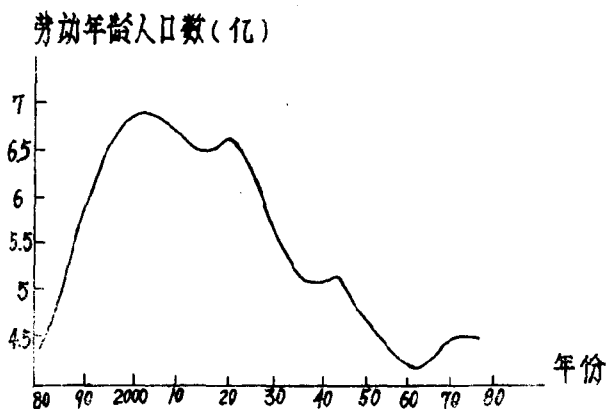


所谓年轻型，就是指我国人口构成中年轻人多，一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指一定地区的所有人口中一半人口的年龄

在此年龄数值之上，一半人口的年龄在此数值之下，亦即在此中位数年龄以上或以下的人口数各占50%），能够反映这一问题。发达国家年龄中位数一般在26—30岁，而我国在21岁，意味着我国总人口中一半人在21岁以下。

由于峰型、年轻型人口的特点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交织在一起，加之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往后一百年内我国人口发展大致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从现在至2010年左右，根据每对夫妇平均按1.6胎的生育方案预测，总人口数一直是上升趋势。从2014年开始，总人口数逐渐下降，到2080年左右，总人口在93000万左右，进入静止人口阶段。

上述人口发展过程决定了我国劳动人口的变化趋势，我国劳动人口数在一百年内的分布，可以作出如下曲线：



这条曲线向我们显示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状况在今后一百年内的几个特点：

第一，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今后一百年内，我国劳动人

口数的最低限是41000多万,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均在1000万以上,在世界各国对比中,我们确属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目前,这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是分布在广大农村。

第二,我国劳动人口在今后一百年内在年际上的分布极不均匀。首先,由于人口状态的峰型,劳动人口数几乎年年处在变化之中,多多少少,各年不一。其次,劳动人口在年际上的分布也呈峰型,从上图看出,从1980年至2003年,劳动人口数呈很陡的坡形一直上升,达到绝对数66000多万的高峰。而从2003年以后,劳动人口又呈下降曲线,至2065年下降到最低点,形成绝对数在41000多万的谷。峰顶和谷底的劳动人口数相差很大,约为25000万人,上升和下降都相当急剧,尤其是上升曲线很陡,从1981年至2003年的23年中,急剧地增加22000万劳动人口。

第三,我国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国外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一般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50%左右,我国目前为43%,往后20年中,比重逐渐上升,到2003年左右为56%,这就意味着在今后23年中,我国每年劳动人口增长数超过总人口增长数,大体上劳动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130万人,而总人口则每年平均增加1000万多一点。2003年,情况就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将产生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大于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的情况,随之,社会负担系数也增大。

二 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利用

(一) 把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转化为发展经济的

优势

特点不等于优势，弄得不好，还会变成包袱。我国劳动力资源已经丰富到相对过剩的程度，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即劳动就业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压力，又加之我国人口年龄构成轻，在今后的二十几年里，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数均在1000万以上，劳动人口总数急剧持续上升。这就提出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即：怎么样使劳动力丰富的特点不变成包袱而是把它转化为发展经济的优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只有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因为，“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⑤这就要求我们把丰富的活劳动变成物化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⑥我们必须明确，不论是前十年的准备时期，还是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时期，劳动就业问题都是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把活劳动变成物化劳动，把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转化为发展经济的优势。

要完成这个由特点到优势的转化，我们认为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纵的方面观察，要从长计议。因为我国人口再生产过程的规律性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文所探讨的一百年之内），劳动力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是2003年左右，将是我国有史以来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时期，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在相应的时期内受这个特点制约。

第二，从横的方面观察，要注意关联因素。因为劳动力不过是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条件，劳动力要发挥作用于生产过程，还必须有其他条件的配合。比如资金条件、土地面积、自然资源、技术基础等等。

第三，从纵横两方面综合观察，要瞻前顾后。因为我们在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前进的，三十多年来，我们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一定的基础，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们过去工作方面的某些失误或不可避免的问题会给今后经济建设发生某种影响。

鉴于这三点，我们认为要完成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到经济发展优势的转化，应从下面几点着手：

第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但我们有不同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国情，所以，我们在发展现有的大型的高度自动化的企业时，同时要充分注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包括劳动密集的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服务业等。这样，能克服因资金不足短期内不能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的弱点；针对耕地少但广大农村中各种自然资源丰富的现状，高效地利用现有的物质基础和就业条件，使成千上万的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有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机会，让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我们认为这是

一条可行的路。日本在现代化的1955年—1970年，也曾大量发展投资少，用人多，利润高的劳动集约型工业来吸收劳动力。这十五年中日本的纺织、服装、金属制品、一般机械及建筑五个部门设备投资总额，每年一般只占该年私人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几，如1965年占3%，1970年占4%，而它吸收的劳动力却占总劳动力的1/5以上，共吸收450万劳动力。在我国，发展劳动密集性经济，是一种以我之长，克我之短的发展我国经济的途径。通过这条路，可以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为优势，转为资金和财富，转为国力。

有人说发展劳动密集行业，大量劳动进入生产领域，社会劳动生产率要下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看，可以这样考虑：①劳动密集的同时，要注意提高现有劳动人员的智力、技术水平，以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发挥我国传统的深耕细作的耕作方法，使劳动力与土地等自然资源结合好，不浪费自然力，同时，推行科学种田，尤其要发挥解放以来培养的陆续进入农村的一亿五千多万初中毕业生的作用，发掘这个庞大的智力资源。在工厂，要注意加强在职工工业余教育，争取在生产的技术构成没有甚大变化的条件下，由于发挥了劳动力的作用，而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社会财富。②提高对劳动力的管理水平。要建立一整套工农业生产责任制，明确经济责任，奖惩分明，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管好劳动力，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作用。③我国劳动生产率发展到目前的水平，面对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和已有一定物质技术基础的情况，可以在一定时期内用增加对活劳动的投资来扩大劳动积累，只要真正做到劳动力能够与生产资料结合，那么，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除了自身消费

外，总是有剩余产品的。社会财富会随劳动量增加而增加，从而有利于资金积累。退一步说，社会上大量人口已进入劳动年龄，你不安排就业，他同样要消费。而一安排就业，总会有剩余产品（以上这种办法，不适用于原材料紧张和能源消耗大的产品生产，因为那样对社会来说是不利的，也不能过多地安排在服务性行业，这个问题在下面再作讨论）。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曾经走过了这样一段路。1955年至1970年间，日本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了6.6倍，而同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却只提高了不到3倍。它也是用扩大生产规模的办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仅1960年——70年，它的工业部门就吸收了661万劳动力就业。日本正是利用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利用了低工资——这个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垄断性的“武器”，从国外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这也正是日本现代化资金来源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如果有关工作做得周到，决策正确，就有可能做到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安排大量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的同时，不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为社会积累日益增多的财富。

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行业，要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发，采取适宜的政策。由于我国以往忽视服务性行业，不仅没有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而且还减少了，所以，在往后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多发展一些，这是带有恢复性质的发展。但是，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服务性行业都是随工农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是以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为前提的。如美国、日本的所谓“第三产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大幅度上升，也是近十几年中发生的事。美国在1970年才占25.1%，到1977年，急剧地上升到69.8%。据美国未

来学家科恩估计，1985年将上升到71.1%。日本在1950年时，占27.1%，经过二十多年，到1975年，上升到52%。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业没有过关，而服务性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吃、穿、用，首先要靠农业来供应。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对各行各业的发展规模的限制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服务性行业。所以在服务性行业发展中要有一个量的概念。目前有的人存在一种误解，常以现时经济发达国家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来说明我国服务行业需大大发展，我们认为这并不妥当。我国的服务性行业到底发展多少，能吸收多少人就业，为国内服务的服务性行业与生产人员保持多大的比例，为外贸、旅游服务的又应怎样发展，发展多少，都要由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决定，都要有一个量的概念，寻求其中的规律性。

第二，改革现行的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十分不利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转正临时工，取消合同工，用工制度越搞越死。既不利于调动现有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又不利于解决更多的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就业，堵住了他们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多种渠道。同时也使劳动力的转移极端困难。因为，在现实的生产发展中，必然会出现某些行业需要劳动力多，某些行业需要劳动力少，然而“铁饭碗”则使需要多的很难增加，需要少的减不下来。

改革用工制度的关键是个“活”字，要灵活多样，要敞开国营、集体、个体三扇门。即就是国营企业，也应多用临时工、合同工，少用固定工。当然保持一定数量的固定工是必要的。

在改革劳动制度，用工制度时，要注意劳动服务公司这一新生事物。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一是要不断地建立健全劳动服务公司，一是要充分注意劳动服务公司在改革劳动制度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第三，打破传统作法和传统思想的束缚，积极组织劳动力出国服务。

总之，对众多的劳动人口能否顺利地转变为劳动力投入各经济部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有困难，但只要认真对待，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二）根据我国劳动力资源在年际上分布不均匀的特点，规划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我国劳动力资源在年际上分布不均匀的特点具体的表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劳动人口数年年变化，时多时少。今后一百年内，有几年是近三千万，有几年是二千万出头一点，有几年是一千多万。据此，我国应建立一种对劳动力的吸收具有相当灵活性的经济类型，以适应劳动力资源数量常常变化和劳动力资源数量多的年份与少的年份交错出现的状况。这样的经济类型，应该是：（1）在企业结构上，除了一定数量的大型企业作为骨干以外，要建立大量的小型企业，以及为大型企业服务的附属加工企业，这样，不仅可节约资金，而且经营比较灵活，可以随产品的市场需要、劳动力供求状况和经济力量的变化而调整产品内容、生产规模、生产的技术构成。

（2）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在农业人口城市化问题上应有自己的特点。要建立以现代化农村为基地的、农工结合的、以城镇为中心的、小城市群的人口的经济结构，这样的人口经济

结构，既可维持大量的就业人员，又具有比较大的调节余地。因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既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在地，也是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在地，它在吸收劳动力、实现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结合上，具有就地就近的优越性。立足于农村，可以发展多种经营，实行农工结合，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维持经济发展速度，扩大就业能力；同时把劳动人口中占相当大比重的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结合起来，不脱离农村和农业。这样，在根据劳动力资源数量的变化，调节工农业、城乡人口的比例时，有较大的弹性。

第二，今后一百年内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变化有一个上坡（1981—2003年）和一个下坡（2003—2065年），上和下的坡度都很大。因此，我们在今后一百年内的经济发展中，将在相应阶段，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

从现在起到2003年这25年中，劳动人口总数是年年上升，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在1000—2000多万之间，尤其是1995年前，一直维持在2000多万的水平，有的年份，如1983年，则将近3000万，2003年总劳动人口数为66000万。这就是说，在今后23年内，我们面临一个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任何国家遇上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都很困难，而我们目前经济又比较落后，资金缺乏，就业岗位不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多种途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在第二部分已经论及，不再详述。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1）我们对这几个问题的认识必须全面。一方面，在安排就业上存在压力，有困难，但也必须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国劳

动人口上升数超过总人口上升数，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世界上只有很少数几个国家如日本出现过这种情况。以往30多年，由于人口增加迅速，被扶养人口不断增多，消费基金年年增加，积累上不去，势必从总体上造成经济工作十分被动的局面。而往后的20多年，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人口增长控制的较好，人口投资相对减少；同时，已往30多年所扶养的新增人口已长大成人，到了可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的年龄，这是人口投资的“收获”季节，我国整个社会将是干活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被扶养的人口不仅相对减少，而且绝对数也在下降，到2003年时，将降到51000万人，比今天的被扶养人口数还低。从扶养系数的变化来说，应该看到从现在到2003年左右，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摆脱被动进入主动的时期，尤其是2003年左右，这个变化达到顶峰，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由于社会扶养系数的变化，在人民生活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即使劳动生产率照旧，用于积累的资金也会大幅度上升，这本身就为就业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我国两种生产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这是一个美好的前景。^②我们要选定主攻方向。今后二十多年，我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急剧上升的领域是农村，这是由过去二十多年的生育情况决定的，至今农村生育率比城市还高得多。目前看起来，城市劳动人口就业与未就业的界限很明显，所以人们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可是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却是在农村，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6—7倍于城市，现在已是三亿农民种15亿亩耕地，一人只种五亩地。在平原地区更少，一般说平原地区农业劳动力有三分之一是剩余的，要探索一条变农村劳动力资源为

现实劳动生产力的适当途径。近年来农业生产责任制及多种经营的发展，已向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今后农村手工业也需大大发展，它具有投资少、耗能少、用劳多、产品多、易随农忙农闲季节变化而调整的特点。近两年来农村中从事抽纱、刺绣、编织、缝纫等手工业行业的副业生产人员就有近千万人之多，估计还可以通过继续发展农村手工业来吸收农业中的大量富余劳动力。

从2003年至2065年这段时间，我们将遇到劳动人口年年减少的情况，将从6.6亿多万降到4亿左右。尽管这个下降曲线的坡度比前面讲到的上升曲线的坡度要平缓得多，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在生产中把他们消费掉，就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所代表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活劳动与之相适应。”^⑦当然，这不是说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在不同生产力水平和不同质量的劳动人口的条件下，需要的劳动力都是一样的。

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即一个劳动力生产的物质财富总是要大于本身的消耗，在此条件下，假如劳动生产率不变，社会消费水平不变，一国劳动力的急剧减少，应看作是劳动量的减少，对社会是一个损失。由于减少的劳动力并不是立即退出生命舞台，譬如55岁退出劳动人口的领域，按期望寿命70岁来计算，还可活15年，这就是说社会负担系数会因劳动人口的急剧下降而上升，那么，要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结合我国今

后几十年的情况，作一些分析。先让我们以 1978 年的总人口数、主劳力系数、负担系数所形成的人民消费水平为 1，来研究一下今后有关年份对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其情况如下表：

年 份	总人口（亿）	主劳力系数	人均消费水平不变对 劳动生产率的要求
1978	9.58	0.437	= 1
2003	11.81	0.560	>0.78
2038	11.64	0.433	>1.01
2065	9.71	0.430	>1.02
2078	9.32	0.470	>0.93

从表中的数字可以看出：（1）2003年是我国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时期，假如新增劳动人口能全部就业，由于社会负担系数的变化，劳动生产率只要达到1978年的78%，就可维持1978年的生活水平。（2）2038年我国劳动人口数进入“下坡”阶段，由于劳动人口数的减少给社会带来损失，即使维持1978年的人民生活水平，也要求劳动生产率提高1%，假如要求人民生活水平在2038年比1978年提高6倍，那就要求劳动生产率提高6.06倍。（3）2065年是劳动人口下坡阶段的低谷，计算表明，即使人民生活维持在1978年的水平，也要求劳动生产率比1978年提高2%。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必须逐步提高，假定从1978年—2065年的80多年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8倍，那么，就要求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8.16倍。可见我们在2003年后，必须特别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说在2003年以前的劳动人口急剧上升阶段，我们靠大量投入劳动量来增加生产和创造价值，从而使

人民生活水平也能提高的话，那么，在劳动人口急剧下降的阶段，就根本不能采用这种方法，而必须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否则，人民生活水平有下降的可能。

经济发展过程有其连续性，不可能两个阶段截然分开，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我国经济时，把“上坡”与“下坡”通盘考虑。为了在劳动人口数“下坡”阶段使劳动生产率能有大幅度提高，从现在至2003年这段时间要考虑采取下列手段，作为准备。（1）资金储备。大规模的设备、工艺技术更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必需的，为此，就要投入资金。我国在本世纪末就要着手考虑这一问题，要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时期的顶峰（2003年以前），发挥出优势，以多种形式安排就业，为国家储备资金。（2）技术、人才储备。在技术快速发展、设备大量更新的时期，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要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与之配套，因而要有国民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1960年—1975年是日本经济大增长、生产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为了培养人才，它的高等学校教育费增长了10倍。日本教育部门为社会提供的新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1965年时，初中毕业生占41.8%，高中毕业生占46.8%，大学毕业生占11.4%。而到1975年，相应地改变为9.1%、57.3%、33.6%。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美国在1929—1957年间，通过改革教育和科研等手段所获得的成果，占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额的43%，以美国玉米单产为例，过去一直徘徊在200斤左右，玉米杂交种普遍推广后，全国平均亩产达到900多斤。我国现在出生的孩子到2003年，就是主要劳动力，所以，我们

为二十多年后培养人才提高国民教育水平的工作必须从现在抓起，只有这样，到时候才能使大批熟练劳动力投入生产部门，以适应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需要。而且通过教育制度、教育结构的改革，加强劳动就业训练，培养技术熟练、质量较高的劳动力，既可为将来的发展培养、输送、储备人才，又可减少近二十年内劳动就业的压力。这是因为通过教育系统的各种渠道，川流不息地吸收社会上的劳动力，在不断地变普通劳动力为有技术的熟练劳动力的过程中，在教育系统的各种渠道上经常储备了一批劳动力。日本在1960—1965年间，在就业压力增大时，教育系统的初、高中学校竟把平均每年进入15岁以上的153万劳动力中的 $2/3$ （即100万）吸收了进来，不仅减轻了就业压力，并把新增劳动人口培养为熟练劳动力及专门人才，适应了七十年代技术更新的需要。日本的这一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要通过教育为将来储备人才、技术，目前就要适当增加教育投资和研究教育结构的改革，要注意在八亿农民中有30%的文盲和40%的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情况下，目前又出现了小学入学率下降的状况；要注意因对在职职工的教育不被人们所重视而产生职工入学率下降的新问题（据了解，上海市原有71万名职工参加业余学习，占职工总数16%左右，1981年上半年下降到40余万，仅占职工总数10%左右）。从长计议，根据将来劳动力资源变化的特点来规划一下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在教育结构中，多办在职职工教育和农业中学的问题），使教育事业步伐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相适应。

结 束 语

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发展经济的优点，近二十多年中的主要问题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逐步寻找一条发挥劳动力资源作用的道路和办法，变优点为优势，变压力为动力，为国家增加财富，为社会服务，以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在2003年以后，当我国主劳力系数及总劳动人口数由上升转为下降时，主要问题则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及时改变有关经济、技术政策，同时，要从全过程出发及早为这种转变作好必要的准备。这样，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有可能协调，经济发展就有可能比较顺利。看来研究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发展趋势、特点和利用，已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急切而又重要的课题。

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46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7页—208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5页。
- ⑥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单行本，1982年版，第12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62—163页。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赵炳章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了。一百年来，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逐步变成现实，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它伟大的活力。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导师，目的在于沿着他所开辟的历史航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航船推向新的阶段，为人类争取更加美好的前程。在我国，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对此，马、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在理论上曾作了原则的描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

义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 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某些产品的价值”，“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采取“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就是每个生产者向社会提供了劳动，“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①在这个社会里，“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并且“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②整个社会“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③。“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象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④。这些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原则描述，其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第一，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第二，消除商品交换；第三，个人消费资料实行按劳分配；第四，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社会生产；第五，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整个社会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第六，阶级对抗消灭

了，人和人的利益关系是一致的；第七，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这七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质的规定性，是一切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不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都应该而且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今天，尽管社会主义的实践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但是，这些基本原则仍然是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依据。现在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脱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则，另搞一套，而是以这些基本原则为指导，结合实际，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顾自己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完全照搬照套这些原则。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没有穷尽真理，他们只是为社会主义提出了基本原则和方向，而社会主义一定还要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出对各国普遍适用的、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建设的起点不同，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和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条件的不同，因而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存在形式以及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和所采取的管理体制等

也就不完全一样。而且，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支配它的客观经济规律，也不可能被人们在短期内一下完全认识和掌握，必须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摸索时期，在摸索过程中，出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是难免的。其实，只有存在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才有利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便于各国人民更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斯大林领导建设的苏联社会主义，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起了良好的作用。但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斯大林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当做一种固定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中去。许多国家由于没有经验，又不顾本国的具体条件，生搬硬套这一模式，结果脱离本国的实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我国在五十年代前期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有所认识，并力图加以改变。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写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是时隔不久，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中，由于“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不仅一些好的设想没有付诸实践，就连原来许多行之有效的东西，也没有认真坚持，反而把一些“左”的脱离实际的东西，加以推崇和运用。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采取

了类似斯大林的态度，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做法往往加以反对和排斥。这样，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不仅严重的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有损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事实说明，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要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单纯强调自己的实际，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都是错误的，都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危害。

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尽快发展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凡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都是可行的，应该采取的。其次，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如果一种经济模式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反而有损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完善，那就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加以采用。最后，要有利于劳动者当家作主，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那种束缚和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有碍于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经济模式，也绝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加以采用。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尽快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三)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

些什么特点？这些都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我国的具体条件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而来的，原有的基础很薄弱，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人口又很多，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形式必然和其他各国不同。其主要特点是：

（一）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的情况，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存在其他占有形式。斯大林根据苏联的实际情况，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提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可以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当时的苏联，虽然个体经济也存在，但总体上对它是排斥的，不允许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而存在。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和斯大林的实践相比较，我国采取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不能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所有制是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特点的主要因素。

我国之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由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状况决定的。我国现阶段，既有相当数量的现代化大生产，也有一定数量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生产，还有半机械化半手工劳动的生产，甚至还有许多使用简单工具进行的手工劳动生产。为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必须采取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即国营经济形式发展经济。为适应农村主要依靠手工、畜力进行生产的要求，在农村则须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主要通过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形式)发展生产。为适应一些轻工业、手工业、服务行业等半机械化、半手工劳动的要求,必须在城镇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为适应城乡单纯手工劳动的要求,也必须让个体经济有适当的发展。

在这些经济形式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保障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且保障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定性条件。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农业中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在工业、手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也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着很大的作用。除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基础作用外,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弥补国营经济之不足,为社会提供丰富的商品和各种必要的服务,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又可以吸收城镇大量闲散劳动力参加生产和服务工作,扩大就业;还可以扩大出口物资,换取更多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同时,城镇集体经济具有适应性强和经营管理比较灵活的特点,能够及时满足人民的多种需要,所以,在我国现阶段必须重视这种经济形式的发展。

个体经济主要是个体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修理服务业。它是劳动者或其家庭直接占有、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并和自己的劳动力相结合,单个进行产品生产的一种经济形式。它具有独立的小商品生产的特点,但同过去的小商品生产不一样,它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其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经营规模、原材料的来源以及价格的高低等,都受国家计划的影响和指导,可以说它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小商品经

济，是一种新型的小商品经济。它的存在和适当发展，有利于活跃市场、方便生活、解决就业，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

可见，在我国现阶段只有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才符合我国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繁荣城乡经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形式。

（二）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运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组织和发展社会生产，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⑤。“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的分配和管理，并且通过有计划的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⑥。但是，究竟按什么样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使生产力及其产品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很快的增长，满足每个人的一切合理需要？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具体解决，实际上也不可能具体解决，因为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际上是按照“统收统支”的原则组织生产，同时主要依靠政治和精神的推动力量发展生产，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起过好的作用，但是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很有限的。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农业、工业、建筑业、商业等部门中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创造

了良好的形式。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农业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工业、建筑业、商业中的各种经济责任制，都是以责为核心，以责定权，以责定利，把责、权、利统一起来，把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放在首位，按照国家计划和社会需要组织生产，取得了显著成效。

就农业生产来说，由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业生产由长期停滞不前走向欣欣向荣，近几年来在遭受旱涝灾害的情况下，全国农业总产值却以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六的速度持续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向国家提供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日益增多，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显著改善，特别是许多多年无法改变的贫困地区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为什么联产承包责任制会发生这样大的威力呢？这是因为这种生产责任制，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和劳动报酬直接地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责、权、利结合了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瞎指挥的弊病，把出包和承包，即把集体领导者和农民放到了平等的地位上，而且用合同制的契约关系固定下来，使农民真正变为生产的主人，掌握了生产的主动权，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有效地切合实际地进行生产，充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将会出现各种专业承包组和专业承包户，也将会有许多农民自动地退出土地，就地专营其他各业，从事商品生产。这种“离土不离乡”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扩大

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范围。预料在不远的将来，会在我国农村逐步形成许多新型的、工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中小城镇，成为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活动的中心。这可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和特点。

再就工业生产来说，由于经济责任制的推行，也带来了显著成效。例如首都钢铁公司，实行经济责任制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同实行经济责任制前的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相比，生产规模基本没变，平均每年实现利润由一点四六亿元增加到三点〇五亿元，提高一点〇九倍。为什么工业生产推行经济责任制会有这样好的效果呢？第一，它能够充分地发挥企业现有的物质技术基础，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能动地发展生产；第二，它把国家扩大给企业的权力扩大给全体职工，使每个职工直接承担主人的责任，行使主人的权利，发挥主人翁的作用；第三，它把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职工把关心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同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实现这些利益而努力生产；第四，它能克服企业不讲效益、不计成本、不关心技术的弊病，促使职工围绕经济效益钻研技术，提高业务，精打细算，完成自己的经济责任；第五，它使企业上下左右，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如同“钟表一样工作”。

除了农业和工业之外其他部门如建筑业、商业等，凡是推行经济责任制的，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无论是农业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其他部门推行的经济责任制，都显示出了伟大的活力，可以说解决了我国社

会主义如何有效的发展生产的大问题，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形式相比较，这不能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三）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管理体制。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国民经济各部门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社会计划，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生产。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虽然承认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总体上他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排斥市场作用的。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的程度都比较低，计划工作的精确性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社会需要的、不断变化的、千差万别的具体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完全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计划内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顾这种客观实际条件，硬把社会需要的一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纳入到一个计划中去，不仅容易脱离实际，达不到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的目的，而且会影响许多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同时还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还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体制不是完全的计划管理体制，只能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和同斯大林的实践相比，也不能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是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主体；不作计划，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安排生产，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生产和流通是辅助的或从属的。在具体管理形式上，对国营经济中关系

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即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组织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集体经济中一些重要产品的征购、派购，如粮食和其他重要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也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要求必须完成。由于我国还存在多种经济形式，由于对社会各种复杂要求和大量企业的生产能力难以作出精确的计算等原因，除了实行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实行指导计划，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保证其实现的计划。具体地说就是国家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和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都很强，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计划把它们都管起来，只能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实行市场调节，国家则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工作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使这类产品的发展也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

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采取上述多种形式管理经济，既不同于我国过去那种统得过死的计划管理体制，更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可以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灵活多样的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这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便于克服产销矛盾，及时满足劳动者多种多样的需要，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四）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把这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和战略方针，这也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马克

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他们预测未来的共产主义，“人们自身以及他们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⑦。到那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大提高了，劳动者个人得到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把高度的精神文明当做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明确提出来。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时，也往往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以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实践证明又是不够全面的。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状况，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把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必须重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由精神文明本身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的。

精神文明的发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尽管必须以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一定满足为基础，但是它对物质文明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作用既表现为物质文明的建设要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保证其发展的方向，也

表现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实际上是科学文化知识的“物化”。在一定条件下，科学文化知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转化为生产力，成为人们改造自然的工具。同时，精神的、道德的力量也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推动作用至少可以表现为：科学文化知识可以较少地受到社会因素的阻碍，容易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先进的政治思想可以调节政治领域的各种矛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可以保持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旺盛精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可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推动力量，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作为精神文明中的文化建设，即教育、科学等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旦应用于生产实践，就是强大的活跃的社会生产力。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够为社会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一个科学技术落后，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度里，要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就社会主义本身来说，高度精神文明是它的本质属性之一。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崭新制度，不仅在于它能创造比以往任何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在于它有崭新的社会风貌，具有以往任何社会所没有的共产

主义道德风尚。全体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新型关系，这与以往社会相比较，是最高尚不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没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即使建设了社会主义，也是一个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或者是缺乏灵魂的、没有崭新面貌的社会主义。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具体内容当然是多方面的，决不是上述四条，本文只是摘其要者略加论述，不可能一一论及。不管这种特色表现多少方面，究其实质，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就要沿着马克思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航向，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注：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5页。
-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8页。

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 在我国实践

李 平 安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认真总结一下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在我国的实践经验，对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二十年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所得出的重要科学成果。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再生产理论是“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①。并指出，这个研究“理论阐发得确实是精辟高深”^②，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更严密的科学基础上。这个理论的创立，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而且也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许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原理；关于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及其关系的原

理；关于把社会再生产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把扩大再生产划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原理；关于把国民收入划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的原理等等。这些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十多年来，我国对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实践，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对再生产理论是比较重视的，突出地表现在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安排基本上是合理的，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经过详细算帐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都是经过调查一个一个落实的，做到了各个环节的衔接按比例发展，基本上达到了综合平衡。1957年我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3.3%，轻工业占30.1%，重工业占26.6%。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0.9%，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5%，没有发生过生产下降的情况。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的三年大跃进时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前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党内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一些同志不谨慎了，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了，不重视两大部类发展的比例和平衡条件了。认为再生产理论离现实斗争较远，懂不懂无关要紧。因而不管什么比例不比例，平衡不平衡。编制计划是“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即先提出一个钢产量的高指标，然后再以此推算煤、电、运输等部门指标，遇到原料、燃料等不足的时候，常常要农业、轻工业让路保钢。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

系。比如,1960年,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总产值的20.1%,轻工业占26.6%,重工业一跃而占53.3%。所以,1958年以后的三年内,重工业生产增长两倍多,而农业生产却下降了25%,使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倒退。1962年到1965年,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下决心压缩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大幅度地压缩投资总额,缩短基本战线,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平衡。到了1962年国民经济就开始好转,1963年基本恢复,1964年有大的发展,1965年全面好转,市场活跃,国家恢复了元气。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林彪、“四人帮”煽动全面内战,使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又遭到了破坏,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针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改革,使国民经济逐步向比例协调的方面迈进。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把《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这本书,作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通过这几年的学习,使广大干部对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都能努力运用所学的基本原理,研究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国出现了学习、运用再生产理论的热潮。由于调整方针的正确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所以使积累率逐渐有所下降。1981年使积累率从1978年的36.5%下降到28.3%。1981年用于扩大再生产

的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82.6%下降到58.8%。轻工业投资由1978年的6.1%上升到10%。重工业由50.9%下降到40.3%。

从我国对再生产理论实践的曲折过程来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到再生产理论至今仍然是新鲜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它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将永远闪烁其科学的光辉，对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结我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我们国家具体运用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运用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出发点。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是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运动规律的理论，基本原理虽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各自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所以，在具体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时也就必然不同，如果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照搬照抄，肯定是要吃亏的。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1957年，陈云同志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状况和过去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所以，我

们在经济建设中运用再生产理论，就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概括讲，就是人口多，文化落后，底子薄，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我国是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大国。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国家有八亿农民这样大的问题。十亿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23.5%。职工中间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占40%，初中程度的占40%，受过大专教育的只有3%。我国土地面积按人口平均每人只有14.5亩，比世界平均每人49亩低得多。耕地面积平均每人只有1.5亩，比世界平均每人四亩要少一半多。我国不仅农业资源不足，而且农业生产落后，八亿农民搞饭吃就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还是以手工工具进行生产为主，提供的剩余产品很少，每年粮食生产的净商品率只有15%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非农业人口和工业等方面的用粮。工业虽然有了一批现代化企业，但总的来说，技术装备还是落后的，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还不高，提供的剩余产品也很有限。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实际，也就是运用再生产原理的出发点。计划工作的任务就是要针对我国当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依据再生产的原理，找出他们之间适当的比例。求得综合平衡，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此，就要破除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如表现在经济结构上，过去形成的以重工业为中心，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的问题；表现在经济管理上的权力过于集中，吃“大锅饭”的问题。这就束缚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经济僵化，产销脱节，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说，从中国国情出发，就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第二个问题是，坚持两大部类发展的比例和平衡关系的原理，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马克思根据社会最终产品最终用途，把物质生产部门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Ⅰ部类）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根据资本主义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的特点，又把每一部类的产品从价值上分为三部分：不变资本 C ，可变资本 V ，剩余价值 m 。为了实现社会产品各个部分的价值补偿与物质补偿，两大部类之间交换和各部类内部的交换，都必须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

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是社会生产最基本的比例，只有两大部类保持一定的比例和平衡，社会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大体上反映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重工业的产品，主要用于生产消费，基本上属于生产资料的部门，即第Ⅰ部类；农业和轻工业的产品，主要用于生活消费，基本上属于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即第Ⅱ部类。毛泽东同志关于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就是要求通过计划在分配人力、物力、财力时，首先满足农业的需要，并根据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再安排轻工业的发展，最后再根据农业、轻工业发展的需要与可能，安排重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这个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虽然讲了二十多年的农轻重，实际上却是重轻农，几次出现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原因何在？除了“左”的指导思想外，从理论上，主要是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绝对化，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得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第Ⅰ部类要优先增长的结论。马克思从纯粹

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是两大部类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和平衡条件。列宁认为，从马克思的图式中，“根本不能得出第Ⅰ部类比第Ⅱ部类占优势的结论，因为这两个部类在这里是平衡发展的。”^③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是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提出来的。列宁把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引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得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的结论^④。但是，列宁只把它看成是一种趋势，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规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只有在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没有两大部类的平衡协调，生产资料生产就优先不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我国原来的工业基础很薄弱，就搞了156个建设项目，主要是重工业项目，现在看来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1958年以后，我们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把发展重工业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在计划安排上把重工业放在首位，给予尽可能多的资金和物资。使农轻重的比例很不协调，结果，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

另外，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从发展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并以此作为区别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来看，这个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自己缺乏经验，向苏联学习，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究竟是从重工业开始还是从轻工业开始，都应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一概而论。对一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后，就不一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样，对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来说，也不一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看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性质，也不应该以发展重工业的先后来衡量，而是要看它的经济实质。

今天，我们运用再生产的理论，认真总结过去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验教训，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否定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而是为了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一个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使其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服务。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当然也不能片面地认为轻工业所占的比重越大越好，因为轻工业离开重工业的装备也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总之，两大部类之间的增长速度和比例关系，都应该根据各国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而定，不应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去硬套。在我们国家，就是要处理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处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时，要以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为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马克思说：“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质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旧工厂之外添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⑤这就是说，在原来的技术基础上，增加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就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而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挖潜、革新和改造，就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类型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资本主义初期，一般是以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技术的进步，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在社

会生产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生产条件，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客观上要求从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向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

在现实生活中，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过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一讲扩大生产，就要增加人，增加设备和投资，就要上新项目，铺新摊子，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路子，而不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注意对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现在，我国已有近四十万个工交企业，固定资产达五千多亿元。这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前进的主要阵地。存在的问题是，现有企业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赵紫阳同志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热衷于大搞基本建设，集中大量的资金建设新厂子，特别是投资大，工期长的重工业厂子。”以后又明确指出：“在新形势下，要使建设方针来一个根本转变。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主要不是依靠建新厂，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而是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逐步由外延为主转向内含为主，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要从外延为主转向内含为主，就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重视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原有企业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把60%至70%的基本建设投资用于挖潜、革新、改造，是非常正确的。实践证明，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花钱少，见效快。同新企业相比，增加相同的生产力，一般是资金节省2/3，设备和材料节省一半以上，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要

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发展科学技术是我国经济建设从外延为主转向内含为主的关键。当前,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本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只有5%到20%是依靠科学技术,而现在有60%到80%是依靠采用新技术成果达到的。据计算,我们二十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大约有一半要靠技术的进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加工深度和精度,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就可以同样的能源和原材料创造高一倍的价值,使经济效果翻一番。三是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结构。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很不平衡的,既有使用现代化工具的大生产,也有半机械化的生产;既有大量靠手工工具进行的劳动生产,也有极端落后的“刀耕火种”的原始性生产。所以,就不能样样都搞最先进的技术,而必须实行先进技术、中间技术和手工劳动相结合。既要建设一批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产业,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四个问题是,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一个全局性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积累是再生产的源泉,积累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但是,积累和消费也有矛盾,在国民收入有一定数量的情况下,用于积累多了,消费就少了;相反,用于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所以,处理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实质上就是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处

理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

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既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提高，又要保持适当的积累来提高国家建设的能力。陈云同志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是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陈云同志说，人们的生活需要改善，吃饭不能吃得太差了，但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是我们处理经济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建国以来，我们出现两次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处理不好。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使积累率逐步有所下降，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1979年到1981年，国家共拿出1400多亿元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其中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减轻税收负担共520亿元，用于安排城镇就业增加开支105亿元，用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共300亿元。这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几年由于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超过了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是生产增长了，国家财政收入却减少了。1981年比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800亿元，而国家财政收入却减少了117亿元。表现在国家手里没有多少钱，而地方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企业的钱却大幅度增加，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形成国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

不得不向地方、企业借钱的局面。从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在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时，应该掌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人民生活增长的幅度不能高于生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能要求过高过急。如果生产上不去，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人民群众购买力的增加幅度要同消费品供应的增长幅度相适应。如果货币发行过多，超出商品可供量，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市场紧张。三是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比重，以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实践的经验，积累率保持在25%到30%左右比较合适。总之，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既不能用抑制人民消费的办法来不适当地扩大积累，又要保证适当的积累来提高国家建设的能力。

第五个问题是，处理好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既然是研究比例关系的，当然也就包括研究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整个国民经济是计划发展的，也要求人口必须有计划地增长。恩格斯说过：“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⑥。所以说，如果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有计划，而人口增长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就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待人口问题的认

识是有问题的。从理论上讲，错误地认为人越多越好，人多手就多，手多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就能加快建设速度。从实践上看，过去对人口的增长没有进行控制，使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比例失调。三十二年来，全国增长了四亿五千九百四十万人，相当于两个美国或四个日本的人口。1981年，国民收入比1953年增长4.5倍，但按人口平均，国民收入只增长2.2倍，198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比1953年增长94%，而人均占有粮只增长14%，1953年到1981年的二十八年间，我国消费基金总额增长了3.9倍，而人均消费额只增长1.9倍。据统计，1964年以来的十八年间，我国增产的消费资料中，有30%是用于新增加人口，在每年增产的粮食中，有52.7%用于新增加人口。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提高较慢，人口盲目增长是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看到，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每个劳动力给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不多的情况下，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就很突出。同时，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为劳动力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人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如果人口增长过快，青少年占的比例过大，就会给国家、集体、家庭带来很大负担。同时，还要看到，劳动力只有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在经济落后而劳动力过多的情况下，二者结合就会受到限制，就不能发挥劳动力的作用。可见，只强调人是生产者，忽视人是消费者，是片面的，错误的。

由于人口盲目增长过快，给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虽然国家不断扩大职工住宅建设，但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4.2平方米。学校教育和劳动就业问题更大。据统

计，现在小学生有12%不能上初中，初中有50%不能上高中，高中能上大学的只有4%。农业劳动力已由五十年代的1.8亿增加到3亿，普遍感到过剩。城镇每年有500万人需要安排就业，而工矿企业大多数人员已经超编。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我国人口现在正值生育高峰，人口增长过快，不但影响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粮食和住宅的供应，教育和劳动就业需要的满足，都将成为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运用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使物质资料的生产同人口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

注：

- ① 《资本论》第2卷，第25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65页。
- ③ 《列宁全集》第1卷，第69页。
- ④ 《列宁全集》第1卷，第72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6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页。

学习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理论 正确处理人民生活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李中民 王 勇

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而要消费，首先就要有消费资料。因此，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就是生产满足消费需要的资料。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消费，同时也离不开生产，生产和消费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共有的经济现象。但是这两者之间的一般规律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如何运用这些原理正确处理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呢？本文拟就此谈一点体会。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和消费之间具有同一性。消费和生产的同一性表现在：

（一）直接的同一体，即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

生产就是消费，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费过程。这种消费是“双重”的消费，包括

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消费。要进行生产，首先要有劳动者这个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支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并消耗劳动者支出的体力和智力。换句话说，生产过程就是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是一重消费，主体方面的消费。另一重消费是客体方面的消费，即对生产资料的消费。要进行生产，不仅要有人的要素，还要有物的要素，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不单是消费劳动力的过程，同时也是消费生产资料的过程，同时消费二者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就是消费。

不仅生产直接就是消费，消费直接也就是生产。消费就是生产。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过程，同时也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生活消费是消费行为，同时也是生产行为，这种消费如同自然界中植物吸收氧、二氧化碳、水、肥等物质生长一样，人通过吃喝等形式消费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资料，使人的体力和脑力得到恢复和保持，从而再生产了人的身体和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直接也就是生产。

以上分析引出了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劳动力的生产）和两种消费（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从它们本身来看，每一方直接就是它的对方，如前所述，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但是，从它们的相互关系来看，四者之间就十分复杂。不过，生产消费从消费过程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消费过程来说，它同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是一回事；劳动力生产从生产过程是劳动力消费生活资料的过程来说，它同生活消费是一回事，二者分别表现为一个过程两种行为。前者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后者属于生活消费。本

文要阐述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主要就是指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生产和消费互相依存，互为前提。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生产和消费两者的相互关系来说，“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①。所谓媒介，是指每一方因有对方的存在而存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为消费提供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它为生产创造了消费者，使生产得以最后完成，同时，它还还为生产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要，这种新的更多的需要成为新的生产的动力和目的。可见，生产离不开消费，消费也离不开生产，它们互相依存，互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②

(三) 生产和消费相互创造对方，即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生产和消费不仅互相依存，互为前提，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而且进一步说，它们相互生产或创造对方，也就是说互相转化。

生产创造着消费。首先，生产创造出消费的材料和对象。人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就要消费，要消费就要有可供消费需要的材料，而消费材料只有生产才能提供，也正是生产为消费创造了材料、对象，使消费能够进行，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其次，生产还给消费以规定性，规定了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和方式。比如，原始社会人只能啃生肉和天然植物，现在人们不仅吃熟肉和其它各种高级食品，还

用碗盏筷子等用具吃，不仅吃的食品的种类和质量提高了，吃的方式也改变了。这就说明，生产不仅为消费生产了熟肉和各种其它高级食品，规定了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还生产了碗筷和规定了用碗筷等这样的消费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生产了消费，为消费提供材料，还在主体方面生产出消费，即吃熟肉和其它高级食品以及用碗筷的消费者。第三，生产还创造出消费的动力。生产为消费创造出材料和对象，这些材料和对象又进一步引起消费者的需要，成为消费增长的动力。例如，生产创造出了戏剧这门艺术，也就创造出了人们对这门艺术的需要和动力，创造出了懂得这门艺术和能够欣赏这门艺术的大众。生产刺激人们的需求欲望，又把满足这种欲望的材料作为需要又创造出来，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总之，生产创造出消费的材料和对象，创造出消费结构、水平和方式，创造出消费的动力。

生产创造着消费，但消费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它也创造着生产。消费使生产最后完成，又使生产重新开始。生产为消费提供的材料或叫产品，是供人消耗的物品，具有使用价值。但产品的使用价值包含在产品之中，只有对使用它的人它才具有使用价值，只有在消费中才能证明它有使用价值，才成为产品。一件产品不被人使用，就不成为现实的产品，就失去了产品的意义，创造这件产品的生产就不算最后完成。正是消费消灭了产品，使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使生产最后完成。消费把产品消灭以后，又提出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就成了生产重新开始的目标和发展的动力，或者继续生产，或者创造新的更多更好的产品。不仅如此，消费还创造出生产得以实际进行和发展的要素，即生产者。消费再生

产出劳动力，为生产提供实际要素。消费反复进行和发展，使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得到恢复、保持和发展，手艺不断完善，从而使生产要素不断更新，促进生产不断发展。

总之，生产和消费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又互相转化，是生产过程的两个要素。

二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上面关于生产和消费同一性的说明是就一般的抽象的意义讲的，如果同具体的社会形态相联系，就会明显地看出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这种矛盾的性质、矛盾的表现形式以及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各不相同。这不仅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同时也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此外，人口、自然、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因素，对它们的发展变化也有重大影响。

在人类发生的最初几十个世纪，生产力十分低下，石器、木棒、弓箭是主要的劳动工具，采猎是主要的生产活动。那时人类住在树上，赤身露体，以野生的动植物作为日常食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但那时“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③，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分配产品。虽然当时“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需要也很低。”^④因此，在原始社会尽管人类生产同人类生存的矛盾十分尖锐，但生产同需要、生产同消费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

马克思指出：“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⑤这个论断同样也适用于私有制社会。因为：（1）生产力是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它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着、发展着，生产关系可以延缓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决不可能永远阻止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又不断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使消费同生产一同发展。（2）每一种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建立，都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同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对生产发展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迫使每一种生产关系在发展过程中都要进行一定限度内的自行调节，每一次调节都对生产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从总的一般意义说，在私有制社会，消费还是同生产的发展一同发展的。但是，在私有制社会，能够满足消费需要的只是少数剥削阶级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的消费水平被远远限制在当时社会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以下，而剥削阶级甚至超过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去追求各种物质和精神享受。随着私有制社会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社会财富的增多，不仅剥削阶级的消费水平同劳动人民的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且生产和消费的对立性也日益加深，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垄断的形成及其发展，使生产、资本和管理日益社会化，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⑥。但工人的消费只是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

一种手段，被限制在再生产出扩大再生产所需劳动力的最低限度以内，同生产力水平完全不相适应。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生产者、生产者大众、工人的消费和生产彼此完全不成比例；相反，它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越离越远。”^⑦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自身矛盾的性质，使它长期无力吸收而且越来越无力吸收它所能生产的“剩余”。因此，如何处理这些剩余就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苦心研究的主题，并给各类大小资本家以深刻的印象。如果他是一个商业资本家，总是为他的销售量不足而发愁；如果他是一个农业资本家，总是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有利的市场而奔波；如果他是一个工业资本家，总是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卖掉日夜提心吊胆……，大家都在为漂出生产过剩的海洋而奋斗。资产阶级国家也采取了各种经济干预和经济调节措施扩大需求、刺激消费，但终无济于事，只得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求得生产和消费暂时的平衡，使经济发展经常遭到严重破坏。

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社会把消费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从社会需要出发组织生产，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对抗性质，但矛盾依然存在。这个矛盾集中表现在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消费需求平衡、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不管赋有多么丰富的天然资源，也不管人们掌握了多么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据有多么先进的生产手段，这种矛盾运动总是存在的。在经济不发达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我国正是如此。其中主要表现是以下几个方面：（1）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基金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搞基本建

设。大部分生产性基本建设不是当年可以投产的，特别是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周期更长，而且它不直接生产消费品。消费基金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同时还有社会消费），满足人民当前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总额中，如果积累基金占的比重过大，消费基金的比重偏低，就会影响人民消费水平的正常提高，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到头来又影响生产的发展。相反，如果消费基金的比重过大，积累基金的比重偏低，就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速度，结果又会阻碍人民生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可见社会主义积累和劳动者消费之间，就存在着矛盾。（2）生产性建设同非生产性建设的矛盾。生产性建设能够直接增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能力，提高固定资产的技术水平，调整劳动力的部局和各部门的比例；同时又是进行非生产性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基本建设中居于首要地位。但非生产性建设也不可缺少。非生产性建设不仅直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对促进生产发展有重要意义。在积累基金已定的情况下，生产性建设基金和非生产性建设基金是互相消长的，一方增加，一方必然减少。如果都要增加，超过积累基金的总额，就会突破国家计划，占用消费基金，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二者也是有矛盾的。（3）农、轻、重的矛盾。众所周知，农业和轻工业主要是生产消费品的，它们的发展是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农业，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制约力都很大，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仍需要放在首位，但重工业是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技术装备的，也要大力发展。重工业中的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目前在我国还是个薄弱环节，影响国民经济全局活不了，更应重点安排。在

现实生产过程中，农、轻、重争资金、争设备、争原料的矛盾现象就难于根本避免。（4）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矛盾。在我国，个人消费基金是劳动者个人生活和赡养家庭成员的主要来源，为改善人民生活就应逐步增加。社会消费基金中用于国家管理方面的基金，从总的发展变化趋势看，将会相对缩小，但必要的军政开支还要保证；用于科学、文教和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将会不断增加。同时，劳动人民的个人需要不仅主要靠个人消费基金来满足，而且越来越需要靠增加社会消费基金来满足。这些都需要增加社会消费基金的总额。在国民收入已定，分配用作消费基金的部分也已定的情况下，二者不可能都完全得到满足，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

（5）解决就业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矛盾。我国有十亿多人口，八亿多农民，社会上待业人口很多，解决就业问题是提高个人消费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每个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产品不多，增加就业就必然降低劳动生产率。既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要解决就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力的生产资料装备量，而这些都需要增加生产基金。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是个一定的量，生产基金增加，消费基金必然减少，从而造成人均生活消费水平降低。在这种连锁反应中更存在有十分复杂的矛盾。

总之，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生产发展过程的始终。在私有制社会，这种对立性日益发展为对抗性质；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性消失了，但矛盾依然存在。这种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有表现。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产和消费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密切相关的两个要素，它们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中，生产是过程的起点，是起支配地位的要素，生产决定着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的要素，从而促进、阻碍或破坏生产的发展，这就是它们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原理。

列宁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⑥。我们学习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的理论，就是要遵循马克思科学地揭示出的生产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它们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方向发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生活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根据马克思生产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说，人民生活的改善要依靠生产的发展，生产决定需要；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反作用于生产，推动生产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没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发展不断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又产生新的需要，使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满足；人民需要的增长受生产增长所制约，又推动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就是这样既一致

又矛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能否正确处理这一矛盾，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成败。

三十多年来，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因而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1958年以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经济工作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使国民经济走了一条“三高两低”的道路，建设资金花了不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生产并没有真正搞上去，还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调整积累同消费的比例关系，把多年来在人民生活方面的欠帐补起来，党和政府作了很大努力，通过压缩征购派购基数，农副产品提价，给职工升级提薪，实行奖金和各种补贴制度以及安排就业等途径，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1年，我国农村人均收入增长了67.3%；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25.7%；全国城镇每人平均购买消费品的金额增长了54.3%。三年间国家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达14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1%。同期内新增国民收入874亿元，用于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共计871亿元。就是说，这三年新增加的国民收入几乎全部用于生活消费。这充分说明，党中央调整的决心是大的。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已经基本上趋于协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国民收入结构的调整 and 变化，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个人所得部分的增长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消费需求呈相对膨胀状态。如果对这一情况不加重视和着手解决，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对

整个国民经济构成新的威胁。实践告诉我们，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同人民的生活关系时，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盲目地追求高积累，甚至用牺牲人民的消费去达到“高指标”，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另一种是忽视经济建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甚至企图吃光用光的消费倾向。经济建设同人民生活必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量力而行。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需要处理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前提下安排生产建设。

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⑥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民生活水平总的说来至今还是比较低的，解决这么多人吃饭问题应该是头等大事。只有首先把这一头安排好，中国的大局才会安定，人民才会切身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生产才会有强大的动力。因此，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要安排好人民生活，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生产发展逐年有所提高。就是在建设任务重，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也要保证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能低于上年水平，然后剩下多少余额就搞多少基本建设，这应该是一个总的界限。

第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

我们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但需要只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它同满足需要的条件之间还存在很大差别，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能不能得到满足，并不取决于我们的

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有没有满足需要的物质基础。当然，在一定时期内，用尽量压缩积累的办法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但这难以为继。因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当人们的第一轮需要满足以后，第二轮需要的满足就要靠扩大再生产。压缩积累仅能满足人民的第一轮需要，而第二轮需要不仅不能满足，甚至不能维持原来水平。因此，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靠不适当地压缩积累，减少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包括物化劳动在内的经济效益。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快于生产发展的速度。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个人收入水平提高来体现的，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要受生产增长速度所制约，不能快于生产增长的速度。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从三个不同侧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1）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个人收入所得是社会总产品中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即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增长应受到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制约。“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⑩假定到二〇〇〇年，国民收入也实现两个倍增，人口达到12亿，人均国民收入1200元，那按人均的国民收入每年大约增长6%，从而按人均的个人收入增长速度只能低于6%。否则，国家所得部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要下降，甚至绝对额也可能减少，保证不了国家必要的军政开支和一定的经济建设规模，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2) 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快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在我国,个人收入的92%左右要用于商品支出,个人收入的实现主要靠农业和轻工业提供的产品。因此,个人收入的提高又应当受到这些部门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假若今后农业每年递增4%左右,轻工业保持在近三年每年平均递增14%的水平,扣除新增人口的需要,每人平均对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消费水平的提高,每年就不过3%和13%左右。如果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快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就会使农业和轻工业产品市场的货币购买力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结果或者是个人收入不能实现,结余下去,形成潜在的购买力,增加来年市场的压力;或者引起物价上涨,市场混乱,国家不得不每年拿出大量外汇进口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

(3) 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个人收入增加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较大量的使用价值,社会才有可能拿出更多的剩余产品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因此,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还应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制约,特别是企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增加的幅度不能快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假如说,今后十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过去三年每年平均提高2.3%的速度提高两倍,达到每年平均提高7%左右,全民所有制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每年平均提高幅度只能在7%以下。如果超过了,就会造成多种不良后果,如增加产品成本,影响企业赢利;挤占税利,影响国家正常财政收入;减少生产基金和福利基金,影响企业挖、革、改和集体福利事业;造成

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影响职工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对国家、集体、个人都不利。继续发展下去，还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威胁。

第四，积累率要确定得合理适度。

积累率确定在什么水平上才算合理适度呢？近年来许多同志主张25%为最佳。我们认为积累率要受一系列因素制约，从而会在一定幅度内变动，同时，制约积累率的各种因素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实际中很难准确测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并部分地根据概率论来确定^①，因而也不可能确定在某一点上，只能确定出一个合理的浮动区。积累率的上限，是在正常经济条件下，保证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的消费水平不降低；积累基金的上限就是国民收入总额减去维持全国人口原来消费水平的消费基金。积累率的下限，必须保证原有劳动力和新吸收劳动力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装备量达到上期水平；积累基金的下限就是上期劳动力生产基金平均占有量乘以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鉴于我们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同时考虑到目前国家建设任务很重，建设资金短缺，而消费基金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实际情况，积累率的上限确定在29%，下限确定在26%，可能比较合适。苏联从1956年至1975年二十年期间，积累率也一直在26%——29%之间。“六五”时期为26.3%，“七五”时期为27.1%，“八五”时期为27.4%，“九五”时期为28.1%。同期内苏联的社会产品总产值翻了两番，同我们预计的目标和所用的时间是一样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5%，同我们预计每年平均增长7.2%也十分相近。这对我们也有参考价值。

第五，合理使用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国民收入分配以后，还有一个合理使用问题。使用不当，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都会造成损害。

过去我们往往是重视生产性积累，而忽视非生产性积累，因而生产性积累的比重过高，挤了非生产性积累。近年来，经过国民经济调整，比例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的情况是好的。但在基本建设中，非生产性建设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生产性建设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这在一定限度和一定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行了，长期下去也难以继。只有既重视生产性积累，也重视非生产性积累，并深入研究它们之间和各自内部的关系的规律性，确定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分配比例，合理组织安排和使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积累基金的使用效果，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

消费基金的使用方向也应该引起重视，不仅消费基金内部的分配比例要合理，还要注意使用方向，特别要注意对个人消费基金的使用加以引导。从总体上说，我们不应当限制消费，而要适当地刺激消费，不能让居民购买力呆滞着，不能让居民储蓄长久闲置着，不能把储蓄视为平衡市场供求的重要手段，而应使其实现，以推动消费资料的生产，进而推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不同的消费观点。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应从培养人们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幸福观，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出发，来指导人们的消费，来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这样才能使消费活动不仅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能促进社

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

注：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4页。
- ③《毛泽东选集》竖排本第1卷，第271页。
- ④⑤《资本论》第1卷，第559页。
- ⑥《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28页。
- ⑦参见《经济学译丛》1981年第9期第6页。
- ⑧《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 ⑨《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5页。
- ⑩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132页。
- ⑪《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第11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段伟华 张绪从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奠基者马克思，与世长辞已经一百周年了。一个多世纪来，马克思集人类智慧所创立并为之奋斗终身的科学社会主义，已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并在继续鼓舞着世界人民在广袤的大地上建立美好理想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发展，显示出了伟大的生命力。近代世界最黑暗的东方，文明古老的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在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并以自己创造性的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光辉。

—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传播、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历程。现在，它又在继续指引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一条正确的、健康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党的十二大确立起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诚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明确概括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哪些特点？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认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前提下，总结了我国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错误做法，真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核心；同时建设两个文明，用高度民主的建设予以保证和支持；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关系原则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把经济的现代化建设，思想文化的高度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的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三者作为战略任务，并使它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道路。

（一）坚持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核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点。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尽管解放后已建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底子仍然很薄，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较低。因此，必须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核心和重点，当作首要任务、战略任务来抓。这一重大战略方针，现已载入我国的宪法：“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并为这个重点服务。为了实现这

一根本任务，党的十二大已经确定了到本世纪末经济建设的一个战略目标、两个战略步骤、三个战略重点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经济建设中，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特点，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下，突破了过去“一大二公”的固定模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新格局；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从我国是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幅员辽阔这样一个大国国情出发，正确而认真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给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的自主权，以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密切结合，使生产与劳动者的利益直接挂钩。为了能够充分调动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在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中，推行了以“双包”为内容的“责、权、利”相结合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发展与扶持专业户、重点户，让劳动者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愿互利地建立和发展多种经济联合，逐步走向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从而开创了一条发展农业的新路子；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根据我国商品生产不很发展的实际情况，执行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扩大社会交换，活跃国内国际市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确定了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为主，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根据市场供求自行安排生产相结合的管理办法，改变过去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状况，实行适当放宽的经济政策，即陈云同志生动比喻的：“让鸟在笼子里飞”的政策；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针，扬长避短，弃闭关自守、凝固僵化之弊病，

达到取天下之宝以为己用，增强我国自力更生能力的目的。

(二) 把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两个文明同时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突出的特点。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者内在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包含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保证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是个文明古国，但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文化逐渐落后，剥削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加之十年内乱，又造成严重恶果。因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必须强调高度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特别要在全社会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建设，提高每一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有文化的劳动者，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的社会关系。这既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为共产主义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的需要。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

(三) 把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保证和支持两个文明的建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又一显著特点。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充分发挥人民主人翁的责任感、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民要实现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必须要具备管理的能力，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民

主管理的作风。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较深，人民文化科学知识长期得不到迅速普及和很快提高，缺乏民主的传统与习惯，因此，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建设两个文明是分不开的。健全与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但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的权力，使国家机关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要使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社会基层组织的民主管理和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使民主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根据我国多民族的特点，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还要进一步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由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正确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

（四）坚持对外关系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点。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什么样的方针政策，由国家和社会的性质所决定。

社会主义中国，是处于世界国家之林中建设社会主义的。不论从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事业的要求，还是从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要求出发，加强国际交往已成为时代的必然和国家的基本活动，我国与兄弟国家或与其它国家之间，决不能搞锁国绝世的政策；正确处理好对外关系，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坚持独立

自主，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们坚持各国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和解决。我们尊重别的国家的主权，同时也尊重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绝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外政策的制定决不以任何大国的指挥棒为转移，也不受国际上临时事件的左右。“在我国外部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政策，……也一定要坚持以平等态度对待一切大小国家，始终不渝地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一切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中国永远不称霸，也绝不允许任何霸权主义者压在我们头上”^①。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坚持独立自主，在对外经济交流上要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文化交流上要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同时汲取各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洋为中用”。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来建设社会主义，来巩固社会主义。”^②

独立自主原则，也同样是我们党同外国党处理相互关系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曾在一九八〇年五月明确地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

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③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它也历来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④新的历史时期，党再次重申这一基本原则，具有新的意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要是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建设，不断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由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职能还不能取消，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保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纯洁性，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成为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使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针对一些人由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曲折而动摇了社会主义的信念这种情况提出的；而且也有利于鉴别在社会主义运动取得巨大胜利和新发展的情况下，纷纷摘取社会主义桂冠而自炫的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派别和思潮。在这些新的情况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包含着既与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划清

界限，又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的意义。此外，由共产党执政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因为各自的情况不同，建设社会主义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我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前提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具有中国的特色。

二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是来之不易的。它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我国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使世界无产阶级认识到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⑤。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经过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消灭剥削、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

必然地发展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国原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把科学社会主义变为改造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创造幸福、美好、强大的新中国的物质力量，使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经历了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斗争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情的认识尚不成熟，曾经有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我国民主革命遭受了两次重大的挫折；挫折使党和人民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认识到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利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军阀割据的局面，农村自然经济的存在等特点，有可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即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从而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开拓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建国以后，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改造小生产，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又摸索和创造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用和平赎买的方法，顺利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办法，引导中国几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我国初步建立了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是从“不发达”的国情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就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许多困难。我们遇到的是马克思未曾想到的特殊情况，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的那样：中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但这同时又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系列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而产生出的困难，要经历更加艰苦和更加长久的奋斗。”^⑥

我们党从一九五六年就开始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鉴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以及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

造的经验，正确分析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也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是首要任务的正确方针和路线。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一个会议的讲话中还明确表示说，现在正处在一个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的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时期；强调要认识这种转变，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对待新问题。同年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但是在以后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党还缺乏思想准备，对出现的干扰未及防备，以致未能始终坚持八大的正确方针。一九五八年提出“大跃进”，用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严重脱离了国力，违背了客观规律；在生产关系上，搞一大二公的不断变革，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在社会生活上，片面夸大政治和其他上层建筑因素的作用。受了挫折，但又未能正确地吸取其教训，反而把挫折归之于“右倾机会主义”，转向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连续不断开展政治运动；后又提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和经济建设上的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错误交织在一起；林彪、江青、康生等出自野心家的本性，推波助澜，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活动，恣意颠倒是非，歪曲马克思明确指出的在没有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的论述^⑦，最后，终于导致和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内乱，经济建设、政治、思想文化建设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二十多年中，所以经历了曲折艰难的道路，这是与我们未能正确地认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农民又占绝对优势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未能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国情和新时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有极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实际，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正确处理新时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又把马列的某些原理、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因而形成了“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到一九七六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具有最直接的意义。二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我们的党和人民，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得以在结束了十年内乱之后，勇敢地面对实际，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又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针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形成了三中全会以来具有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对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认真总结和新的探索的真正起点。

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在于解决了两个最根本的问题：首先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为科学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为真正从我国实际出发进行新的探索，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另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从此，着手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的工作。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开始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建设经验，对今后的道路也作了一个初步的规划，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个主要点，是对今后建设道路做出的一个概括论述。

党的十二大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和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经验，确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纲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性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比过去更加深刻更加完善了。它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的科学总结；它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更加丰富。

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理论依据，结合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因而它是科学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建立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

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⑨。社会主义社会，就其产生的基础，巩固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向着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过渡来说，都应该把发展生产作为首要的任务和重点。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上分析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尽量增加生产的总量”，即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巩固和发展。这是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⑩列宁也明确地提出过：“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我们党在三中全会以后，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重点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历史经验也已证明，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厚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只是一句空话；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不能提高，旧社会的各种陈腐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各种不正之风就愈吹愈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很难巩固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任何社会不但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还要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互相适应和互相促进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依存的条

件。这些条件相互之间的关系又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依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各个方面还必然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观点。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在经济制度上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政治上无产阶级应发扬民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尔后国家才能自行消亡；在思想道德方面，同传统的私有制实行彻底决裂的同时还要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决裂；为共产主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一方面，每个人都不能把生产劳动上自己应参加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社会也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论述了要正确地认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相互关系，即正确地认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部分的关系，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①这就是说，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起着决定的作用，不承认这一点，片面夸大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的作用，甚至象“四人帮”所宣扬的只要政治搞上去了，那怕颗粒不收也不要紧的那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如果因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去否定或者忽视其他如政治、思想文化的作用和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同样也是错误的。

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许

多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如何建设的许多光辉思想。他在强调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多次指出：在一个文盲国家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列宁在强调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时，提出了物质利益原则的必要性，同时又十分赞扬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精神，为社会树立先进的榜样。他还强调社会主义要有铁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关系的表现，是一种自觉的纪律，它根本区别于奴隶社会的“棍棒纪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饥饿纪律”。列宁在逝世的前两年，还看出了沙皇俄国军事封建专制制度的旧传统，如官僚主义、办事拖拉等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影响，开始考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提出了要改革国家机关的设想和建设。马克思、列宁的这些思想，都是我们党三中全会以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纲领产生和形成的理论依据和指南。

恩格斯曾经向共产党人提出过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的任务。他告诫后人不要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构造现实社会体系的教条，而要从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出发，进行认真的、广阔的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做出出类拔萃的成就。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

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作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⑩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遵循着这一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过去和现状进行了多方面的大量的研究，从中找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存在的各方面的条件及其规律性的东西，结合我们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拨乱反正，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和政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使得长期以来我们党想要解决而又没有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纲领。

总之，立足于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农民又占优势的大国；正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已有了一定基础，而又还不够雄厚；社会政治制度先进，但又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已有了相当的提高，然而又不十分发达、旧的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等国情，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中，找出符合其规律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运用于中国实际；又以自己创造性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必然有它自己的特色。正如列宁所说：

“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⑪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三

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寻求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详尽而具体的理论指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指示和设想，我们也不能教条式的用来裁剪现实。马克思说过：“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⑭“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⑮恩格斯也说过，我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⑯所以，对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能如同革命导师多次强调的那样，从本国自己的经验中去学习，让实践来作出回答。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创造和探索，以自己新鲜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其表现之一，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新路子。如所有制问题上，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这就找到了适应于我国目前生产力结构多层次性这一明显特征的经济形式。又比如在国民经济结构上，从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农民占优势的特点出发，必须建立一个适应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要求的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以农业、能源、交

通、科学、教育为重点。在发展农业方面，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集体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从我国有八亿农业人口，农村生产力基本上是畜力和手工业劳动为主，发展水平又极不平衡，劳动力资源丰富等特点出发，尊重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打破了过去一些超越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错误作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形势。实践证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广和逐步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正确道路，具有不同于过去和其它国家的中国特色。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农业体制改革的这一成功经验，有力地启示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也为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找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的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充分发挥劳动者主人翁的积极性，体现真正当家作主的一种好形式。总之，探索到了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子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它正确处理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既保证国家集中必要的资金，以加强重点建设，又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正确处理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确处理了国营经济与多种经济形式的关系，坚持国营经济为主导，与其他经济形式几种长期的同时并存；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关系，坚持自力更生为立足点，对外开放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既保证一定

的发展速度，又要特别注意经济效益；正确处理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建设的重点和根本环节，同时注意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按比例协调发展；正确处理了物质利益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既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体现多劳多得，又要加强职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从两方面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经验同过去相比较，表明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多了，经验丰富多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二，从理论的高度和政治的高度提出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两个文明的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是第一次。如上所述，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必然达到的结论，但它又决不仅仅是结论；它在与实际结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补充。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明有过不少的论述，但其含义都不十分确定。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由于社会主义尚未成为现实；列宁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实践，因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问题，还只是题中应有之意，未得到系统地论证和展开。党的十二大恰恰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课题上，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展开，并以鲜明的特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光彩。报告赋予精神文明以科学概念和确切含义：“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

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了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一角度，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使它们有了确定的含义，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发展的成果。并且明确地把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而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建设又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从理论上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又是十二大报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它把社会主义特征概括为：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六个方面。这样全面地概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分析过社会主义特征的经济方面，着重指出的只是：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权力，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取代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用按照预订计划进行生产，取代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论述到了社会主义特征的政治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作为经济特征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当

然，他们也曾对未来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作过一些原则性的指示，但既未概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更未曾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并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论述。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国家俄国取得胜利，因此列宁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也曾十分重视并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特征，也提出过进行思想文化建设的许多方面的观点，但也未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样一个集中而又确切、明确的概念。我们党十二大报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在总结我国自己长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全面概括社会主义特征的理论，又把精神文明作为重要特征明确的提出，并从政治高度、战略高度论证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意义，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极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将成为战胜和克服各种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和旧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有力武器；是我们现代化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发展的保证，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所以报告指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我们必须从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和作用，并下定决心，保证尽一切努力，同时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其三，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我国长期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生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在实践中具体化了。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重要保证的角度，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这就是把民主既作为目的，也作为手段明确起来了；记取我国和国际共运中曾经出现过并且没有很好解决的个人崇拜所导致严重后果的教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废除实际存在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其中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重要原则，这是马克思所没有提到过的；从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的实际出发，提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同时，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的基本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民主与专政辩证统一理论的发展。

其四，党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正确处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这一指导原则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⑩马克思当时是就共产党人应正确处理民主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而言的。它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运动、制度三者的关系，指出：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就开始了，作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是

现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作为它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离不开共产主义。报告还着重指出：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它各项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这些论述，明确地把运动的现在——社会主义，与运动的未来——共产主义制度，从政策上区别开来；同时又用共产主义思想的要求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把运动的现在和运动的未来密切联系起来。这表明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在思想理论上，党高举着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人在运动的现在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的指导思想具体化了；在实践中，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正确地处理着运动的现在和运动的未来的关系，有力地坚定了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并为人们指明了怎样去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不息的途径和方向。

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纲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的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⑧它表明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和运动水平，已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在实践，在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将日益广阔，其特色也必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日益得以显示和丰富。这一历史的进程，又必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宝库又会增添更多更新的篇章。

注:

- ①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第76页。
- ②《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1页。
- ③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92页。
- ④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第49页。
- ⑤《列宁选集》第3卷,第603页。
- ⑥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26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页。(1972年5月第1版,下同)
-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 ⑩《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433页。
- ⑬《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 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
- 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页。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

永放光辉

张 瑞 生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科学理论体系，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证明、丰富和发展，并将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继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当前，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现状，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起，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讲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为什么最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至今还没有灭亡？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什么欧美等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迄今为止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却又是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既然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还出现这样那样的严重的曲折？有的同志对此感到迷惘难解，有的甚至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发生怀疑，对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对共产主义信念发生动摇。因此，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推进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用意就在于通过进一步学习、研究革命导师们创立、实践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来探讨和分析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特殊性，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谨以此来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指明了无产阶级 获得社会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一般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用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划时代的历史功绩，就是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论，并运用它剖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的历史，第一次系统地周密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真理。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这种科学真理的一个简要的纲领性的说明，那么《资本论》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为根据，对这一科学真理的详尽证明。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

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是剖析社会革命问题的钥匙，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革命，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作为重大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不否认的。但，什么是社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社会革命的发生有无客观规律可循？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之前，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说明。过

去，人们往往把改变社会制度的大变动即社会革命，唯心地归因为天命，归因为神意，归因为天才人物的个人行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第一次对社会革命作出了唯物的科学说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此作了极为精辟的经典性论述，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变革或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天命、神意或人们的头脑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社会革命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革命人民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行为。社会革命的发生，根源于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这种自然历史进程，是不依任何人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

性质的客观要求，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革命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③。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④。其实，这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学说，就根植在这个科学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循此前进，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⑤。这种最伟大的革命前景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客观自然历史进程的产物。这是任何人、任何阶级也改变不了的。无产阶级的全部科学信念就是建立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自从马克思主义这个光辉的思想指明了人类社会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之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来观察和认识现代社会革命问题，来制定无产阶级解放的战略和策略，以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不仅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科学的论证，揭示了遵循社会发展而进行社会革命的一般规律，而且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国际经济、政治条件的发展和变化，对各

国无产阶级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进行革命和如何进行社会革命问题，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见解。全面地历史地把握这些见解，对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真谛，提高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能力是十分有益的。他们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将在英、法、德等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共同取得胜利，单独在一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论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根据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不相上下，发生重大事变将相互影响的情况，曾明确指出：工人阶级要争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的^⑥。马克思在1858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还指出：“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⑦他甚至尖锐地指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加，都不过是杯水风波^⑧。后来，虽然恩格斯根据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其“世界工厂”的地位，利用其巨大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上层分子，使工人阶级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事实，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十九世纪末叶，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⑨。但，我们看出，马、恩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

国家共同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无论他们最先从英国开始，还是最先从法国开始。这些见解，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对的。因为，一、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在自由竞争中，资本主义各国一般处于相对的平稳和平发展时期，一个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将很容易受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共同镇压，1848年西欧各国爆发的革命先后被扑灭，就是例证，以后法国举行的巴黎公社革命被很快镇压下去，也是一个证明。二、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处于相对的平稳和平发展时期，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才能发生，因为只有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才能达到公开激化的程度，才会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形势。因此，马、恩当时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欧美等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并由此相应的得出上述结论，这在他们所处的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只是他们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情况提出的一种设想。并不是说，当时西欧各国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可以取得共同胜利的革命形势。

第二、围绕着对俄国革命问题的探讨，指出了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革命者当中，围绕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发生了一场尖锐的争论。有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各国都必须象西欧各国那样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以

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农村公社只有象西欧各国那样经过资本主义式的对农民的土地剥夺，使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之外，其它道路是没有的。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不同意这种看法。为此，她请求马克思本人能对此表示明确的见解。马克思于1881年3月18日的复信明确指出：以为世界各国都必须经过象西欧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是对他的历史理论的误解。他说：我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我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是有条件的^⑩。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写的序言中，又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⑪

马克思、恩格斯还就此探讨了象俄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什么可以不经西歐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一切可怕灾难而吸取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

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⑫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氏族公社不能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代的俄国农村公社，在特定条件下，却有上升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

“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⑬从上述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具备了必要条件，落后国家可以不象西欧各国那样，它们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社会。那种认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只有象西欧各国那样，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只有通过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2）马、恩认为，这种必要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即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

过程的道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④。

（3）马、恩认为，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可以吸收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来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这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能够走上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物质技术条件。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围绕着对英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探讨，指出了在资本主义时代，压迫民族中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曲折性。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视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将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重大影响。因为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发展最高的国家，也是工人运动最发展的国家。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水平还在上升，在经济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但工人运动却陷入了低潮。正如马克思在1870年所指出的：英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它，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笼罩了整个生产。唯有它，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英国无产阶级拥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但英国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并不会随之俱来。因为他们缺乏革命的热情^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马克思恩格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英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他们的工业生产优势，保持着在国际上的经济垄断地位，他们利用其巨大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在收买无

产阶级，特别是工联中的上层分子。这样英国工人阶级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垄断地位的利益。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逐渐占了上风。“不列颠工人完全不想再继续前进，他们只有通过事变，只有通过工业垄断权的丧失，才能振作起来”，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才会在英国重新兴起^⑧。（二）英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制造英国本国工人与外籍工人主要是爱尔兰籍工人之间的对立。他们利用从被压迫民族中雇佣来的大批廉价劳动力，来对抗英国工人的合理要求，从而造成整个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不和，这是英国工人阶级为什么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是资本家阶级能够维持他们的政权的秘密。这一点资本家阶级是知道的很清楚的^⑨。（三）“爱尔兰给英国政府维持一支较大的常备军提供了唯一的口实”。英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往往借此在维护整个英国民族利益的名义下扩军备战。谁要反对这一点，又往往被扣上出卖民族利益的罪名。实际上这种武装力量，不仅是镇压被压迫民族的工具，也是提防、镇压本国工人造反的工具。正是这些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的指出：“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铸成它自身的锁链”^⑩。当压迫民族中的统治者尚能用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来保护和巩固它在被压迫民族中的特权地位的时候，来收买、分化工人阶级队伍使他们失去革命热情和战斗力的时候，它在本土上的统治是会被推翻的。

他们的上述论断说明：

（1）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很快成功的国家。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前提；另一方面，这种物质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又会变成削弱或阻止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手段。当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的革命形势，充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片面的理解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工人阶级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会自然到来，是完全错误的。

（2）在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步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化的时候，在资本的统治愈来愈建立在对被压迫民族的掠夺上的时候，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就成为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决定性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指出：只要英国还统治着、支配着爱尔兰，英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毫无希望。“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因此，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一定要与资产阶级掠夺被压迫民族的政策实行彻底的决裂；要与自身沾染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恶习决裂；要无条件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⑨。

第四、围绕着对法德农民问题的探讨，指出了在农民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和应遵循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是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从来不认为，单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就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从来主张等到

小生产者都变成无产阶级之后才去实现社会变革。他们一直十分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无产阶级在实现社会变革时，对农民应抱的科学态度。

(1) 他们根据“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鲁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例外(即大不列颠本土，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引者注)”^{②①}。这个重要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重视与农民的革命联盟，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在总结法德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教训时指出：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②②}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为了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民的领导力量^{②③}。

(2)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要指明他们获得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以政府的名义，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促使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②④}。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教育农民，使他们懂得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是他们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道路，无产阶级将积极引导他们走上这条道路，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把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农民都变成资本主义大工业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②⑤}。

(3) 在引导农民走向合作社道路的时候，要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来进行，决不能违反他们的意愿进行暴力干涉。恩格斯指出：我们永远也不允诺给农民保持个体经济，但一定要承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用强力去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如果他们一时下不了决心，我们就耐心地等待。通过示范、社会帮助等形式被我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违反小生产者的意愿，任何稳固的社会变革都是不可能的^②。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在当时不仅驳斥了巴枯宁等人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对农民采取暴力干预的恶意攻击，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在农民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和应遵循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考茨基等人看不到农民的革命力量，鼓吹只有无产阶级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这是完全错误的。俄国、中国等农民占多数国家里革命的成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这些见解，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是十分亲切的，很有教益的。

第五，坚决反对把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社会革命论简单化、公式化，指明了在实践中观察、解决革命问题时，应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马恩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着自己的科学理论。他们不仅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从分析各个国家具体面临的社会革命问题时，给我们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基本思想，而且针对一些人对他们的社会革

命论的误解以及教条主义态度，指出了在观察、解决社会革命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阐明了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1) 历史中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决不能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要注意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进程的影响。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严肃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也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斗争的形式。既要看到经济运动的最终决定作用，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把历史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他举例说：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和发展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恰恰是勃兰登堡成为一个强国，纯粹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它因素所决定。企图用经济因素说明一切，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②。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伟大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经济运动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有些人把唯物史观曲解为只有经济状况，经济运动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那是由于他们不懂或

缺少唯物辩证法^②。

(2) 要注意国际国内因素的交互影响，不能孤立的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时，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他们对俄国问题的分析，既不同于盲目崇拜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都要按西欧步子走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又不同于离开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道，把俄国农村公社看成社会主义的天然沃土，认为俄国农民比西欧无产阶级更接近社会主义的俄国民粹派。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分析。马克思精辟地说：“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②③}

(3) 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指出：我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社会革命论，是指导我们研究社会革命问题的科学方法，决不是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否则，必将走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时都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一点。在指导俄国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德农民问题时是这样，在指导意大利革命问题时也是这样。当意大利的革命者就意大利的革命方式、前途等问

题，向恩格斯请教时，恩格斯一方面根据已知的情况作了中肯的分析，一方面又向意大利革命者指出，自己那些见解，只能作为意大利革命同志的参考。意大利的革命到底如何进行，如何发展，这要由最了解情况，处于事变中心的意大利同志来决定。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说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虽然基本上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④，主要考察了西欧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条件问题，提出过一些设想，但他们并没有把它当成不可改变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巴黎公社之后，当资本主义逐步走向垄断，对内实行高压，对外实行掠夺、争霸之后，马、恩多次强调指出，决不能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公式化，要注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国际国内的相互影响，来考察各国无产阶级实现社会革命的具体条件和具体方式。他们对俄国、英国革命问题和法德农民问题的分析，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的重要教导，为无产阶级在实践中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指明了方向。既要掌握社会革命发生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社会革命发生于某时某地的具体历史条件。只有把二者历史地具体地统一起来，才能指导革命的具体实践，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是被实践已经 证明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检验、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虽然是马、恩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创立和阐发

的，他们生前，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他们的社会革命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伟大斗争中，不仅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是已被实践证明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的科学真理。共产主义从一百多年前在欧洲游荡的“幽灵”，变成了今天亿万人民的光辉实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真理性的最有力地证明。以列宁为杰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后，列宁没有固守马、恩过去的结论，而是运用唯物史观，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无产阶级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和方式。他在《帝国主义论》等著作中，全面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及其必然产生的结果：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了；由于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国家通过跳跃式的发展超过另一些国家，一些国家很快地被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以军事冲突和战争灾祸的方式周期性地重新瓜分已被瓜分完了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对抗大大激化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危机

之中。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当世界资本主义战线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被削弱的时候，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就可能突破这条战线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在1915年直接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明确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当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一个重大发展^②。当时，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以及俄国的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不懂得帝国主义的本质，又不懂得帝国主义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差别的全部重要性，完全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不能单独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结论，反对列宁的正确主张，反对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列宁的创见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象考茨基等人那样，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过去的具体结论，不仅不能指导无产阶级去夺取胜利，而且只会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贻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第二、在帝国主义时代，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相反，后进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的国家，有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马恩在当时条件下，对英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法德农

民问题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会革命成功的早晚，并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马克思当时毕竟没有直接得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充满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光辉思想，尖锐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最高，工人阶级人数占多数的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象俄国那样的国家，还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是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陈腐的观点。针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以及苏汉诺夫等人的谬论，列宁专门写了《论我国革命》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作了创造性的说明。他指出：这些人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战争，客观上加速了世界革命化。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在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条件，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些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们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那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②？

斯大林在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作了精辟的论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性质、范围、深度以及整个革命方案，都应当有新的见解。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从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去考察是否已经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成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些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各国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的整个体系中已经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就不再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由于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我们就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那个国家破裂的结果。由此观之，革命将在那里开始？资本战线会在那个国家内被突破呢？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它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

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是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又一重大发展^②。俄国、中国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完全证实了列宁、斯大林科学预见的正确性。

第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在分析俄国革命问题时曾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的条件下，落后的国家，可以走上缩短自己历史发展进程的道路，不必象西欧那样非要经过独立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进一步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③。但具体怎么走，马、恩没有讲，列宁虽然讲了可以先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一定的发展阶段是些什么？列宁没有也不可能讲出来，他认为这主要靠这些国家的革命实践来解决。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社会革命，如何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个课题果然由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共产党人通过革命实践，得到了解决。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为指导，以中国的国情为依据，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不仅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出发，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其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的。而且着重从整个世界已经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和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虽然是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但已不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不是旧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了。指出：在新的历史时代，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革命领导权的中国，企图再走旧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再搞什么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一、帝国主义不答应；二、社会主义不答应；三、已经觉悟、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更是不答应。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都决定着中国人民走上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既遵循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坚持革命必须分两步走，驳斥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机会主义，又根据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内外条件所造成的形势，坚持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阶段，驳斥了“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投降主义，这就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逻辑，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

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制定了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战略目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第四、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后进的、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列宁说得好，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新社会曾经有不少重要的设想，但在人们没有亲自实践之前，这种新社会的种种设想毕竟“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只有经过一些想建立某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这种抽象的东西才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⑭。

列宁、斯大林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杰出贡献，就是他们领导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通过种种具体尝试，把抽象设想变成现实，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一步一步建立新社会，最终实现社会解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主要是：

关于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只要能与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就能获得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条件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取得政权之后，在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基本上解决之后，就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经济制

度的根本任务——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到首要地位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学习、掌握人类迄今特别是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先进技术、管理和文化，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统统利用起来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坚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开创社会主义新制度具体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如列宁、斯大林关于在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不能直接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不能一下子取消商品、货币和信贷的思想；关于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包括通过租让制，利用外资、外国技术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关于在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不一定也不可能建立在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而要有一个两种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阶段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中，经过近三十年的成功与失误、前进与挫折的反复实践，既吸收了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又根据我国的实际，开创了新的局面，为在经济上比当时俄国更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新鲜经验。这些新鲜经验主要是：

关于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好形式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基本形式，同时又允许少量的其他经济形式并存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重点转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工业、农业、科学和国防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在大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以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为内容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的理论和实践，等等，都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中国国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上述情况说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由于苏联、中国等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已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是人类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必然产物。它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客观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根本规律的，又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

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探索出本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胜利成果。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为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指明了方向，无产阶级的创造性实践，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是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不平衡性和特殊性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一，关于欧美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至今尚未成功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获得社会解放的一般条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基本原理，给我们进一步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即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历史时代已经到来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说明革命导师们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欧美等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尚未成功，而且就现今情况看，一般都还不存在社会革命即将发生的形势。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来分析这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实呢？马恩当年关于英国社会革命问题的分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首先发生在那些“有可能易于进行侵略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⑤的重要论断，在今天，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仍然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垄断“调节计划”的推行,大大增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在当代科学技术巨大进步的推动下,为了解决水平越来越高的社会化、自动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持续发展的趋势,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不仅作为维护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外部条件对经济发展起反作用,而且作为一个拥有最大资本的经济实体(一般都占到该国全部工业资产总额的20%左右)直接参与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一些最主要的资产阶级国家,对整个社会生产,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干预即所谓国家垄断“调节计划”。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暂时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推动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垄断“调节计划”的实行,凡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须而又无利可图,私人垄断资本不愿投资,或因耗资巨大,私人垄断资本无力投建的,都由国家从垄断资产阶级的总利益出发投资兴建或维持,如美国的电站、试验性生产企业、原子能工业、航天工程以及城市环卫工程,能源开发等。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保证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垄断“调节计划”的推行,就使资产阶级国家有可能以资本家总代表的身份,凌驾于个别垄断资本之上,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实行有利于垄断资本总利益的干预。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限制了私人垄断资本生产的盲目性，对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起到一定的、暂时的抑制作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国家，于二次大战后，能凭借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经济发展保持了可观的速度，在某些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相应地得到了加强。这是他们经济、政治统治秩序比较稳定的一个根本原因。

（2）当代工业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的经济政治优势，利用他们从第三世界获得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对工人阶级的收买与过去相比大大加强了。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们的工业垄断地位，用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的大量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上层，以巩固它们的统治，这是革命导师们早就注意到的一个重要事实。二次大战后，旧的殖民统治体系瓦解了，但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他们的工业垄断地位及长期形成的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仍然通过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形式，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获取大量的超额利润。以美国为例，从1950年到1970年，美国跨国公司仅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的利润就高达1400亿美元，相当于其同期累计投资额的五倍。从1966——1976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所获取的利润更快更高，仅收回到国内的利润，就相当于同期投资额的六倍^⑥。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凭借这样的巨额利润，对工人阶级的收买与过去相比大大加强了。过去对工人阶级的收买，一般由私人资本进行，现在主要由资本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来进行；过去一般主要是

收买少数工人贵族，现在企图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主要表现形式是：

推行所谓“国家福利”政策。其办法是由这些国家建立起一套由政府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企业和工会也搞一些。其具体形式有的多达几十种。如美国从免费教育、失业救济、养老金、免费医疗到改善交通、住宅、文体设施等都有一些制度或措施，自称为“超级福利国家”。这些制度的实行，一方面使工人生活有了一定的保证和相应的改善；另一方面在这些制度的制约和诱惑之下，一些工人只求有保障的生活，对整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淡漠了。资产阶级保证生产的需要，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暂时的达到了。

推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其主要形式是：一、实行所谓工人民主管理制度。西德等国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工人的所谓民主权利。在日本，一些企业把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接过去，变成其工厂管理办法之一。二、实行所谓企业所有权与经营自主权的分离政策，企图给人一种印象，现在的工厂企业不再是资本家独揽大权而是由经理或厂长当权，由其领导下的工厂企业管理委员会负责了。据我们去日本参观的同志讲，日本人告诉他们：过去，三菱就是三菱这一家当权，三井就是三井这一家当权，现在不是了，现在是经理当权，工厂管理委员会当权。三、资本家把一部分小额股票卖给工人，使工人在名义上也成为企业的股东了。诱使工人：谁干的好，谁有了高工资，谁就可以买股票，当股东。这种办法，把社会民主党长期倡导的那一套社会改良大部分实现了。它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

资本主义制度，掩盖了、缓和了、冲淡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

推行所谓民族、种族利己主义。这是当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分裂工人阶级的老办法，现在仍然被垄断资产阶级广泛地采用着。在工业生产繁荣时期，他们从第三世界或本国少数民族中雇佣大量的外籍工人和有色工人。这在发达国家工业生产中常常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仅比利时这样的小工业国，有时就多达250万。一旦出现停滞、危机的趋势，垄断资产阶级就首先辞退、解雇外籍或有色工人，保护本国的白人。这是当前西方工人运动往往处于保全各自饭碗的斗争，不顾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在垄断资产阶级这一整套制度、办法下，一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分沾了工业垄断利润，一部分人在幻想挤进分沾者的行列。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被收买了，工人阶级队伍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被分化了。再加上他们推行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这种刺激生产、拴住工人的经济政治对策，资产阶级防止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目的，暂时地部分地实现了。

（3）工业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队伍自身，就现在的组织状况，觉悟水平看，还没有形成为统一的强大的目标明确的革命力量。具体表现在：一、工人阶级队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自动化大生产的进一步提高，其构成情况发生了变化，技术工人或“白领工人”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这些能够获得较好待遇的人，一部分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整个工人阶级的命运，只求自己、自己这个阶层，职业、

生活的安定。二、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分裂了。不少国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工人群众组织，也没有形成联合性的战斗队伍。差不多都是有多少政党，就有多少个在其影响下的工会。统一的工人阶级队伍组织不起来，统一的工人运动自然不可能，也就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向资产阶级进行有力的斗争。三、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由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再加上资产阶级长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宣传，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自身分裂了。有的人不愿意革命了，有的人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有的虽然在继续战斗，但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还不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能为绝大多数工人群众接受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有斗争经验、有崇高威信的革命领袖。上述情况说明，从革命的主观条件讲，无产阶级自身还没有形成一支有觉悟的强大的足以能够领导广大人民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力量。

以上这三个方面就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直接的成熟的革命形势，暂时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

（4）西欧日美各国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但决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可以永恒延续。就全球看，今天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仍然处在垂死挣扎时期，只不过战后一段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一度暂时的回升时期而已。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欧美各国无产阶级实现社会解放进一步准备

好了物质条件。尽管欧美各国现在尚未出现象列宁所指出的“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②那种形势，但这种形势，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必然要到来。因为：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垄断调节计划的实行，归根到底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的刺激下，由于社会化、自动化生产的大发展，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产物。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资本家的总代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和实行国家垄断调节计划的办法，来缓和社会化、自动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它永远不可能背叛它作为资本家总代表的意志，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他们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麻痹工人阶级，延缓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追求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而决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福利。列宁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③。现在的欧美各国，当它们失去工业垄断地位的时候，当第三世界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失去对工人阶级进行收买的经济条件的时候，他们的经济政治统治的厄运也就不远了。自八十年代以来，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持续的滞胀和衰退，通货膨胀，工人失业，有增无已。现在还看不出回升的前景。面对这种危机，连欧美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无可奈何的嗟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无异于

饮鸩止渴。二、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伟大的阶级，这是指它所处的社会历史地位和要承担的历史使命讲的。要使无产阶级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象历史上其它阶级一样，也不是自发实现的。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经受来自各方面的锻炼和考验，才能逐步成熟起来。恩格斯曾经说过，英国早年宪章运动的要求，后来竟由英国资产阶级用社会改良的办法悄悄的实行了。这曾对工人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工人迟早会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的手段”。^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愈来愈懂得，靠野蛮的欺诈手段，靠延长工时，靠开除工人等直接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办法，是无法维护生产，保持优势，击败竞争对手的。只有靠科学技术的进步、靠刺激工人的积极性，靠文明的科学管理，才能推动生产的发展，保持自己的工业垄断地位。因而，对资本家来讲工厂愈大，愈怕出事。他们感染上了一种“新精神”：与工人“商量”、与工人“妥协”、给工人“福利”，而不再与工人硬干了。他们也开始讲“商业道德”、“工业道德”，而不是专靠哄骗和欺诈发财了。但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既不是资本家阶级本性的改变，也不是出于伦理上的狂热，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④。即“资本家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罢了^④。象一切事情无不具有二重性一样，资产阶级推行的所谓福利资本主义和人民资本主义，一方面确实暂时帮了资产阶级的忙，在一定程度上收买、腐蚀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工人看到：决不能把自己的斗争

局限在反对或请求改变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最丑恶的现象，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光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不行，只有把生产力创造的物质成果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否则，只能在自己创造的巨大财富面前，长期地处于被支配、施舍、收买的雇佣地位。

象当年英国一样，工业国家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是欧美各国现存制度的基础。这个基础一旦丧失，资产阶级凭借雄厚的经济力量对工人阶级进行分化收买的条件就丧失了，靠两党或不同派别轮流执政的“跷跷板游戏”^②也就再也欺骗不了工人阶级，再也不能维护他们的经济政治统治了。到那个时候，不仅革命形势必将出现，而且无产阶级一定会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二、关于俄国、中国等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先一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问题。

有人常常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唯物史观思想时的名言：“无论那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④。现代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有能够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⑤。为的是要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大工业生

产落后的国家，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是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则，就是“失常”，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当年考茨基曾以此攻击过俄国十月革命，攻击列宁创建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过是一种新型的专制主义。在我国遭受十年内乱之后，有人又称我们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就搞社会主义，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说什么我们建立的充其量不过是刘邦、朱元璋式的封建的农业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革命实践，真的违反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呢？还是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作了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了呢？如何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论，来正确分析俄国、中国等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先一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

（1）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唯物史观时，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上述名言，是完全正确的。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社会革命发生的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梯上，一种制度要代替另一种制度，没有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以往的社会制度更替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要代替资本主义也必然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④但决不能由此把马克思主义这种正确的见解曲解为：世界上一切民族、国家或地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

的经济政治变化，都必须一步一步沿着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顺序前进，不允许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使革命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出现跳跃式的能够缩短其历史发展进程的前进步伐。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时候，不仅没有排除而且明确指出在一定条件下，个别民族、国家，或地区出现跳跃式前进的可能性。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不仅探讨了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先进国家的帮助下，不必经过象西欧那样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而且分析了当时小农仍占多数的法国、德国，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及其应遵循的原则，就是有力的证明。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梯上不会出现跳跃，与在一定条件下，个别民族、国家或地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上可能出现跳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既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恩格斯曾经讲过：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可以作第一提琴手。根据他们对英、法、德革命问题的分析，实际上也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也可以作第一提琴手。虽然，他们当时还没有直接得出这一结论。

（2）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各国无产阶级、包括后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地方，无产阶级就能够因势利导，夺取革命胜利。

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使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

体系从整体上为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具体表现在：

(一) 资本主义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开矿山、建铁路、办工厂，用血与火的手段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广到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和地区。它使以前世界各国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解体，使这些国家被迫脱离了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规”，其“发展已经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④。“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合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⑤

(二) 资本主义大工业到处开辟基地、占领市场的必然结果，就是它创造了产业工人阶级，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掘墓人，从而也就为全世界人民获得社会解放创造了阶级条件。资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掠夺最大的超额利润为目的。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经济、军事优势敲开各地封建主、农奴主们闭关自守的大门，使他们臣服自己；另一方面又绝不允许当地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任何独立的发展，更不允许他们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一切就迫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人民在反抗当地封建主、农奴主野蛮落后统治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一切妨碍他们走上独立富强之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工厂产生、聚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则是这些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最坚决的革命先锋。

(三)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各国为

了争夺霸权，为了掠夺更大的超额利润，它们不惜把帝国主义战争强加到全世界人民的头上。这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清了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垄断资产阶级被迫在世界各地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④。

上述情况说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及其必然产物——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越来越成熟了。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与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他们就能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统治最薄弱的地方，首先夺取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等国家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时代条件下，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必然产物。

拿我国来讲，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所指出的方向，在发动、组织、武装亿万农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官僚垄断资本，实行了土地改革，牢固地掌握了全国的经济、政治领导权之后，就不失时机的经过一段过渡时期，使新民主主义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中国之需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壮举。它不仅不是离开人类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

的大道出现的失常现象，而且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即整个人类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条件下，合乎中国实际的正常发展。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我们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⑤

俄国、中国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明：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在客观上已为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就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能否取得革命胜利，不决定于它们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在国际国内条件下的交互影响下，在他们那里是否已形成了直接的成熟的革命形势，和能够正确把握这种形势，制定出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战略与策略，敢于和善于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去夺取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就能够先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当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3）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俄国、中国等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先一步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能够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已不是个可能性问题，而是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么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后，到底能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缩短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呢？事实也已经作了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刚刚取得胜

利的时候，还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它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用斯大林的话讲，差不多落后了一百年。但俄国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从1917年取得政权到1939年苏德战争爆发，虽然总时间是二十二年，除去四年内战，建设时间就不到二十年了），就把苏联建设成当时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强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不仅拯救了俄国本身，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拯救了欧洲和全世界。再拿我国来讲，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们仅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把一个经济上十分落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建设成为一个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工业的发展速度讲，从1952年算起，到1978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起几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高达百分之十一点二，是当今世界上同一时期最高的平均增长速度。如果从世界范围内作点历史比较，可以进一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1870年，全世界钢的总产量是52万吨，铁1400万吨，石油80万吨。用了三十年时间到1900年，分别达到钢2830万吨，铁4100万吨，石油2000万吨。我们国家1957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铁594万吨，石油146万吨，大体上相当于或略高于（如钢、石油）1870年全世界钢、铁、石油的总产量。但我们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到1978年就分别达到钢3178万吨，铁3479万吨，石油10405万吨，超过了（如钢、石油）1900年全世界钢、铁、石油的总产量^①。这就是说，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比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快，而且比它们在高

速发展时期还要快。这里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十年内乱那样严重的挫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可以取得更大的建设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政治形势迅速好转，尤其是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普遍处在全面的滞胀、衰退之中，惟独我国蒸蒸日上，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能够取得政权，而且能够凭借政权，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高速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4）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成为现实，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也仅仅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由于没有经验，由于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对我们现在在经济上还比较落后的状态，对我们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应当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有人说，不管怎么讲，我们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毕竟还很落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事实，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再优越的社会制度，它本身只是为创造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创造条件，开辟道路，并不是它本身就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斯大林同志讲的好，要证明一种制度的优越性，其产生、巩固和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封建制度差不多用了二百年，资本主义差不多用了一百多年，我们用不了那么多时间，但也不能看成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从经济上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要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社会生产力，

没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艰苦创业过程是不行的^②。我们不必为现在还比较落后而叹息，需要的是用实际行动，来缩短我们的历史发展进程，迎头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人说，我们出现了那么多失误，失去了那么多宝贵时间，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气馁，而动摇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前进的信心。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有多种原因，但主要是实践认识问题。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因出现失误或严重挫折而失掉前进的勇气和信心是没有道理的。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设想自己从事的事业是一帆风顺的，从来就不会被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挫折所吓倒，总是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提高认识，以获得更大的历史进步。中国共产党人从严重的挫折中找到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满怀信心地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只要我们能严肃的实事求是的对待错误，我们就一定能更好的前进。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是唯一科学的社会革命理论，因为它根植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上；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因为它根植于当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上。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光辉胜利，说明它在世界、在中国的大地上深深扎下了根；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它在中国的实践中出现的失误或挫折，说明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使理论变成现实，是一件不容易的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要经过千百万人民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

才能结合好，才能使理论变成现实，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列宁说得好：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把握经济进化（社会存在的进化）这个客观逻辑的一切主要之点，以便使我们自己的社会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之相适应^③。我们应当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来说明当代的社会革命问题^④。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占领和巩固的基本阵地。由此，不仅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我们的理论根基，而且必然能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必胜信念，必然能对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特殊性，作出科学的有力的说明，必然能探索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能坚定不移的循此前进，我们正在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就一定会获得更大的胜利。

注：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
-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468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
- 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5页。
- ⑨ 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2页。
- ⑩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
-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

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页。

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9—310页。

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83—2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页。

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0页。

⑱《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页。

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53—254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5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6页。

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

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312页。

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312页。

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487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

㉙《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㉚《列宁选集》第4卷，第709页。

㉛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2页。

㉜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4—206页。

㉝《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

㉞《列宁选集》第3卷，第546页。

㉟《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3页。

㊱引自史象春、樊素洁《战后帝国主义腐朽性的一些资料》。见人大《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

㊲《列宁选集》第4卷，第239页。

㊳《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

- ③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2页。
- ④⑩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2—273页。
- ④⑪ 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119页。
- ④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7页。
- ④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 ④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 ④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611页。
- ④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 ④⑰ 《列宁选集》第4卷，第709页。
- ④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1—362页。
- ④⑲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0—252页。
- ⑤⑰ 见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⑤⑱ 比较数字引自《调查与研究》1981年第81期。
- ⑤⑲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98页。
- ⑤⑳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页。
- ⑤㉑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0页。

试论马克思的 民主理论及其意义

李远金 梁亚栋 郭欣耕

马克思在半个世纪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指明了康庄大道，也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财富。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就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民主理论，既是无产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完满体现，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和民主制度的指导原则。

一

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形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当时国际无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实践的产物。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

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逐渐摆脱了那种捣毁机器、破坏工厂的自发斗争方式，开始走上罢工、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斗争的新阶段。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提出了集会、结社权利的民主要求，并在资产阶级拒绝这一要求后，直接发展为武装起义，进一步提出了“推翻富人政权，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836年，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大宪章运动。在《人民宪章》中，提出了实行普选权，按照民主原则改组下议院，让工人参加国家管理的要求。1844年，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武装起义中，明确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实践，迫切要求从理论上对民主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马克思适应了这一斗争需要，创立了无产阶级民主理论。

其次，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早期无产阶级愿望、要求的理论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备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心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思想家，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其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和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未来的理想社会作了一定探讨和猜测。在圣西门理想的“实业制度”中，主张由生产者（即实业家）和学者掌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认为“一切人都应当劳动”，不承认各种特权，使一切人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平等和自由。他指出，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政治统治变为

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傅立叶在他的著作中，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提出了自由劳动，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许多合理的思想。欧文在从事社会主义实验和关于“劳动公社”的设想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和按需分配的主张，认为劳动公社是“根据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权利平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反对按照阶级和职业划分社会地位的不合理现象。这些思想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猜测，不仅唤起了无产阶级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而且，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无产阶级民主理论提供了思想材料。马克思继承了他们学说中的一切合理成分，批判了他们脱离社会经济发展、鼓吹超阶级民主的倾向，创立了科学的无产阶级民主理论。因为“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①

再次，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1842年春，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以后，他把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了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在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否定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认为现存的国家制度是不合理的，必须用“民主”的国家来代替。马克思仔细分析和比较了君主制度与资产阶级代议制度，指出：君主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专制主义，脱离人民；资产阶级代议制虽然比较君主制的专横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它却是“公开的矛盾”，因为它具有形式主义的性质，它与人民对立。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同时，马克思

提出了人民应在国家活动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他写道：

“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②。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早期批判中，已经提出了用人民的民主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

从1844年夏天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进一步深入到它的经济根源方面。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法律、民主的局限性，及其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关系。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资产阶级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④。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要争得民主、自由，实现自己的解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总之，马克思正是在西欧工人阶级争取民主斗争蓬勃发展的客观条件下，在吸取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材料的基础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提出并创立了科学的无产阶级民主理论。

诚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首次以比较完备的形式公诸于世的，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

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论证了无产阶级争得民主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自身经济解放的关系。尔后，通过对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马克思剖析了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反动实质，得出了无产阶级要争得民主和自由就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新结论，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态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分析，论证了无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关系，指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道路。巴黎公社革命期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无产阶级首创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时，也特别重视研究和概括从事无产阶级民主的初步实践，发现和肯定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新形式——巴黎公社民主制，高度赞扬和评价了公社实施的民主措施，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楷模，绘制了蓝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论调和自由人民国家观点时，多次强调了民主的阶级性，揭示了无产阶级平等、自由口号的实际内容，进一步指出了民主的发展方向。

二

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内容极其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详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结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必然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辩证统一，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所以，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命题中，不可避免地包括着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必然性。

首先，无产阶级民主必然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是由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黑暗的君主专制相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曾经是反对封建制度的锐利武器。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依然是建立在私有制、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产阶级民主是为一小撮有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资本的自由，资产阶级平等仅仅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尤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就日益走向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敌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日益暴露出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当巴黎的无产阶级在卡芬雅克的屠刀下，呻吟、流血的时候，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布，被彻底撕破了，资产阶级的博爱、自由、平等，就是内战、步兵、炮兵。资产阶级民主的这种狭隘性虚伪性和反动性，决定了它必然要被一种高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所取代。

其次，无产阶级民主必然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是一

个备受资本剥削奴役的阶级，但是，马克思正是从这个阶级身上看到了推翻旧世界的伟大力量。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因为它与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是新的生产力的直接代表者；无产阶级是最有纪律和组织性的阶级，机器大生产的经济联系把他们训练成一个整体。无产阶级的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它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又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缔造者。无产阶级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不仅会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千百倍的经济制度，也一定会创造出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千百倍的政治制度。

第二，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不仅论述了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揭示了民主概念的根本涵义。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有多种含义，但是，它首先指的是一种国家形态，国家形式。马克思指出，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既指国体，又指政体，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特别是那个阶级居于国家的统治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国家政权的性质。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对国家的最高管理权。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⑤。争得民主和夺取政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夺取政权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第一步，争得民主又是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的重要保证。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夕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尔·海因岑的批判中，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针对海因岑把改造德国的问题归结为用资产阶级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主张，把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最终目标的说教，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争取民主和自由是必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但这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所以，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根本不是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⑥

“民主”即人民的权力。由于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所以，无产阶级一旦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既是对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又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民主与专政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主离不开专政，专政也离不开民主。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镇压他们的反抗，才谈得上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可言。

民主意味着平等，民主与自由、平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在论述民主与专政的对立统一关系时，还揭示了无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实际内容。自由、平等同民主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自由、纯粹的民主，超阶级的平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考察了平等这一口号在无产阶级斗争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含义后指出：无产阶级平等的实际内

容是消灭阶级，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就必然要流于谬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使国家消亡。所以，“自由人民国家”的口号，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而是庸俗民主派的幻想。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① 在于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自由、平等内容的揭示，划清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界限，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民主将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第三，无产阶级民主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保证和必要手段。

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它同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不仅要受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且，归根到底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马克思正是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上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对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巨大作用。

无产阶级的解放，既包括政治解放，也包括经济解放。政治解放也是为了最终实现经济上的解放。在阐述共产主义革命时，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概括为五个字——废除私有制，因为私有制乃是造成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奴役的根源。马克思在宣传动员无产阶级，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时，反复指出谋求经济解放，始终是工人阶级奋斗的“伟大目标”。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形成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则是实现经济解放的前提。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

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④这就明确提出了要用民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问题。

同时，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也必须建立在经济解放的基础之上。“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⑤无产阶级只有在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才能使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得到物质上的可靠保证。没有经济上的民主，政治上的民主也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使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生产领域里的真正主人。从而把无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扩大到经济生活中去，使民主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保证。

第四，巴黎公社民主制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崭新形式。

无产阶级民主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完全是依靠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经验来回答的。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实现了工人阶级的统治，创立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新形式。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实行的民主措施。这些措施，充分说明巴黎公社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质区别。巴黎公社第一次打破了等级授权制、官职终身制，实行一切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取消一切特权。这就不但使社

会公职不再成为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能有效地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蜕化变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尽管巴黎公社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初步尝试，它还不够完善，但是，巴黎公社民主制的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为无产阶级建立、健全民主制提供了典范。

民主制的形式问题也就是国家的政体问题。在政体问题上，马克思并不是认为只有一种形式。如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有君主立宪制，也有共和制的等多种形式，但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私有制之上的，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样。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也应当根据各国民族的特点、习惯、风俗而有所不同。各国无产阶级应当在本国的实际情况下，创造出无产阶级民主新形式。

第五，无产阶级民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来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建立、健全和发展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实现对剥夺者的剥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逐步造成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来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状况。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⑩。

既然无产阶级民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就必然涉及到民主的发展方向问题。马克思指出，民主的一定形式及其发展程度，总是受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水平制约的。所以，必然的逻辑是，随着每一时代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民主也不可遏止地趋向更高级的形式。作为

国家形态的民主，最终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转化是在顶峰发生的，民主的消亡必须以民主的充分发展作为前提。

上面所述，只涉及马克思民主理论的一些主要之点，远未包括它的全部。仅此，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它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是我国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迫切需要。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这标志着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二大集中全党的智慧，吸取了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国三十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强调了民主不仅仅是手段的思想。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尤其是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

逆施，肆意破坏、践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这个严重的教训，使我们党深深感到发展民主对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既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保证，又是我们的根本目标。这就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充分体现着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思想。

第二，再次强调，我国的政治制度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绝不会局限于一种形式，只有一种模式。截止目前，有巴黎公社的形式，有苏维埃的形式，有工人自治的形式，有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一方面保证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保证对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它是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适合我国国情和革命传统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种形式突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点，有利于极大地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积极性。

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下，人民的民主生活习惯也较差，封建主义的裙带关系、特权思想的遗毒，还有广泛影响，遵纪守法，按法律办事的观念比较淡薄。这就决定了必须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符合我国的国情。马克思早就指出，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有法律作保障。他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

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⑩我国十年内乱期间，人民民主丧失殆尽，一条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法制不健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民主得以发扬，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法制建设。据统计，近几年我国制定和颁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基本法律、法规、法令、条例共三百多个。从而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进程，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日益稳定和巩固。这是马克思关于民主与法制不可分割思想在我国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日益显示出它巨大的优越性。

第四，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向纵深方面发展。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不仅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而且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如城市居民委员会、乡镇村民委员会的民主自治）。这就既指出了民主发展的广度，又指出了民主发展的深度。使民主成为人民自我教育的方法，成为人与人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正确关系的准则，成为我国人民的习惯。民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充分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它又是经过努力完全能够达到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蓬勃发展，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大大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总之，十二大提出的关于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方

针，运用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基本观点，结合我国的国情，科学地解决了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民主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民主与党的领导等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才能深刻理解党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为我国的民主建设贡献力量。

其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也是在国际范围内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近几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动思潮。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极力“复活”伯恩施坦、考茨基主义。他们说，“伯恩施坦比其他人更有远见”，他的“历史功绩”是抛弃了马克思的“专政社会主义”，发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又说，“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绝不是左的色彩的理论”，而是“当今世界上社会民主党人唯一可以接受的选择”^⑩。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专政社会主义”，把专政同民主肆意割裂的论调，完全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是对马克思民主理论的根本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攻击。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我们必须不断提高我们的鉴别力和战斗力。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对于捍卫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怀着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纪念马克思，学习马克思，捍卫马克思的学说，为实践和推进马克思的民主理论而奋斗！

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永放光辉！

注：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316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页。
- ④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66年俄文版，第97页。
-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220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6、337页。
- ⑦ 《哥达纲领批判》1965年版，第21页。
- ⑨⑩ 《法兰西内战》1961年版，第58、59页。
-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
- ⑫ 参见西德社会民主党G·列尔斯、Tn·萨拉增、F·什普列耶尔等人的《批判唯理论和社会民主党》文集。

马克思的实践观 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

彭 树 智

我们党的十二大文件全面地论证了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实践与共产主义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共产主义首先是一个运动”作为一个重大课题突出地提了出来。我们党这样强调共产主义实践的地位，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也具有指导作用。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实践中发现了并创立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后又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实践观点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艰苦战斗的一生。实践观点指导着马克思为追求和捍卫真理而奋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结合十二大文件的学习，探讨马克思的实践观在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中的作用，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

十二大文件在论证共产主义实践问题时，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名言：“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合撰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体现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两位奠基人的集体智慧，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最后形成的重要标志。属于这类标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著作有：《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了共产主义理论，第一次从哲学理论上论证了共产主义。这个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后来的科学活动和实际活动的基础。马克思经过了辛勤的探索 and 劳动之后，完全确信，共产主义提供给无产阶级的不是幻想和臆造的社会改革方案，而是严密的理论纲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把共产主义概括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是他以前著作中关于实践观点发展的总结，又是以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发展的出发点。不久，马克思就用更精确的形式和更完整的内容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明的结论，用纲领形式公之于世，这便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是从人类认识的最抽象领域——哲学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早在他二十三岁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从哲学干预生活的角度来考察道德问题。他主张哲学的任务在改造世界。认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就是它的损失”^①强调了哲学和生活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说，一旦哲学转向实际，就使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哲学本身也就从纯理论变为实际生活的

表现。他在博士论文笔记中还形象地写道：哲学“象普罗米修士从天上盗火下来，使人们建设家园、定居地上一样，哲学应当影响世界，再次改变世界的面貌。”^②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未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初萌芽。当然，马克思这时还是一个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但他在这篇博士论文中公开发表了无神论的观点，这在原则上又同唯心主义是不相容的。在诸如此类问题上的独立见解，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的继续探索，促使他不久便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发展。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决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当时社会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顺应时代的要求，利用时代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通过勤奋的实践探索，才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变为现实性。在这个形成过程中，除了马克思的个人天赋条件以外，主要是充满着无比活力的实践观点，在指导着马克思的前进道路。在马克思的同时代的人们中，有许多思想家也在抨击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探索人类美好的理想制度。但是，由于他们从主观臆想出发，脱离实际、脱离革命实践去虚构未来社会的理论体系，因而不能担负起创立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重任。他们达到的思想高峰，充其量是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马克思比他们高明之处，就在于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出发，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应当追溯到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和《莱茵报》的被查封。他在给卢格的信中说：“伪善、愚昧、粗暴的专断使我感到厌倦，委曲求全、周旋应付和字斟句酌地对付吹毛求疵的生活也使我过够了。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③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时期。《莱茵报》的被查封，成了马克思生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革命民主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阶段的终结和社会的、精神的新方向——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始。马克思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他在博士论文中已经得出了精神和周围世界关系的新结论：行动，即把实践提上了议事日程。马克思曾经和布鲁诺·鲍威尔一起试图通过哲学的批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马克思认识到哲学的批判并不能促使他积极地参加政治实践，便通过担任《莱茵报》主编而直接投身于革命实践之中。在柏林，他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从哲学的观点来讨论宗教和政治问题；在科伦，作为《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深感自己处在一个经济生活的中心，人们从冷静的、实际的资产阶级立场来讨论社会经济问题。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通过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明确了光靠哲学的批判并不能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要探求观念的根源，必须深入现实实践。

由此看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主要问题。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理论家，都曾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没有成功。契希考斯基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了用“行动哲学”的办法来解决。他认为从理论转向实践的过渡环节是从思维到行动。由于他同黑格尔

一样相信理性和理论的创造力，因而没有实际力量。契希考斯基提出了“行动哲学”。但并没有说明这种“行动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性质和什么形式才能走向实践。结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布鲁诺·鲍威尔另外提出一个解决的途径，叫做“批判哲学”。意思是揭露和批判现存事物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用哲学的批判力量去改变现存事物。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如果你想要献身于实际的事业，那将是不明智的。理论现在是最有力的实践，而我们还完全不能预见，它将在怎样广泛的意义上变成实践。”^④他的途径是一种思想运动，是对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进行不断的批判，从而促进普遍自我意识的发展，而不是对现存事物进行革命的改造。后来，在反动势力的压力下，他和他的拥护者离开了积极政治斗争的道路，把批判变成了目的本身，进而走向了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同这些人不同，他主张哲学应当积极干预政治，应当抨击私有制，进而废除私有制。他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社会政治出发，到社会关系中去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使他同青年黑格尔派分手，走向了共产主义。

作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的开始，是他1844年3月写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1月，马克思来到了被称为世界社会主义思想中心的巴黎。以后，马克思多次旅居巴黎。但是，第一次这一年半在巴黎的逗留，使马克思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把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确立为毕生使命。巴黎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文化和政治中心，这里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有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传统，有讨论各种不

同社会主义学说的自由气氛，而且是各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领袖的聚集地。马克思在巴黎亲身体会到法国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研究了卡贝、德萨米和布朗基的空想共产主义。他同巴黎工人的秘密团体接触，同“正义者同盟”保持着联系，对工人群众抱着深厚的同情。法国工人群众的信心、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们满足于交际、联合以冀仍然以交际为目的的晤谈；在他们的口里，人类的兄弟情谊不是空话，而是真理，他们因为劳动而变得粗糙的脸对我们闪耀着人类尊严的光彩。”^⑤这些从实践中带来的感受，使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实践观点使他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刊登在《德法年鉴》双刊号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第一批著作。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驳斥了鲍威尔关于从宗教中解放犹太人的观点，提出了犹太人的解放这个局部问题应当服从人类从社会和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总问题，应当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阻碍人类解放的根源。他虽然在许多方面还引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有时赋予自己的含义（如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但已经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革命，才是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这篇文章清楚地反映了他参加巴黎无产阶级实践活动给他带来的影响。他现在已经

把无产阶级看成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先进阶级。这种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使马克思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中，跨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理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强调先进理论在根本改造社会斗争中的巨大作用，指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他同时强调，无产阶级是真正运用革命理论并把它付诸实践的物质力量，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⑥

但是，这时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还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激化。恩格斯在 同一期《德法年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启发了他，使他认识到只有从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规律中，才能更切实地推演出共产主义革命必然性的结论来。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角度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时把这种研究同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密切结合起来。据卢森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中统计，马克思在 1843 年研究了布阿吉尔贝尔、魁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近二十个经济学家的著作，写成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分析中，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把消灭“异化”（人的异己化或人的非人化）理解为人获得自身解放的必备条件。马克思是从共产主义观点出发，把“异化”解释为压抑

人的劳动的“异化”，把“异化”理解为私有制直接的结果。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主要揭露了“异化”和“异化劳动”范畴的实质。“异化劳动”表现为财产越来越不平等和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日益尖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的最早萌芽。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人的任何“异化”和“自我异化”的高级社会形态，也是消灭了经济 and 意识领域的“异化”（包括任何宗教异化）的高级形态。马克思在这里用他赋予辩证意义的异化概念，对劳动者的劳动同劳动者本身的对立及其特殊意义，作出了哲理的解剖，有助于人们从特殊的社会历史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关系的特点。他把社会关系的改造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正是实践观点使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人不加阶级区分）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把劳动、劳动者作为社会实践的基本概念提出了。由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中的地位，因而以后更多地用实践的概念代替了异化概念。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进一步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已经为这个胜利准备了条件。他强调说，仅仅有共产主义理论还不能取得胜利，而且必须有共产主义的实践。他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当中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⑥从这里可以看出，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的论断，正是这段话的再一次明确表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共产主义实践，还表现在它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命题上。这个命题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这个命题虽然还不成熟，但内容丰富，是共产主义实践观的表现。

当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某些观点。例如，费尔巴哈的“类的本质”和“异化”等概念和术语，在手稿中就屡见不鲜。只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才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影响。1844年11月29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共产主义思想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迫切要求，是他们二人志同道合联结在一起的最重要的特征。他们二人通过不同途径达到共产主义，并以各自的特点进行合作的科学成果《神圣家族》，把共产主义的实践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恩格斯强调说：“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⑧他又说：“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人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⑨青年黑格尔派深深陷入思辨哲学之中的倾向，那种完全脱离现实世界和具体实践的道路，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批判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当青年黑格尔派诬蔑西里西亚职工起义时，马克思起来为这次工人起义辩护。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次起义，认为这是德国工人的第一次发动，即使它是地方性的局部的起义，但毕竟是一次力求消灭资本主义关系的社会革命。马克思说，青年黑格尔的“批判哲学”什么也没有做，只有工人的革命实践才在改造世界。这些分析说明了马克思已经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来

为共产主义的实践大声疾呼。毫无疑问，这样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是有说服力的。

《神圣家族》第一次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作用是由社会经济条件所制约的思想。它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和无产阶级这两股对抗力量的发展，又论述了资本主义剥削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得出了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结论。同时，这本书进一步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虽然它仍用费尔巴哈一些术语（例如作者自称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者”），但这种称呼已经加进了同费尔巴哈完全相反的内容。实践观点使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建立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把人同人的关系看成是社会关系。这样，便摆脱了黑格尔借助于意识而实现的唯心主义的发展观，又纠正了费尔巴哈把人同人的关系看成自然关系和直观对象的形而上学。

因此，《神圣家族》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本著作中，他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理论，并没有直接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1845年春季，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提纲既包含着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局限性的批判，又表现了基于实践观点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天才萌芽。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把实践归结为纯理论活动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集中到一点，即指出了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实践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用革命的实践来对抗费尔巴哈的直观，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对抗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他在提纲的第一条中写

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世界，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实践。”④通观整个提纲，费尔巴哈的“异化”、“类的本质”等概念和术语，完全被“实践”、“革命实践”所代替了。

最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最后完成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著作。它综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智慧。恩格斯在马克思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同时，也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从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方面作了有力的补充。接着在1845年夏，在恩格斯的陪伴下，马克思对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了一个多月的考察。他直接观察、了解了英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象和英国的工人运动。更重要的是，在恩格斯帮助下，马克思不仅参观了伦敦和曼彻斯特，而且同宪章派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乔治·朱利安·哈尼、厄内斯特·琼斯等人接触。这就扩大了他的实际知识和政治经济领域的视野。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写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本书中，他们批判了布鲁诺·施蒂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一次系统而概括地创立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为了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始，就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分析了人类历

史上的时代和时期，确立了以生产方式为轴心的各种社会发展形态，研究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在这里，实践观点又一次引导马克思作出了只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实践，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他指出，根据历史的实际发展，“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①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成果。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靠思辨制定出未来社会的计划，而是客观的历史过程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只能根据现实社会发展趋势预见某些方面，而不能象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去描绘共产主义制度的详细结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国家消失；城市与乡村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消失；劳动变为自主活动；社会变成人们的真正联合体，以支配社会生活；人们改造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改造自身。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实践是革命实践，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②这是他以最概括的形式第一次提出和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还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和以前各种社会革命的根本不同在于它要消灭一切私有制。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立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后，并不去脱离实际地去规定未来社会的计划，而是把重点放在共产主义实践上。他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真理，即通过共产主义实践而不

断完善共产主义思想，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情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④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通过这些分析，向我们提出了哪些启示性的结论呢？

首先，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在《莱茵报》主编岗位上的战斗和在巴黎、伦敦同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联系，对黑格尔的、费尔巴哈的及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的著作的探讨，这两条发展轨迹象纵横交错的曲线一样，交织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马克思在巴黎就住在工人区，经常和工人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也参加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的集会，倾听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热烈辩论。他深有体会地劝费尔巴哈说：“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底高尚”，“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④这种鲜明的无产阶级感情和立场，从纯理论探讨中是不能产生的。理论脱离实践，这是费尔巴哈的致命之处，更不用说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了。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是马克思能够始终坚持实践观点，从而创造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原因。

十二大文件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实践的重要论断，就是马克思把实践观点运用于解决共产主义

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关系的结果。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以后，马克思更自觉、更积极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为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他组织了“布鲁塞尔国际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通过《布鲁塞尔日报》，用共产主义思想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1847年，1月，他参加“正义者同盟”（后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1月，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8年初，在欧洲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他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综合和概括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以纲领的形式，宣告了国际共产主义伟大实践的开始。从此以后，历经一百二十多年的实践，终于形成了今天全世界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

其次，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表现了他的求实的科学精神。马克思尊重实际，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一切理论，用社会实践来审查检验一切理论，用科学的批判精神来决定对一切理论的取舍扬弃。他从不迷信权威和书本，更不幻想和虚构未来的理想方案，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形成的。在这个斗争中，他不但勇于清算自己的不合实际的思想，也敢于向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思想挑战，还善于吸取和改造一切对共产主义有用的思想。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列宁后来总结的曲折探索过程，即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辩证）唯物主义。”^⑩马克思这种求实的科学精神，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正确处理实践和观念的位置问题。他认为，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而不应该“从观念出发来解释

实践”^⑥。正是这种可贵的求实的科学精神，才促使马克思不畏艰苦，锲而不舍，辛勤探索，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攀登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高峰。

最后，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实践观点在马克思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兼有的双重品质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时发表的讲演中，称马克思是科学巨匠，同时又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的毕生使命就是从事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马克思之所以重视科学，也在于他把科学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马克思这种兼有革命家和学者的品质，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一切巨人：与同时代脱离实际的思想理论的巨人相比，他具有丰富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经验，这正是他获得共产主义科学真理的重要源泉；与同时代缺乏文化理论修养的工人革命巨人相比，他又具有高度学识和思想水平，有吸取和改造人类思想和优秀文化成果的优越条件。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是工人运动的自发产物。一个人从事社会的直接实践是有限的，大量的社会实践是依靠吸取前人和别人的实践成果、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革命经验而取得的。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比他同时代的工人活动家要高出一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⑦。这种兼有革命家和学者的品质，决定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总是把无产阶级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结合在一起，把理论活动 and 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使理论活动和实际政治活动融为统一的整体。他总是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从

而把实践中的难题作为研究课题，一次又一次埋头于书山之中进行研究；他也总是把革命经验和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加以总结概括，上升为理论，一次又一次投身于群众社会实践的海洋之中进行检验。马克思这种勇往直前追求真理的精神，终于创造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

总起来说，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实践在这里起着决定的作用。实践性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固有特点。共产主义者从来是不尚空谈，而是注重实践、注重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同马克思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无比繁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待我们去研讨。我们的时代赋予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经历的曲折道路和经验，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和实践观点的重要性，仍然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作用。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让我们在坚持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刻苦学习，不屈不挠，励志改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英勇奋进！

注：

- ①《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文版序，第65页。
- ②《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卷，第491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第255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编，第1卷，下册，第250页。
- ⑤《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版，第607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9、15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2卷，第140页。
-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2、160页。
-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4页。
-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78页。
-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8页。
-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0页。
-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50—451页。
- 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386—387页。
- 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43页。
- 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4—775页。

马克思主义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谭冰石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忠诚地继承马克思不可磨灭的伟大科学贡献，和他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光辉业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推向前进。

马克思是伟大的“科学巨匠”，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使他成为“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①。马克思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②马克思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的科学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开创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之所以伟大，正如梅林所

说：“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同他最亲密的朋友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给工人阶级指明了解放之路。在他们之后，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今，无论从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看，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且郑重地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写进了新党章和新宪法。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更强调指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并对此作了精辟阐述。我们党非常鲜明、非常突出地从战略高度提出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和实践，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思想光辉。

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推进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的著作中，关于两个文明建设的

基本思想，特别是他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揭示文明的科学论点，对于理解和研究我们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课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其理论基础，把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标志之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的重要论述和基本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和开化程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肯定了摩尔根把人类社会分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个主要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指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⑤。恩格斯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称为文明时期，这说明“文明”的含义是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同时也揭示了文明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十二大报告指出：“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对文明的这种新概括，是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解释的，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释有联

系，有区别，还有发展。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须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来衡量。而物质生产的成果和精神生产的成果又总是同它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这样，历史上有原始社会的文明，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十二大对文明概念的解释更为科学和准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文明的基础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

恩格斯指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凶残和虚伪。他说：“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⑤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对剥削者是文明的东西，对被剥削者就是野蛮。文明时代正是在这种阶级对立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发

展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最初被称为文明的东西，如果到后来逐渐失去其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它就会变为不文明的落后的东西了。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关系上，论证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科学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一方面指出了“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作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⑥马克思主张，在研究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时，

“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他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不同为例，得出如下结论：“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⑦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认为发展这方面的事业，对于使劳动者摆脱愚昧、无知，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有着重大的意义。恩格斯主张“实行普遍教育”。他说：“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受了教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

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须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这些被迫堕落的受尽压迫的赤贫汉将会转变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并且为彻底改组社会开辟道路”^⑧。这说明劳动者提高文化水平，对于提高思想觉悟和改造社会的巨大促进作用。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文明关系的基本观点，对于深刻理解我们党提出的两个文明同时抓的思想是有益的，它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科学的态度去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共产主义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

他们科学地预见到，历史的发展必将出现一个以消灭阶级剥削为主要特征的、更高阶段的文明。恩格斯《在爱北裴特的演说》中深刻阐明了这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象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会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⑨。

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产品象泉水一样地涌流，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能够全面地、自由地发展他们的才

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到了那个时候，人们都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世界和对待人生。可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

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所揭示和论证的关于文明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理论基础，反映了马恩所处时代的特点。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恩设想的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新的文明的社会开始变成现实。列宁和斯大林面临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问题。他们的贡献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理论和实践上探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主要表现在：

第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达到真正高度的文明”。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明，但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可以首先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即驱逐地主、资本家，无产阶级先取得政权，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指出：“以前的革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工人不能保持牢固的专政，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⑩他提出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实行电气化，会最终奠定共产主义的基础，奠定文明生活的基础。他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出真正高度的文明。还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现代文明的支

柱”，因为它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是整个“文化”的基石^⑪。

第二，从俄国的国情出发，阐述了实行“文化变革”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发挥了文明概念的基本含义。

列宁指出，在俄国实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之后，还应当实行“文化变革”（或称“文化革命”）。这是因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⑫他肯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这个正确论点，认为不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不大大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道德水准，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斯大林也指出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⑬可见，文化变革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意义。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⑭当时他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文化方面发展苏维埃的科学、教育、卫生等事业，特别要消灭文盲，提高教师的地位等。

列宁明确指出：“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⑮这里阐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内容既有文化方面的，又有物质方面的，这是对文明概念基本含义的丰富。

第三，“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

列宁的这个教导，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精神解

放和无产阶级建设高度文明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强信念。列宁的这个思想，保证了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正确方向。

第四，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中建设更高的精神文明。

列宁和斯大林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主张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新的纪律；提倡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地为社会工作；提出处处用共产主义影响抵制资本主义习气。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⑥他赞扬这种新生事物，提倡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纪律。提出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常规，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⑦还指出“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⑧

综上所述，革命导师对文明的论述，都是和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要求紧密联系起来的。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运用“文明”的概念，贯串着一个思想：即文明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而且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我们党正是依据革命导师关于文明论述的根本思想，和数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把这些论述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了。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把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概括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把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概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且阐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指出：“两种文明的建设，

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是精神文明的核心，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所有这些，不仅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推进。

二、高度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的过程，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性质和特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从本质上区别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它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的社会时，总是谈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消灭了剥削制度，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在产品分配上，实行的是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因此要求社会成员成为“一种全新的人”。这种全面发展的新人能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生产出更丰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适应于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新的生产方式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精神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它比一切私有制社会的精神文明都高尚得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理想、道德和纪律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尚、最先进的精神文明的核心。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为某个统治阶级所占有，而是普及于整个社会，为全国人民所享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后，人民群众成了社会的主人，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科学文化不断发展的成果为整个社会所共有，人民创造文化就享有文化，创造美就享有美，人们的主观世界改造得好，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就得到发展。创造的精神财富越多，精神生活就越丰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纪律符合人民群众的目前和长远利益，能为社会成员所接受，所以，就能形成统一的社会政治思想，统一的道德和纪律观念。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第一次实现了精神文明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普遍的结合。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任务不仅是消灭私有制，还要消灭私有观念，维护和发展公有制和公有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⑤列宁也一贯强调，反对私有制、私有观念、私有心理和私有习惯。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彻底性，就在于它能彻底的改变几千年的私有制，终将清除掉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而且表现在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②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共产主义意味着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要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不仅要大大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为建成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到了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这就是达到了更高境界的共产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够永远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有这样的精神文明作为自己的特征，而与一切旧的社会形态相区别，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 物质文明的关系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们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改造主观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对于这两个文明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地阐述，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两个文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这说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别作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的辩证关系，同物质和精神是密切关联的。但是，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不简单等同于哲学上的物质和精神，也不简单等同于哲学上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物质文明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和社会存在的概念是不同的。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是指不依赖于意识而可以被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哲学上的社会存在的概念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主要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而物质文明的物质，讲的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所创造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实体，它离不开精神文明，显然同哲学上所说的物质和社会存在是不同的。

精神文明同哲学上的精神、社会意识的概念也是有区别的。哲学上所说的精神，是指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意识现象；社会意识是指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它是相对于社会存在说的。而精神文明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表现为文化方面和思想方面，这同哲学上的精神、社会意识是有区别的。弄清这些概念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两个文明的关系是有益的。

下面从五个方面来理解十二大报告中关于两个文明建设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

（一）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

第一，表现为物质条件的保证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的：历来为各种思想重重叠叠地遮蔽着的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人们必须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保证，先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然后才能去从事精神生产和其它活动。马克思说：“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②精神生产是离不开物质生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它的精神文明的建立与发展，都是依靠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作为建立与发展的保证。列宁说：“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③

第二，表现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但是精神文明的两个方面，对物质文明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精神文明的文化方面，特别是科学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手段和经济实力。它的规模、数量和技术

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精神文明的思想方面，也是受物质文明条件制约的，但这种制约作用是比较小的，它不是由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的，发展这种精神文明，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它可以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同时，达到很高的境界。

第三，表现为最后的决定作用。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理，物质文明最后决定精神文明。这种决定作用，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说的，不能把它简单化。精神生产归根到底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说，高度精神文明的最终实现，达到了人们把劳动看作是生活的需要、消灭了“奴隶般分工”的程度，只能是在高度的物质文明建立起来以后，而不可能在它之前。不文明现象的最后消灭，高度精神文明的建立，最终还是依赖于高度的物质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②

（二）社会制度对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

物质文明的实体是被加工了的自然物质，它不是经济范畴，人类生活的一切矛盾也不是从它本身产生的，它只能给这些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提供条件。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作用，从来都是同一定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可以使这两个文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腐朽的社会制度会破坏这种作用，甚至造成它们之间相互背离的状况。社会制度的性质对精神文明的发展具

有决定的作用。

代表一定的社会制度，并在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阶级，它的利益和意志，它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着和规定着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向；它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更决定着社会思想和道德风尚的根本内容，成为支配整个精神文明的核心。因此，一定的精神文明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某种精神文明的兴衰；而一定的精神文明又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成为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拿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既造成了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物质文明，又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精神文明的发展既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也有能动的创造力量。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使这两种推进精神文明的有利因素经常处于对立地位，无产阶级创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文明成果却为资产阶级独占，又反转来反对无产阶级，科学也被表现为并入资本的东西。马克思说：“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因此，资本主义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一方面又以前所未有的破坏力来摧残人类的精神文明。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从上升时期转到没落时期以后，对精神文明的破坏力也愈来愈大，以至出现物质上富有，精神上空虚，两种文明互相背离的状况，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产物。

社会主义文明是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相适应的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消灭了剥

削阶级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文明是社会的共同财富，不为少数人独占。自有文明史以来，文明的创造者第一次成了文明的主人。一切文明成果都为社会共同造福，用来提高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才能按其本性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反映。

明确社会制度对精神文明的决定作用，我们就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利用社会主义优势，来建设高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把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一，理论的指导作用。

历史上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诞生以前，就有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出现，为其开辟道路。而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诞生以后，也会有相应的精神文明与其相适应，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要建立符合当时经济基础要求的理论为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并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为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创建新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武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领导阶级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伟大阶级，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更加需要有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正确方向的保

证作用。

我们所从事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我们搞物质文明建设，就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在物质文明建设的目的、途径、方法等方面体现社会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理想、道德、纪律，是保证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武装教育群众，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中排除各种障碍，抵制一切旧传统观念的腐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从方向、道路、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等方面，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不走偏方向。

第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直接促进作用。

这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以调动积极性；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以增强建设的本领，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物质文明的发展，除了必须遵循其自身固有的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精神文明的作用，靠人的忘我劳动，靠在劳动中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靠人在集体行动中所表现的对行动规范的遵守，靠人为了追求理想和顾全大局而作出的牺牲。

不懂唯物主义的人，往往以为唯物主义者不重精神。其实不然，毛泽东同志在《读书笔记》中指出：“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他们最能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

因此，他们有最顽强的战斗性。”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能自发地建立起来。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它不可能自发建立，它只能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在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思想体系，还必须是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考察研究工作和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才能产生出来，单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够的，这只能是接受科学思想体系的有利条件。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斗争中去，而不可能从无产阶级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

任何社会的精神生产都只能从现有的思想资料出发。恩格斯说：“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②继承已有的优秀文化遗产，根据现实的需要加以改造，赋予新的内容，从而创造出更精美的成果。

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性，旧的意识形态决不因为旧的经济基础的消失而立即消失，社会上历代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它的渊源要比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久远得多，而且当代的资产阶级还在继续腐蚀和侵袭无产阶级。所以，列宁说：“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③列宁的观点，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现在。所谓物质财富丰富了，精神文明自然会好的自发论，实质上就是“放纵论”，放纵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自由泛滥，其危害性，

就是它会使人们解除思想武装，其结果两个文明都将遭到破坏。胡乔木同志说得好：“精神文明不能够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它不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或附属品，只能由思想战线全体同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长期奋斗而产生和发展”。

（五）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制度的进步，它们之间是相互适应、平衡发展的。但是，在各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上，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这三方面的发展又往往会出现不平衡、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不平衡，是由于社会制度和其它因素的影响，由于精神文明内容的广泛性同物质文明发展水平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呈现出的复杂情况。正因为存在这种不平衡性，相同发展水平的物质文明，不一定都有相同水平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水平比较低的国家，也能创造出比较高的精神文明。

在我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一定要等到物质文明已经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进行，就如同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首先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中发生一样。就“如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一样，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

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指导，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全面正确地理解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才能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才能认识到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的重大问题。这样就会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作全党的任务，当作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就会在两个文明建设中，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倾向，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就会增强人们的信心，使我们站在时代的前列，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作自己的历史责任，开拓前进。

注：

- ①②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575、134页。
- ③④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73、484—485页。
- ⑤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2和394、379页。
- ⑥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265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
-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4—615、605页。
- ⑩《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5页。
- ⑪《列宁全集》第8卷，第96页。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688、348、688、1、365、205、688页。
- ⑳《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8页。
- ㉑《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4页。
- ㉒《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53页。
-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47页。
- ㉔《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 ㉕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23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的光荣传统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张 岂 之

马克思逝世整一百年了。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它创立时起到今天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帮助人民认识本国的国情，作出了很大贡献。它在长期斗争过程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今天，我们继承这些光荣传统，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哪些光荣的传统呢？

一、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建立之初，便提出了如何才能使历史学从根本上和整个体系方面成为科学的问题。李大钊同志在《史观》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

“教化的历史观”等等，都和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发现历史的规律性。马克思“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①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以“发见因果法则”为目的，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样才能“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②。他阐述了唯物史观，认为按照唯物史观的意思，必须从经济生活条件着手来研究历史，才能揭开“历史之谜”。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③。如果不从经济生活条件的研究着手，历史的研究是难以成为科学的。蔡和森同志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初版）也论述了同样的问题。于是，这几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伟大先驱。

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真正建立起来是在三十年代，以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文化思想界展开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斗争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原理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当时社会上有一股思潮，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是普遍的真理。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专著。

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他对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研究，都是自觉地探索如何才能使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他在日本读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正如

他自己所说：“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了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地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数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④，后来，他从事中国古代文字和历史的研究，就比较自觉地运用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努力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根据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试图论述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演变规律。尽管有些材料的时代没有弄清，或由于其他原因，有的结论难免错误，但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点从《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也可以看出。这两部书都是论述先秦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涉及到文学、艺术、政治、哲学等方面。郭沫若同志在研究先秦意识形态时，从经济生活条件着手，首先研究先秦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然后据以研究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又反转过来进一步认识它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

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遵循历史唯物论的指导，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文化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在研究中有许多具体的结论并不相同，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特别是力求对历史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说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人民进行了爱国

主义、历史规律和历史知识的教育。

坚持从对经济生活条件的研究着手这一光荣传统，我们应当继续发扬广大。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研究历史，现在和今后都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保持的传统。事实证明，对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发现这些现象之间本质的内在关系。当然，重视理论并不等于忽视史料。对此，翦伯赞同志作过很好的说明，他认为：“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等于废物。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样，‘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两者’^⑥。要具有这种抽象力，即理论分析的能力，就必须学习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⑦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感性材料，史论是理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坚持史料与史论的统一。

为了促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深入发展，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形态史的研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弄清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状况，才能对这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状况作出深刻的分析，才能真正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的历史学要有很大发展，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应当是一个突破口。我们需要有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史的各种专门著作。以及分门别类的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应该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形态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

。的决定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还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加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把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与农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交通史融为一体进行研究，用历史事实证明科学技术是怎样作为生产力而推动社会经济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这对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历史工作者不仅要有广博的文史知识，还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二、从历史的现象进入历史的本质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具有这样的特色。这种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表现为从历史现象进入历史本质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结论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历史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所谓的阶级性，首先是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阐明历史的规律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其次是说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对阶级社会里的人物、事件、思想、政治制度、法律、道德规范等等，恰如其分地放在阶级关系中考察和分析。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社会关系。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这种关系伏盖着阶级的烙印。因此揭示这种社会里人类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及其关系，就不能忽视阶级关系。

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这方面的优秀传统，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着重探讨并阐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

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阶级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包括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但是，在任何时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以后，首先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就必然加强了对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农民起义对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地主经济。地主阶级占有绝大多数土地，农民大部分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只有少部分农民拥有小块土地，被称为自耕农。无论佃农还是自耕农，都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小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相比要松弛一些。在这种经济结构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地利用政权和财权的力量兼并土地，加重剥削农民。这样，自耕农便出现两极分化，佃农要承受越来越重的负担。土地兼并愈剧烈，地主阶级政治愈腐败，生活愈奢侈，广大农民愈贫困，因而社会矛盾愈激化，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就逐渐减慢、停滞，甚至会倒退。当社会矛盾达到异常激化的程度时，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往往以迅猛的威力，摧毁腐败的封建政权。新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吸取前朝覆灭的教训，在政治经济方面作出一些改革，以调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给农民以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的机会。通过这样的方式，社会矛盾得到暂时缓和，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因而社会也就前进了一大步。农民起义的爆发，决不是几个绿林好汉、草莽英雄的一时冲动，而是社

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重视的，在这方面作了认真探讨。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很典型的一例。他在该书的《绪言》中说：“本书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主人的观点否定了”^⑧。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线索，着力阐述中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的过程和历史作用。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基本上就是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包括一切被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农民战争起着速度不高的火车头作用，但决不能否定它是推动历史的火车头”^⑨。建国以后，不少史学工作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研究上来。中国农民战争的研究在史学领域里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史学界对历代农民战争及其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发表各种论文三千五百余篇，出版各种资料、专著、论集和小册子近二百种。不可否认，其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都不能掩盖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在总结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另一种倾向，即不承认农民战争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这是难以服人的。农民是小生产者，不能不具有各种弱点，即使在起来革命时也不例外。但对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弱点进行科学分析时，首先要看到农民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肯定其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农民战争阻碍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农民起义无法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因而不能称为“革命”。其实，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社会革命，表现

在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另一种是某一社会形态内部的革命，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属于后一种。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写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说：“我的《农民战争》正在完全重新修改。农民战争将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拿出来。”^⑩由此看出，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相当重视的。因此，这一光荣传统不能丢弃，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尤其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注意分析个人思想的阶级本质。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一般地说，阶级性对于社会思想的许多方面是一种本质的属性。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研究思想发展史的论著都忽视了这一点。从先秦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对于思想史研究虽然各有贡献，但都没有注意到思想的阶级性问题。《庄子·天下》首次用“风”来区分各家学说，

“风”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风格。但是，它并没有找到这种“风”的阶级根源，也不可能揭示出个人思想的阶级本质。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的思想史著作《清代学术概论》，谈到了“思潮”的来源，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但他也没有把“时代思潮”归结为与一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阶级活动，因此，“思潮”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思想史研究方面，虽然有一些可取之处，但正如吕振羽同志在一九三七年所指出的，它“根本没有触着各派哲学思想的本质，而且在上册出版

后，便不能继续下去，无异宣告其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彻底失败。”^⑪因此，编著科学的思想史，是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前的任务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侯外庐同志和杜国庠同志等在重庆酝酿《中国思想通史》的编著，就曾提到：“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计划。当时，我们受到一个推动的力量，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套《大学丛书》，其中有钱穆主编的《先秦诸子系年》等。我们不同意旧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和观点，我们确信，新的时代已经临近了，我们有责任向新一代青年提供用新观点写成的新的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最初的构思和计划，就是这样形成的”^⑫。这里所说的“新观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它的指导下，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从而将各种思潮放在阶级关系中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实质。

注意分析个人思想的阶级本质，并不是简单地根据思想家们的阶级出身，把他们的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也不是否认各种思想所特有的个性，乱贴“阶级”标签。在哲学思想之中，有些部分如从老子到王夫之、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应该说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这就需要具体的分析，既要対思想意识现象作微观考察，又要对思想意识现象作宏观考察。个人思想是对思想意识现象的微观考察，社会意识则是对思想意识现象的宏观考察。个人思想的总和，形成社会意识。一个社会、一个阶级对社会存在的意识，是离不开个人思想的。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古今中外没有两个社会经历完全相同的人，因而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个人思想。即使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人，其个

人思想也会有所不同，看不到各种思想所特有的个性，就会把丰富多彩的思想史弄成一幅枯燥无味、晦涩单调的图景。当然，沉溺于欣赏个人思想之间的特殊性，不去看他的阶级本质，也就找不到思维发展的规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根据思想家们的阶级出身，把他们的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一个阶级的思想家，就其出身而言，不一定属于这个阶级。但是由于他建立反映这个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为这个阶级服务，他也就成了这个阶级的代表。吕振羽同志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这样提到：“社会思想意识的阶级性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的，不应把个人的思想意识凝固于其出身的阶级地位”。“死死啃住每个人出身的阶级，把其思想意识看成凝固的或硬化的东西，就无法理解历史上某些人物，如墨子、杜甫、但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凯士雷等等，更无法理解历史上的许多革命人物。”

三、历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它继承了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和资产阶级历史学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并且批判了以往历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反科学的性质，使历史研究起了质变，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在历史学方面将批判与继承统一起来，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又一光荣传统。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一开始就对以往历史学中的唯心主义反科学的性质举起了批判的旗帜，但这种批判决不是那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封建时代的历史学把历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活动，曾经受到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例如，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

一二有权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但是，这种批判并未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诞生，就批判了这种唯心史观，李大钊同志的《史观》认为，“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都是“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他又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说：“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⑬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没有完全否定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评价。范文澜同志准确地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历史人物作用的态度，说：“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就他们整个阶级的地位来说，没有问题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但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也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如果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那是不对的。”^⑭接着他又具体地分析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写得形象生动，寓评论于叙事之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那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简编》中的这些章节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

后来，史学研究中一度受“左”的影响，用历史的必然性否定了个人的作用。一九六二年，翦伯赞同志曾经针对这种倾向，指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是，“历史是人的活动，所以，写历史必须写人，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作用，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反动的，只要对历史起了作用的就要写。起进步作用的人

要写，起反动作用的人也要写；只有不起作用的人可以不写”^⑮。当然，在写历史人物时，片面夸大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只有把体现历史必然性的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和个人对历史的重大影响统一起来，才能克服各种错误的倾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仅讲批判，而且还讲继承，但这种继承决不是那种肯定一切的国粹主义。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其中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中有民主性的精华，资产阶级历史学中也有它进步的一面。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也有人多少看出了物质生产条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如先秦就出现过“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东汉时王充发挥了这个观点，认为人们的善恶行为，在于他们的物质生活，在于农业生产的丰歉。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认为，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是由其生活环境所决定的。这都是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尽管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在整体上仍然是唯心的，但经过批判是可以从中吸取许多有益的东西。在数千年中，优秀史学家代不乏人，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和梁启超等，他们不仅有过闪光的思想，而且确实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二十世纪初的王国维就把考古学与史学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治史方法与西洋汉学的治史方法结合起来，成为一代史学大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没有拒绝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方面，而是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科学分析，加以改造利用，凭借优秀的遗产才发展起来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相结合，并对这些精华进行改造和吸收，这是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条件。

例如，郭沫若同志在作中国古代史研究时，就曾认真学习了王国维的著作，如《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前编》、《观堂集林》以及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甲骨文、金文的著作。他说：“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的功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了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⑩他肯定王国维在中国古代史上，在甲骨文字的解释上，建立了“划时代的不朽的伟业”。但是，郭沫若同志并没有完全拜倒在王国维的脚下，而是从他的宝贵遗产中获得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新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他没有把历史遗产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象保管员保存古纸堆那样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有分析、有批判、有改造，这就与那种肯定一切的国粹主义划清了界限。

所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批判与继承是辩证的统一。继承是批判的，批判中有继承，决不能象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那样割断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研究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四、历史学的社会应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还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即正确处理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通俗而形象的比喻，叫做“古为今用”。有人把“古为今用”解释为使史学“成为现代神学的婢女”，认为他给历史科学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应坚决加

以摈弃”。这种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林彪“四人帮”曾经利用这个口号大搞现代迷信，确实给历史科学带来过一场灾难。但是，被这伙败类利用的东西太多了，何止于此！我们不能因为林彪、“四人帮”曾经歪曲利用过这个口号，就不分清红皂白地把它摈弃。“古为今用”这个口号的提出，早在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之前，与他们并无必然的联系。它主要表明，对待历史遗产要有正确的态度，在历史研究中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要处理好古为今用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历史学家所遇到的一个共同课题。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就主张历史为现实服务。司马迁写《史记》意在“通古今之变”^①，“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②。司马光说：“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③宋神宗对他编撰的《资治通鉴》的批语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梁启超虽然提出了“为历史而历史”的口号，但他实际上也不是不赞成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他曾说：“历史的目的在于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④西方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家，也都主张历史为现实服务。如詹宁斯、桑德斯认为，写历史的准则就是从“现在的需要”出发，“经常使过去从属于现在”（《历史观和美国历史学家的史识》），这都说明，古为今用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古为今用”这个口号则是由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式提出来的，它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种

优良传统。五十年代，翦伯赞同志在《历史科学的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目前历史教学的几个问题》（《红旗》杂志1950年第10期）等文章中首先提出：历史研究要“贯彻古为今用的精神”、“总结历史上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为现代服务”。吴晗同志在《灯下集》、《学习集》中也谈到古为今用的问题，他说：“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古为今用。”

“古为今用”应该说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革命现实服务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很重视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要使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学习和研究历史。革命实践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提出需要研究的课题，而历史研究反过来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革命实践。就拿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来说，实质上是要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往何处去”，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在这场论战中，党哺育了整整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有些同志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团结了一大批史学家。这个时期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著作。我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学者在重庆成立了读书会，周恩来同志亲临指导，他指出：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对准陈

立夫的“唯生论”。当时史学工作者就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历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对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反攻，夺取全面胜利的我党我军，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因此，党中央曾通知全党，认真阅读这篇文章，从中吸取教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空前地壮大了，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都有重大的发展。但是，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解放后，“左”的影响在史学界是存在的。特别是十年动乱中，由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横行，史学园地一时榛莽丛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使历史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近几年来有了很大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固然十分重视古为今用的原则，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也没有忽视它，二者的根本区别究竟何在呢？首先在阶级性上是大不相同的。封建史学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使历史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资产阶级史学家归根到底是使历史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则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而贡献力量。由于阶级立场和目的不同，所以对待自身和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也就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时，首先要求自己是一个革命者，马克思主义不但是改造客观世界，也是

改造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这样才能对历史遗产采取科学的批判、继承的态度，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从而用历史规律的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为人民服务。最后，在不同的历史学中，古为今用的基础也不一样。封建史学家刘知几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②这个“道”是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不是，从总体上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都不懂得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他们主张的古为今用缺乏科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古为今用，则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所说的“古为今用”，主要是通过阐明历史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阐述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教育人民，为现实社会服务。如果不能从历史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不能把绚丽的历史画卷如实地展现出来，就难以认识现在和预见未来，无法给人以启示，不能给人以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教育，这样也就达不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所以，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掌握历史规律，才能使历史科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大放光彩。同时，“古为今用”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批判地吸取历史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一切合理的、有益的东西，通过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例如“任人唯贤”、“兼听则明”等政治主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亦不无裨益。在思想方面可以吸取的东西就更多了。中国古代思想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容，对于许多问题的见解至今仍不失其教益。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有些看起来距离现实很远，比如文物考古，其实它的意义极其重大。考古发现不但有助于我们

去认识历史的真面目，它同时又是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其历史知识、美学知识、工艺学知识等等的最好的素材。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离不开文化知识的积累的。总之，历史学的应用是多方面的，不能看得太狭隘。

总之，“古为今用”就是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历史的经验、历史的文化、历史的知识武装人民。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歪曲历史事实，或抓住古人一言半语加以任意解释，这些都不能正确理解“古为今用”。科学的“古为今用”，应当以还历史的真面目的实事求是原则为前提。翦伯赞同志对于如何坚持历史研究中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了很好的说明：“不要类比”，“不要影射，以古射今，以今射古”，“不要类推，一再类推就会用主观观念代替客观的历史”，“不要附会”，“不要过多地追溯和展望，应该把历史事件和人物写在他们出现的时刻”，“不要过多地引用经典著作的文句，最好把文句内容的精神体现在史实的叙述中。”^②

目前，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广大史学工作者也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局面，必须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光荣传统，并使之发扬广大。将继承与创造统一起来，我们要用历史研究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五十多年来，由于老一辈史学家的辛勤耕耘和解放后史学队伍的扩大，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历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确凿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正确，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历史在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在

前进中才能不断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需要丰富和发展。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学说，通过历史研究的科学成果，它本身就可以更加丰富，更加充实。这样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历史研究不但要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性，而更重要的是，要以新的科学成果来丰富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知道，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普遍与特殊是对立的统一，普遍寓于特殊之中，“特殊”揭示得越加深刻，那么，基于“特殊”而进行概括的“普遍”也将更加丰富。我们不但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同时也要勇于揭示历史发展中的特殊规律，将特殊与一般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样，历史的研究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地发展。我们既不能用“一般”来代替“特殊”，也不能以“特殊”来排斥“一般”。从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中可以看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国情。我国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是因为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没有硬套欧洲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也没有硬抄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硬搬外国经验。当然，对外国的有益经验应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借鉴。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本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也需要研究世界史。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历史的某些特殊规律及其丰富

内容。总之，只要我们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光荣传统，努力从事历史研究，清除过去历史研究中“左”的影响，同时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袭，用新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我们必然开创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局面。

注：

- ①②③⑬《李大钊选集》第287—288、294、335、837页。
- ④郭沫若：《十批判书》。
- ⑤⑯郭沫若：《革命春秋》第312、844页。
-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1953年版，第2页。
- ⑦⑮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 ⑧⑨⑭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10、80—81、6页。
- ⑩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64页。
- ⑪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序。
- ⑫侯外庐：《坎坷的历程》，《中国哲学史》第七辑，第329、383页。
- ⑬史马迁：《报任安书》。
- ⑭史马迁：《高祖功臣诸侯年表序》。
- ⑮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八。
- 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
- ⑰刘知几：《史通》卷十。
- ⑱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

魏野畴在陕西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刘 炳 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陕西的知识界已经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陕西，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1908年，留学日本的陕籍学生、同盟会会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井勿幕等创办了《夏声》杂志，他们在宣传西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作了片断介绍。之后，1920年夏至1921年春，由陕西省参议会议员、进步知识分子田芝芳、张仞鸣创办的《鼓昕日报》，先后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译文，刊登过列宁和李大钊的讲演词。这两种报刊对向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一定进步作用，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全面、科学的介绍，因而没有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发生多少实际影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随着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和实践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深入，通过陕籍旅外学生中的革命青年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活动，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才进入新的阶段，从此，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并日益成为党领导陕

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西北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刘天章、魏野畴、雷晋笙、李子洲、武止戈、王复生等，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陕西和西北地区生根、开花和结果，推进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都曾进行过大量的宣传工作，而其中影响最广、贡献最大者，当首推魏野畴同志。

魏野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西北地区党团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宣传活动家。先后任中共西安特支、西安地委、陕甘区委委员，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皖北特委委员，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原名魏风标，号明轩，笔名金士，1898年生于陕西兴平县。1920年冬在北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初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阶段，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反日、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使热切追求真理的野畴深受教育和鼓舞，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不久，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决心为救国救民、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1920年，他同在北京的陕西同学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等创办了向故乡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刊物《秦钟》，后又共同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参与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1921年夏回陕，先后在华县咸林中学、榆林中学、西安省立三中和一中任教。与此同时，他以很大精力从事革命活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并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积极创建和发展西北地区的党团组织，大力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斗争，在故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赴河南杨虎城国民军部队开展工作。1928年4月，在皖北领导武装暴动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一岁。魏野畴同志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不屈不挠地英勇奋斗，倾注了巨大心血，建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还有著作，我读过，写的有水平。”^①

魏野畴同志是陕西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和代表人物。他不仅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且理论修养好，学识渊博，尤谙通近代中外革命史，兼之组织能力强，作风朴实，能密切联系群众，这些素质和美德，为他富有成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条件。他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努力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运动；宣传的对象广泛，形式多样；语言朴素，通俗易懂，这是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特点。

野畴传播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活动之中，事迹很多，贡献颇著。兹就其荦荦大端，分述如下：

一、以《共进》半月刊和共进社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旅京陕籍学生曾先后创办过两种有相当影响的进步刊物，这就是《秦钟》月刊和《共进》半月刊，而真正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则是《共进》。魏野畴既是《秦钟》、《共进》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也是其热心撰稿者。

1921年10月10日，魏野畴及其他陕籍旅京学生创办了《共进》半月刊。1922年10月10日以后，这个刊物成为政治性社团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推动下，通过共进社内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努力，《共进》半月刊在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宣传。它的思想倾向、政治观点较之《秦钟》有很大的变化，宣传内容“从反对陕西的军阀统治到反对整个的中国封建军阀，从单纯反对封建军阀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从主张民主主义到主张阶级斗争，并且认识到必须以武力反对武力。这些都表明了《共进》已经走向了崭新的道路，这也说明了《共进》已基本上接受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时局的主张，成为党的外卫的进步刊物了。”^②从1923年起，《共进》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宣传。同年《共进》37号发表了《五五》一文，纪念马克思诞生105周年，文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主要著作，称颂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始祖”，“大学者而又兼大历史哲学者”，“最有力的社会主义者”。《共进》在以后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还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说明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了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主张。《共进》半月刊“同时翻印《共产主义ABC》、《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及其他小册子多种，广为传播”^③。由于《共进》有较强的革命性、战斗性，引起了敌人的震恐。1926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大共（指共产党）小共（指《共进》）都是一共”为理由，封禁了这个刊物。

《共进》半月刊不仅在陕西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发行

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甚至远销日本和欧洲各国，销售量最高达到三千多份。尽管它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它毕竟是当时在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的一块重要阵地，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共进》这方面的成就，固然不能全部归功于魏野畴，但却与他的关怀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作为这个刊物的创办人之一，他除了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资助《共进》外，还多次在《共进》上发表文章，力图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分析、评论本省和国内外重大事件，教育和激励人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

《共进》半月刊的变化，反映了共进社政治上的进步。这同样是魏野畴等人苦心擘划的结果。野畴当时被誉为“共进社的健将”。

共进社是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后起的最大进步社团之一，但它最初的主旨是“提倡文化，改造社会”，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组织上比较松弛，步调不够一致。1923年秋，魏野畴去北京，与刘天章一起对共进社进行了整顿。1924年春节期间，由他和刘天章主持召开了共进社年会，总结了以往的工作，讨论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根据会议的决定，野畴与天章一起共同起草了《共进社纲领和章程》，同年4月在共进社代表大会上通过，曾作为小册子单独发行。这个纲领关于中国现状和革命前途的论述，在其基本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社会革命论的思想。纲领写道：“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欲图侵略政策进行上便利，深表同情于国内封建的旧势力，使之宰制民众，因以遂其诈取与攫夺的野心。国内封建的旧势力，更欢迎串通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因以取得其武器、金钱与机械，以维持其在国

内征服者的地位。这种势力结合以后，使已陷入暗淡的中国人民之生活命运将永无反转的机会。”纲领鲜明地提出：

“我们以为政治问题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经济问题又是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我们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我们更彻底的主张经济的改造……俾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我们以为家庭、妇女、婚姻及一切社会之传统、风俗、习惯，皆是前代历史之残渣，只有在政治革命及生产革命之后，烈火盛焰摧陷之。”^④这个纲领标志着共进社已经摒弃了它初期的空泛主张，而代之以把政治斗争作为首要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以后，共进社有了显著的进步，政治方向更加明确了，组织上更为严密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魏野畴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共进社的活动。1925年9月，共进社在三原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魏野畴和一些代表共同提出了活动方针议案。议案在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概括地说明了革命胜利以后的基本任务。指出，要使工农大众“获得自由解放，享其应享之幸福”，惟有“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进而夺取政权”。然后，“A、实施真正的民主政治；B、发展公有的新式产业”^⑤。与此同时，他们还从陕西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开展工运、农运、学运、兵运等具体方法议案。上述议案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为大会所采纳，写进了大会宣言。

在魏野畴等人的努力下，共进社曾经是北京学生运动最

活跃的社团，社员最多时发展到一千多人，许多社员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对陕西和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利用学校讲坛，向青年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

1921年夏至1926年春，魏野畴在华县、榆林、西安等地中学执教期间，根据青年是革命的先锋，又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并充分利用学校是知识青年聚集之地，人多、面广、影响大这一有利条件，通过多种形式，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革命工作，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了传播。

魏野畴由北京回到故乡后，先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在他的倡导下，咸林中学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等课程，并聘请共产党员王复生等到校讲社会主义，从而使这所死气沉沉的中学，一度出现了新的生机。野畴回陕之前，曾在北京撰写了一部《中国近世史》，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了中国近代史，他在咸林中学就把该书作为历史教材，向学生讲授。在上历史课时，他还给学生讲社会发展史，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讲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他当年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响亮地提出人是猿猴变的，驳斥了上帝造人的邪说；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讲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批判‘英雄伟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先生还从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国内封建军阀对于帝国主义的附庸性上，讲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必要性，进而又提出我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时候，我们这些担忧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少年，已经神秘地从

魏先生的讲课里，第一次听到了‘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在世界徘徊的喜讯。”^⑥魏野畴讲历史课，内容丰富，思想新颖，讲述生动，因而深受学生欢迎。

1923年春，魏野畴怀着“拓荒”的信念，到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任国文和英语教员。他目睹这所“陕北最高学府”在封建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腐朽，学生心灵遭受摧残的状况，深感用革命思想改变这种沉闷局面的必要性。于是，他利用讲课或课余时间，向学生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引导大家学习《响导》、《新青年》、《共进》等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为了克服一些学生埋头读书，不关心国家命运的错误倾向，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他常对学生们说：

“人家拿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不起来救国，国亡了我们还能读书吗？”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整顿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社会科学等研究会，并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样，原来万马齐喑的榆中一变而为生气勃勃的新天地。在魏野畴的辛勤培育下，不少学生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在榆中学习时，就受了魏野畴很大影响。

1924年春至1926年春，魏野畴在陕西省立三中和一中任教务主任和教员期间，他在积极创建党团组织，领导革命运动的同时，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在省立三中，野畴把马克思、卢森堡、高尔基、瞿秋白的著作推荐给学生，先让他们自己阅读，提出疑难问题，然后由他辅导，循循善诱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精神实质。一次，他以《中国向何处去》、《你理想的社会》为题，在学校组织作文比赛，一个进步学生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救民，必须以俄国工农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魏野畴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经他推荐，被评为全校第一名，并获得奖励。

野畴在省立一中任教时，一天，他的学生青年团员张含辉因对基督教宣扬的“魂灵”和“灵魂”迷惑不解，特意向他请教，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解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和宗教家贩卖唯心主义的丑恶本质。他说：“我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说的灵魂，不是一回事。唯心主义鼓吹人活着有灵魂，死了有魂灵。好人的魂灵可以升天堂，坏人的魂灵就得入地狱，为人在世，要行善忌恶。”“既然这样，他们和他们的主子为什么不改恶从善？他们剥削，敲骨吸髓；他们害人，男盗女娼；他们卖国，奴颜卑膝……难道他们就不怕死了以后，魂灵被打入地狱吗？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有他们的魂灵才配升天堂，而劳动人民的魂灵只能下地狱。这不是欺骗青年人的鬼话，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吗？他们的目的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听天由命，而他们却可以胡作非为，残酷统治！”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说的‘灵魂’，是指人的精神、思想。比如，你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是信奉基督教？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灵魂。人死了，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肉体也就消灭了，但是人的精神、思想是可以流传下去的。比如，古今中外的一些伟人，就流传千古，而那些败类，却遗臭万年。”①魏野畴讲解的这些道理，一方面在实际上区分了哲学的党性，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哲学，哲学总是代表

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而唯心主义哲学则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效劳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纯洁的道德情操。这些理解和阐述，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对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他的启示和鼓励下，张含辉于1924年12月在《民生日报》上连续发表了题为《宗教家与灵魂学》的长篇文章，运用自然科学和生理学知识，驳斥了宗教迷信的谬说，宣传了唯物论和无神论，并且从中引出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结论。

三、创办《西安评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运动

魏野畴很重视舆论工具对传播革命理论的作用，他主办或参加过编辑的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报刊，除《共进》外，还有《青年生活》、《西北晨钟》、《西安评论》、《陕西国民日报》、《西北人民》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安评论》。

1924年至1925年，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了新发展，革命运动逐步展开。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宣传党的纲领和策略方针，推动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魏野畴和关中哲于1925年8月创办了理论性刊物《西安评论》。该刊共出36期，1926年3月，因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而被迫停刊。从第6期开始，它在西安各学校及三原、华县、华阴、榆林、绥德、大荔等地学校设立了代派处，还在北京、天津、开封等地发行，销路很广。

“《西安评论》大得人心。它一方面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

策策略，一方面无情揭露封建军阀等‘恶势力’的罪行，受到了西安工人、市民和青年学生的广泛同情、支持和拥护。起初，它的发行对象是中小学师生，并且以赠阅为主，印数不过五百份。后来要求订阅者越来越多，发行对象扩大到各行各业，印数增至两千，还是供不应求，曾被誉为‘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⑧

为了办好《西安评论》，魏野畴花费了许多心力。开始因为只有两个人办，事繁力单，从组稿、写稿、审稿以至编排、校对、发行，他什么都干；后来人员增加了，但重要文章他仍坚持亲自撰写。他先后在《西安评论》上发表了《本报的使命》、《农民的苦痛》、《敬告西安工友》、《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等三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锐利武器，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剖析社会现象，阐述革命道理，说理比较透彻，笔锋相当犀利，读来生动感人。这表明此时魏野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通过革命实践的陶冶，理论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宣传，渗透在对诸多问题的分析、论证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下列三个方面：

（一）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封建军阀的罪行，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针对当时一部分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面目缺乏明确而深刻的认识，野畴在许多文章中，都不惜笔墨，对这两大革命敌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有力的笞伐。文章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时，根据列宁

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正确地指出：“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帝国主义，势甚猖獗。此时为排泄过剩的机器工业产品，已经占据了全世界容易占据的市场。此时为搜集廉价的原料品，已经分划了各弱小民族的领土，此时并且为维持列强间的均势，各帝国主义国家不顾一切的为军备增加而比赛，因而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就成了他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脏物，巴尔干各小国家都成了他们角逐场上的傀儡，因而就酿起了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⑨野畴在分析中国的社会现状时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政治上的黑暗反动，以至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丧失了独立和自由。他说：“资本的帝国主义闯进了中国，即刻就把中国封建的腐旧的武力镇服了。于是海口成了外国生产〔品〕与中国原料的交换市场。资本主义的势力开始渗进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组织。帝国主义欲久据在华优越的政治经济势力，绝对不让中国政治得以独立，能自由发展其新兴的产业，所以要勾结国内封建的武力，资助各派军阀，以造成中国持续不断的内乱，这也是必然的了。”^⑩陕西虽然地处偏僻，关河阻隔，“但铁壁隔不住的外国生产品没远近的源源而来了”，加上官吏恶绅的敲榨勒索，致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打击，手工业工人和农民贫困破产，“究其原因，无非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内陆的封建社会而呈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罢了”。^⑪他怒斥帝国主义是“惨无人道的禽兽”，“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号召中国人民“向此恶魔帝国主义反攻呵！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是全民众解放之第一途径！”^⑫野畴历数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给陕西人民带来的沉重灾

难，指出反动军阀陆建章、吴新田、刘镇华等相继祸陕，

“造成了闻舍萧条，商旅停滞，典衣鬻产，啼饥号寒，十室九空，流民遍地的失业状况”^③。他认为：“在这样的陕西有百二十分之国民革命的需要了，这是客观的事实所指明。”^④这些分析和论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指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这对于教育陕西人民认清自己的敌人，坚决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论述了工农及各种革命力量团结战斗，彻底推翻统治阶级的重要性。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牢固的同盟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魏野畴在文章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并结合对革命斗争任务的阐述，宣传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宣传了党关于民主革命的策略思想，使人民群众认识自身的力量，懂得必须自己起来解放自己。他热情歌颂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指出这是中国北方农民不堪忍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万不得已才鼓噪而起的英迈的向帝国主义施以反攻”，是“广泛的伟大的群众民族运动”，“也是初期的弱小民族的反抗运动”^⑤。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特别是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有力地显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程度及伟大力量。对此，魏野畴欢欣鼓舞，他说，帝国主义的横暴，“惊醒了

沪、汉、京、津、广等中国大半面的各大城市的各阶级人民；上海十数万工人团结得和铁一般，抵死不肯上工；上海的工商学，也有了大规模的结合；各地的游行示威民众，常无虑数十万”，“这是世界史上弱小民族反抗运动中之第一次大激战吧？这诚然是中国人觉醒而联合起来一致的奋斗，要求独立与自由的千载一时之良机了！”^⑥野畴非常重视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复强调工人要建立工会，农民也要组织起来，并且多方面地具体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大声疾呼：“西安的工友们！在此时只有你们自己起来组织你们的工会，再来以团体的名义讲求改善你们的生活，维持你们的利益，联络本省及全世界的工友，无产阶级，向资本家进攻，打倒资本主义！”^⑦他坚定地说：“农民已经求死不得，走投无路了！该怎么办？只有团结起来向残害勒索人民的贼头拚命！决一死战！大家宣传农民去吧！团结起来便是势力！枪炮也打不倒的坚强势力！”^⑧对青年运动，野畴也经常给予有力的指导。1925年“九七”国耻纪念日，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在西安组织领导了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市民数万人参加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群众运动，沉重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顽固守旧势力和反动的省工会，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把斗争深入下去，他谆谆告诫青年们：“反动势力早晚还要集合起来！不要大意，然亦不要胆怯！要认清自己的阶级，对反对阶级随时提出口号奋斗！”^⑨他还强调各阶层人民必须团结起来，指出：“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之次殖民地的中国，只有遭受苦痛的各阶级民众觉悟而团结起来，以自主要求独立与自由的国民革命，才是一条唯一的出路。”^⑩

(三) 热情宣传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及其伟大历史意义，为人民指出革命斗争的方向。1925年十月革命八周年，魏野畴在《西安评论》上发表了《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一文，激情满怀地庆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得到了巩固，赞颂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写道：十月革命“成就了今日莫斯科的工农政府，巩固了俄国无产者的政权，这是人类社会演进中一个重大的浮标，以之评鹭一切的过去，以之推度一切的未来。”“自苏俄革命成功以至今日，在帝国主义整个的毒网之中已撕破了一角，透露出反帝国主义的赤旗。”文章通过对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得出了它在一些方面与中国的现状“大略相同”的结论，旨在说明中国人民只要学习十月革命的榜样，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文章还指出：“苏俄若不猛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必不能完成其历史之使命，实现人类社会最高组织之共产主义；各弱小民族亦得联合起来并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势力，同向帝国主义施以攻击，方能解放自己，获得自由与独立。各帝国主义国家及他的走狗常是站在一边的，各弱小民族各国无产阶级工人及反帝国主义国家是共同站立在一边的。目前世界之历史就是这两个营寨地对峙与冲突。被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吧！赶快联合以平等待我之苏俄，反帝国主义领导者之苏俄！”这里不仅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还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告诉人们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必须与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得到解放。

四、通过举办暑期讲习会和党员骨干训练班等形式，用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

在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把进步学生、教师或党团干部组织起来，集中一段时间，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讲授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有关课程，为党培养骨干力量，以推动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这是魏野畴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的重要方面和突出贡献之一。

1924年夏，野畴与共产党员崔孟博举办了一次暑期讲习会，吸收西安各中等学校几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对他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并讨论了开展学运等问题。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共产党员武止戈回陕建立团组织，野畴与止戈在讲习会上多次召开学生积极分子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和任务，积极为建团作准备。不久，他们便建立了西安第一个团支部。

1925年6月至7月，野畴在三原领导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时，倡议和指导渭北学联举办了一期暑期讲学会，开设的课程除教育、文学外，还有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科学概论等。他和王尚德、李子健等担任讲课任务，由他主讲社会发展简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近代革命史等。“他的讲授内容丰富，有条有理，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令人喜听。每逢野畴讲课时，除了讲学会的人以外，还有好多中学教员和工友，甚至驻军军官也都临时前来旁听，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野畴同志还参加讲学会安排的一些讨论会、辩论会，热情解答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课后，许多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常聚在他的住所，从革命的理论到革命的策略和方法以及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无所不谈。”^②

参加讲学会的有来自西安、三原(包括附近各城镇)的青年学生、小学教师共二百多人。学员们返回本地后,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对工运、农运、学运、兵运等群众运动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26年冬,围攻西安达八月之久的刘镇华匪军被赶走,随之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急需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1927年一、二月间,魏野畴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在西安领导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政治教育。与此同时,他还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榜样,主办了政治队,学员近百人,大都是省内各地推荐来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分为农运班和军事政治班。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教学方法是边学理论边参加实践,农运班经常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调查农村阶级状况,研究农民问题;军事政治班在城市建立工会,对学生进行操练等。训练班和政治队的开办,再次为党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和农运骨干力量,对推动陕西地区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魏野畴同志为在陕西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使广大人民掌握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开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前进的坦途,含辛茹苦,毕生劳瘁。他的一生,堪称勤奋学习、热情宣传、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为人类解放事业顽强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从魏野畴闪光的一生中,可以看出,他对马列主义的宣传,不是离开实际,从理论到理论,单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进行空洞的抽象的说教,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

革命理论作指导，分析、研究和解决革命实践中的问题。这种优良学风和科学态度，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又必须肃清“左”的影响，纠正并防止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凝固的僵死的教条，不顾具体条件和环境，一律照抄照搬的错误态度。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行动的指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重视理论的修养，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经常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努力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作出有益的贡献。

注：

①孔从洲：《魏野畴二三事》，见《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第4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②《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第5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③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见《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第74页。

④《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第174—176页。以下注释中未注

明出处者，均见此书。

⑤《五四时期的社团》第367—36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⑥杜松寿：《终生难忘的人》。

⑦见王少敏、冯有源：《魏野畴的故事》，《革命英烈》1981年第1期第45—46页。

⑧关中哲：《魏野畴与〈西安评论〉》。

⑨《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

⑩⑪⑬《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

⑫⑮《“九七”纪念》。

⑯《本报的使命》。

⑰《勘西安反帝运动各团体》。

⑱《敬告西安工友》。

⑲《农民的苦痛》。

⑳《西安青年与反动势力决战》。

㉑《国民革命运动中之教育革命》。

㉒张仲实：《魏野畴在三原》。

㉓《致弗·凯利一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1972年5月版。



后 记

今年三月十四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特编辑了这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

收入本书的文章，是从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最近撰写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论文中，分学科评选的。在评选过程中，我们注重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特别是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导下，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论证；注重在思想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下，在学术理论上有新的论述和见解。也注意到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阐述、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取得的胜利。有的学术论文未能选入，谨表歉意。

参加本书论文评选工作的同志，哲学方面有：王陆原、冒君刚、成一丰、郭涤、孟宪俊；经济方面有：宋景先、王秉琨、何炼成、赵炳章、李东甫、杨力；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有：王万钧、孙集云、梁亚栋、彭树智；历史方面有：张岂之、孙达人、张永录、牛致功；党史方面有：张馨、孙启蒙；文学方面有：霍松林、马家骏等，谨向这些同志致以谢忱。

陕西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论文评选组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